

近代宪政的演化

陈奎德 著

《观察》编辑部编辑制作

www.observechina.net

www.obervechina.com

www.guancha.org

目 录

一、近代宪政在中世纪的渊源.....	6
二、大宪章的缘起.....	7
三、大宪章运动的意义与成就.....	8
四、欧洲宗教改革与宪政民主.....	9
五、异端宗教信仰的政治功能.....	10
六、英国人身保护法(提审法)的创立.....	11
七、英国光荣革命.....	12
八、法国君主专制的强化.....	13
九、欧洲专制时代及其内部张力.....	14
十、法国启蒙运动.....	15
十一、苏格兰启蒙运动.....	16
十二、美国独立宣言.....	17
十三、制宪会议和美国宪法.....	18
十四、法国革命背景.....	19
十五、革命法兰西的激进化及其对欧战争.....	20
十六、拿破仑时代.....	21
十七、拿破仑的失败及其遗产.....	22
十八、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复辟.....	23
十九、英国宪政在十九世纪的进化.....	24
二十、多党制在美国.....	26
二十一、十九世纪欧洲的政党政治.....	27
二十二、十九世纪法国民主道路的曲折历程.....	28
二十三、日尔曼民族十九世纪的政治发展.....	29
二十四、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主实验.....	30
二十五、社会主义思想在 19 世纪欧洲的兴起.....	31
二十六、日本的明治维新.....	33
二十七、中国对西方的初步反应——洋务（自强）运动的背景.....	34
二十八、中国洋务（自强）运动的失败.....	35
二十九、中国的改制：戊戌变法的兴起.....	36
三十、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37
三十一、戊戌失败后的宪政改革——晚清新政.....	38
三十二、晚清新政的内容.....	39
三十三、中国的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	40
三十四、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尝试.....	41

三十五、袁世凯称帝及其失败.....	42
三十六、民初中国社会发展.....	43
三十七、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	44
三十八、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45
三十九、五四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46
四十、中国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47
四十一、五四之后中国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48
四十二、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背景.....	50
四十三、希特勒与德国纳粹的兴起.....	51
四十四、日本侵华战争.....	52
四十五、民主对法西斯的世界大战.....	53
四十六、战后秩序和冷战的肇始.....	55
四十七、二战后中国的宪政实验.....	56
四十八、国共谈判破裂与中国内战爆发.....	57
四十九、战后日本的民主建设.....	58
五十、战后德国的民主重建.....	59
五十一、柏林危机（1948-1949）.....	60
五十二、战后中国内战.....	62
五十三、朝鲜战争.....	63
五十四、中国“党-国”体制的形成.....	64
五十五、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	66
五十六、中共的镇反运动.....	67
五十七、三反五反运动在中国.....	69
五十八、共产党在中国知识界的洗脑运动.....	70
五十九、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71
六十、1956年匈牙利革命.....	72
六十一、中共的反右派运动.....	73
六十二、毛的乌托邦及其失败.....	75
六十三、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76
六十四、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78
六十五、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文革结束.....	79
六十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	80
六十七、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82
六十八、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	83
六十九、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84
七十、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86

七十一、台湾的宁静革命	87
七十二、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	88
七十三、南韩转向民主	90
七十四、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91
七十五、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	92
七十六、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94
七十七、一九八九年中国天安门事变	95
七十八、柏林墙的倒塌	97
七十九、波、匈、捷的民主转型	98
八十、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	100
八十一、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	102
八十二、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后期的苏联	103
八十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104
八十四、冷战后东欧的艰难转型	106
八十五、中共抗拒世界潮流	107
八十六、苏俄：艰难的转型	108
八十七、中共乞灵于民族主义	109
八十八、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	110
八十九、1998：“北京小阳春”	111
九十、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印尼的民主化	112
九十一、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113
九十二、新千禧年十字路口的中国	113
九十三、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1）	114
九十四、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115
九十五、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3）	116
九十六、“9.11”事件：历史的转折点	117
九十七、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1)	119
九十八、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	120
九十九、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1)	121
一百、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2)	124
一百零一、左翼极权滑向右翼纳粹	127
一百零二、胡温政权向毛主义摆动	129
一百零三、伊拉克战后民主进程	130
一百零四、赵紫阳逝世与中国政局	131
一百零五、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133

一、近代宪政在中世纪的渊源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谈论宪政的人越来越多了。过去在民主沙龙里，我曾与大家一起回顾过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政治生存方式，也探讨过共产主义的兴起与灭亡，今天开始想与大家一起逐步回顾和讨论近代宪政的演化。

上述这些主题显然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是有关的。因为，虽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已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但毕竟，中国至今仍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虽然，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宪政，但是，中国终将同国际主流的政治经济秩序接轨，这是瞎子也能看到的前景了。而所谓国际主流政治秩序，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宪政。这与我们过去讲的古代世界的直接民主不同，它是近代才兴起，并逐步演化成为现代的民主宪政体制的。

我们关注的是，这一制度的演化历程如何？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何在？即，在各个现代民主国家中，哪些政治特性是所有民主宪政国家都必备的，是普遍的，非如此就不能称作民主宪政的；哪些特性是与该国的独特历史和国情连在一起的，并非任何国家都必需的，因而是特殊的。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中国的制度转型，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有助于保障我们的基本权利，有助于在实质上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因此，它与我们中国人的基本福祉是息息相关的。

近代宪政，是从中世纪的欧洲孕育萌芽的。

人们习惯于把中世纪欧洲冠以“黑暗的”的前缀，以示其野蛮落后。尽管如此，中世纪与古代世界比较起来，仍然有三项新的因素有助于近代宪政出现。一是基督教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则是条顿(即泛日尔曼)民族的政治理念，第三是英国的国会制度。

基督教带给欧洲的是所有人类成员一律平等的概念，这来源于它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该理念逐步把奴隶解放成了佃农，并在教会内部坚持不承认阶级与家世的区别。近代民主的基石之一——人权的观念开始萌芽，这种对人权的承认部分正是来自基督教。应当注意的是，古希腊只有“公民权”的概念，并没有人权概念。因此，作为奴隶的人是不享有自由公民的权利的。

条顿民族带给欧洲的政治概念是关于自由人之间自动的协议或契约。在他们看来，原始的权利平等的假定正是奠基在这种契约之上的。这就是后世源远流长的所谓“社会契约”理论的渊源，它成为近代民主发展的基础理念之一。

英国国会的建立开始是由于州法庭中集中地方代表的惯例。盎格鲁撒克逊会议或称哲人会议(Witan)本是一个国王的顾问团体，没有具体组织，人选要看国王的意旨。不过州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一种民众合作的传统。诺曼人征服英国后，除国王外，就是国王的御前会议。该团体一部分是大地主，另一部分是国王

特别召来的顾问。御前会议最初执行一般任务，英国中世纪的政治史大部就是这些任务的逐渐专门化和分工的历史。即：御前会议的任务后来分成了若干部门。这些分支中最大最重要的，就是大会议(Magnum Concilium)，由各州市的代表与国王及其御前会议人员组成。在西敏寺的集会最后逐渐变成了一种国家的立法机构。这，就是国会制度的起源。也是英国民族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最精彩的贡献之一。

二、大宪章的缘起

上次我们谈到中世纪传下来的三项新因素有助于近代宪政出现：一是基督教伦理的基本原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则是条顿(即泛日尔曼)民族关于契约的政治理念，第三就是英国的国会制度。

其实英国人的成就远不止此，客观地说，英国是对于人类宪政贡献最大的国家。

有人问，英国根本连一部成文宪法都没有，怎么谈得上对宪政的贡献呢？确实，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但是，人类的宪政又确实开始于英国。什么原因呢？这里涉及到什么是宪政的问题。宪政，就是指政府的一切行为是以被授予的权力为范围的，粗略地说，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是被民意所限制的。

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正象一头在笼子之外的老虎，是很危险的，它可能为善，更可能作恶。宪政就是把权力这头老虎降伏在民意的笼子之内的办法。英国人首先做了这件事，因此被人们称作宪政的发明者。宪政制度使得君主或其它统治者，无论其本性如何，没有实行暴政的可能。从英国历史看，每出一个暴君，人民就削弱一次君主的权力。结果变成现在这样的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挂名的虚君。

其中最初的一步，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公元 1215 年的“大宪章”(Magna Charta)。当时英国国王是约翰(John of England, 1167-1216)，他是著名的狮心王理查的弟弟，一个典型的暴君，残酷昏庸。他趁理查一世及其继承人在统领十字军东征期间战败被俘的机会夺权，后来又把本应继承王位的侄子挖掉双眼，然后杀死。在外交方面愚昧无知狂妄自大。他对法国开战，大败而归，把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土全部丧失了。失败后仍不甘心，还想起兵复仇。在国内则禁锢贵族家眷，买官卖爵。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英国贵族愤怒了。因为约翰王一再侵犯他们的权利，所以大家一起拒绝他调兵的命令。在主教朗登(Langdon)的领导下，贵族们开了一个会议，起草了一个宪章，这就是著名的“大宪章”。宪章里这样写到：

“除了经过同一阶级的人的合法审判，或是依照本国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强占、剥夺法律保障、充军或其它损害。”

宪章内还包括“禁买卖司法权、禁止随意占领他人土地、决策时须征询贵族意见，若违反宪意，贵族有权推翻国王”等条款。

这个大宪章，划定了国王与贵族双方权利的明确界限，从而在历史上以公开律法条文的形式限制了过去曾是无限的王权，这预示着，一场君权与贵族权利之间的重大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了。

三、大宪章运动的意义与成就

前面谈过英国大宪章运动的缘起及其基本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它明显是限制君权的，而约翰王当然也意识到大宪章限制了他的权力，因此拒绝签字。但是，贵族们自有办法，他们组织了军队，把约翰王团团围在泰晤士河边的伦内美德。约翰王毫无办法，只有当众宣誓遵守宪章。并于 1215 年 6 月 15 日在宪章上加盖了英国的国玺。贵族会议还选出了 25 位代表监视国王，若违反宪章，就向他宣战。

约翰王宣誓回家后，火冒三丈。据史书记载，“他扑到在地上，在愤怒中拼命咬他的手杖和草。”他并没有遵守宪章的意图，转身去哀求教皇，要想取消他的誓言，并把主教解职。教皇答应了他，于是一场内战就此发生。第二年，约翰王死去，这场争执才告结束。

但是，约翰的儿子亨利第三继位后，并不改弦易张，他仍然沿袭其父亲的老路，不肯遵守宪章。于是，贵族再次向国王宣战。其中一位有贤明而有智能的领袖，名叫西蒙·迪·芒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打败了亨利第三，并于胜利后立即召集人民代表，每县或每市派两个议员出席国会，开始了平民参政的历史。这是公元 1265 年。再过了三十年之后，当爱德华一世成为国王时，国会才成为英国政治里的经常性制度。这是大宪章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

对英国宪政史，人们常问，英国国会靠什么限制国王呢？因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君王既然是最高权力，则其它的部门或人员无非是执行君主旨意，或者摆摆样子而已，怎么可能与最高的君主权力分庭抗礼呢？甚至现代中国的国会、人民代表大会、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等等，统统不过是咨询咨询，装装门面而已。难怪邓小平先生要说西方的三权分立是三个政府，互相扯皮。因为这是他那种传统的政治文化思维方式所完全不能理解的。

话说回来，历史上的英国国会，即巴力门，有一项权力是很具体而实在的，即：没有投票，没有租税。其意思是，不经过国会的通过，政府不得征税。这样，国会就牢牢地控制住了政府的钱包。

但是，如果国王不遵守这一传统，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很简单，因为你征税是有求于人，要人民出钱。如果你不合法征税，即征收没有经国会通过的税，老百姓就可以不给。如果政府要逮捕他，国会就可以出面保护他，与国王抗争，并且该抗争合理合法。这就对政府的权力形成了实质性的限制。

英国人通过国会捍卫自己利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传统。以后我们要谈到洛克、卢梭的思想，英国光荣革命，甚至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各国宪法，都与该传统密切相关。

可以说，大宪章是宪政之母。

四、欧洲宗教改革与宪政民主

我们谈过了中世纪宪政因素的萌芽及英国的大宪章运动，今天我们要讨论近代民主宪政的另一起源：著名的十六世纪的宗教大改革，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与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宗教改革。

大家知道，这次宗教大改革起源于某种精神的饥渴。宗教一直在欧洲生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人们的诞生、受洗、结婚、死亡及安葬，都是宗教性的并因此而神圣化，大家渴望获得来世的拯救。但是，宗教事务都是由现存的教会掌握，即西欧的罗马天主教和东欧的希腊东正教掌握。因为宗教的“异端”在 1500 年左右已经消亡，正统教会缺乏对手，因此罗马天主教会变得目空一切，自满自大，僧侣们腐败堕落愚昧无知，而教职人员中旷职的人日益增多，因而教会声誉扫地，而这些事情正好发生在精神饥渴时期，因此出现了尖锐的矛盾，社会孕育着广泛的不满。

于是，从 16 世纪起，不到 50 年的时间，欧洲居民几乎 40%改信了一种革新的神学，即新教。在德国和讲德语地区，改革的领袖是马丁·路德。在日内瓦城市国家，其领袖是法国人加尔文。路德的改革，主要是主张信徒应当而且可能直接与上帝发生精神沟通的关系，而不必通过中介者教会。它以自由的研究和个人判断来代替教会，从而推进了个人主义的意识。而抛弃权威，自然就要使社团在信仰上有很高的权力。因而，宗教改革者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会的组织与结构。而那种原始时期的组织在精神方面是民主的。在这种脉络下，宗教改革在根本上可以提供民主的精神资源。

另外，宗教自由也是政治自由的先声。路德把大量信徒从教会的笼罩下解放出来，而加尔文则建立了一种教会政府的代议制，传播了自治政府的体制。加尔文派的宗教热忱，在 16 与 17 世纪反对教会与国家专制的斗争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从而使人民获得了有限度的公民自由。

当然，也应当看到，鉴于在主要的权力关系中，世俗政权与教会处于对立的地位，你消我长。而在具体的宗教革命过程中，由于路德等改革家需要削弱教会的权力，就必然会诉诸世俗政权的支持，同时，作为交换，也就难免刻意提高世俗政权的神圣性，即强化“君权神授”理论。因此，客观地说，在短期内，宗教改革是加强了世俗政权的专制主义的，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在那段时间都支持了君主的权威。

但是从长远看，由于宗教改革提供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资源，以及组织结构方面平衡制约的制度性资源，应

当说，近代民主宪政的思想，有一部分确实是起源于宗教改革的。

五、异端宗教信仰的政治功能

如何对待少数有不同信仰和看法的人？异端的命运如何？这是近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16 世纪宗教改革后，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即，在一些国家有了不同于主流的少数人的宗教信仰集团。实质上这意味着，在中世纪的异端几乎被消灭殆尽后，近代世界重新出现了新的宗教异端。少数人信仰与国王不同，与国教不同，这样，冲突就产生了。这些思想独特的少数人，强烈要求信仰不应被国家强制，更不应该因此而被政权迫害。这种要求，构成了反抗中央集权政府控制的运动。争取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的呼声在此时大张其势。于是，臣民是否应当服从君主这个问题又在怀疑与迫害交织的情势下凸显了出来。信奉主权在民理论与政府起源学说的人竭力维护自己的信仰，反对精神世界由国王定于一尊。因此，诉诸信仰逐步成为抵抗王权的基本方式。

当时有几种典型的情况。

在以新教为国教的国家，天主教的作家与信众对世俗政府发出强有力的抗议，并声称社团保留有变更政权的权力。例如苏勒(Suarez)说天主教人民对于新教国王没有无限制服从的义务。执政者权力来自主权人民的许可。这种代行的权力，只有一种条件下才可保持，即执政者必须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这就意味着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这点恰恰是宪政的核心。在另一方面，新教徒为了新教的利益，也强调主权在民的理论。因为他们是多数，由于他们与国王有相同的信仰，强调主权在民将使国王的巨大权力赋有正当性。这是一种情况。

在仍然保持天主教的国家，又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信奉天主教的政权对于新教信仰者的迫害，刺激了反抗论的出现。例如，在法国出现了有名的维护新教的著作《契约论》，它主张社会的真实基础是上帝与人民之间的契约。政府则是基于第二个协定，在该协定中缔约者为国王与人民。人民效忠是以政治的开明为条件。执政者若是违反了上帝的意旨就有被反抗的理由。国王不过是管理者或行政人员，因此，他必须受法律控制，这显然是宪政与法治的精神渊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清教徒。他们攻击主教制的教会，意思是教会也要走向民主道路。这一理想戏剧性地由英国远航的神父们——即 1620 年乘荷兰船[五月花号] 赴北美洲新大陆逃避英国国教迫害的 120 名新教徒——以及他们在北美的继承者实现了。17 世纪初在北美土地上移民的社团开始他们的政治实验，以达到其信仰自由的理想。一开始，这些反抗英国国教迫害的清教徒就充满平等精神，同时，美洲又并没有政治传统的掣肘，这就更大地加强了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这种原初的思想孕育了以后美国的开国精神。实际上，远征的神父们开初就已经有了约定：在北美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如当初的康奈狄克州，就制

定了一部基本约法，它被人称作近代第一部宪法。追根溯源，后来在世界上卓然典范，独步天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大致轮廓，已经隐隐约约浮现于那一纸文献中了，这是当时的先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辉煌成就。

六 英国人身保护法(提审法)的创立

人所共知，在现代宪政制度下，公民有免于横征暴敛的合法财产权利，有免于恐惧，免于被任意逮捕，免于“人间蒸发”的宪法权利，有获得公平的司法审判的宪法权利。如果追根溯源，这些权利是发源于何时何地呢？

事情仍然离不开英国。

我们在谈到英国十三世纪的大宪章运动时，讲到了由国会力争，由贵族向国王武装抗拒而载于史册的大宪章确立的两个传统，其最核心内容，第一即：“不经国会批准，政府不得征税；”第二是：“除了经过同一阶级的人的合法审判，或是依照本国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强占、剥夺法律保障、充军或其他损害。”

到了十七世纪，即 1628 年时，英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强烈重申上述原则，并使之普遍化了：不经国会不能征税；不经法定手续不能逮捕或处死任何人。

当时国王是查理一世，他秉性挥霍，手中的钱常常不够花。最后没有办法，他就不顾法案的禁止，在没有征得国会同意时，就恢复征收一种旧有的船税。但是，偏就有人不买帐，有一个名叫汉普顿(Hampden)的乡下绅士，不肯交纳这 12 先令的税，他说因为国王未获国会同意，因此征收这种税是不合法的。汉普顿被告到法院，但被判决败诉。但是全国的民意都支持他。国会站在民意一边，因此国会与国王发生了大分裂。国王屡次解散国会，但是无论哪届国会，都总是不肯批准他要钱的法案。最后终于导致了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武装冲突。因为国王不得民心，失道寡助，因此战败。其结局是，查理一世被推上了断头台，由国会方面的将军克伦威尔摄政。

一直到 1660 年，克伦威尔死后，才由查理二世继承了王位。王位虽然恢复了，但从此英国人更加不放心让国王独享政权了，而英国国王再也不敢轻易与国会去争执了。为了落实《权利请愿书》这一法案里的保障人权的条款，在 1679 年又通过了《人身保护法》，即提审法案。

如今，《人身保护法(提审法)》的基本原则已经通行于文明世界了，它已成为宪政的精髓之一。它指出：在逮捕任何人时，该人都有权利向逮捕者索取逮捕证书，逮捕者必须说明逮捕的原因，自己属于哪一个机构。被捕者有了这些书面文件，就有权去向当地法院申请提审。如果法院认为逮捕没有理由或理由不充分，则

逮捕人的机构就必须在 24 小时之内释放被捕者。若法院认为逮捕有理由，逮捕机构也必须在 24 小时内把被捕人送交法院，使被捕者获得公开公平的司法审判的机会。

《人身保护法(提审法)》是英国人对人类宪政所作的又一重要贡献。

七、英国光荣革命

1679 年英国国会通过的《人身保护法案》如何具体保障人身安全与自由？它是如何最终凝结在历史上从而不可侵犯的？这就势必涉及 1688 年的光荣革命。

《人身保护法案》(提审法)虽然还不能完全禁绝无理逮捕，但它保证了任何人被捕之后，一定可以遭遇到法律。法律是保障人权的。因此，被捕者就有可能向法律要求保障自己的权利。众所周知，在缺乏提审法的国家，人民要与法律直接碰面是很不容易的，直至今天仍是如此。

譬如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虽然司法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公安机关秘密抓人，抓人之后又保密，致使有些公民失踪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且被捕者还投诉无门，不能依据法律获得公平审判。这就叫无法无天。在这种缺乏《人身保护法案》的国家，政府有时行为就是绑架，就是国家恐怖主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如果把它的权力用于绑架，人民有什么办法呢？

上述的《人身保护法案》(提审法)就是专门对付滥用权力的政府的。按照该法案，如果逮捕机构违反了其规定的程序，其负责人就会坐两年以上的牢。也就是说，提审法至少在法律上取缔了特务制度，它把特务归入绑匪的范畴，起码在法律上严禁了前面说的那种国家恐怖主义。

国会虽然于 1679 年通过了《人身保护法案》，但还不稳固，还需要一番血与火的磨难。话说在查理二世之后，是詹姆士二世，这位国王是天主教徒，热心宗教，想用权力来排除教外的人。他忘了查理一世的断头台，又重翻“君权神授”的老皇历，声称他只向上帝负责，不向人民负责。他立下法律：凡天主教徒不受法定的刑罚；并命令所有牧师在教堂里宣读该法。有七个主教拒绝，他就逮捕和审讯他们。但所有人都同情七主教，当主教们被无罪释放时，军民共同欢呼。詹姆士二世问左右这是什么意思，左右说：“没什么，士兵们因为主教被释放而高兴。”他说“这还了得，你们居然说没什么。”他虽然昏庸，但知道民心军心不可侮。

这时，国会已经派人秘密把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从荷兰接了过来。詹姆士二世本来还想负隅顽抗，但没有士兵听他的，为避免查理一世的命运，他灰溜溜逃亡到了法国。

被老百姓欢迎的女儿女婿，签订了《人身保护法案》，正式承认了其神圣性。并把国王的权力转移到了国

会，接受了预算每年必须通过国会批准的法案。进一步，他们使内阁向国会负责，即国王必须任命得到国会多数的政党组阁，若国会不信任，内阁必须辞职，或者解散国会。但若新选出的国会仍然不信任内阁，则内阁必须辞职。于是，英国的君主立宪的民主制通过这次不流血的革命而正式确立了。它是人类宪政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这次 1688 年的革命，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

八、法国君主专制的强化

与英国的宪政演化方向不同，在世俗政权方面，欧洲的君权在 16、17、18 世纪反而强化了。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除了英国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度外，欧洲大陆基本上是处于君主专制时代。

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欧洲大陆各国中央集权的倾向日益加强，等级制度仍然存在，本来在中世纪后期出现的代表议会没有能成为唯一的立法机构，在此期间它丧失了其重要性。君主专制和社会上的寡头政治成为宪政民主发展的最大阻力。

其中法国的情势最为典型。

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初，法国的君主为强化中央集权，与贵族进行了激烈而残酷的争夺。经过宗教战争的大流血大动荡后，君权终于获胜，亨利四世大大地压抑了贵族的权力，把政府中的重要官职给了中产阶级官僚，并在其后期，逐渐完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系。1661 年路易 14(Louis XIV)登基，号称太阳王。他沿袭了由黎塞留(Richelieu)和玛撒琳(Mazarin)精心创立的体系——一种依靠行政会议辅助的政府。而在地方，市镇的官吏需由中央政府提名，这样就扼杀了地方自治。国王在各地方的权力网络，掌握在国王派驻各地的州行政官手中。这种行政官都不属于地方利益集团。因此，国王就获得了各省司法和财政的直接操控权。而州行政官就是高度专制的国王驻地方的代表。

不过，虽然君主打败了封建贵族和地方政治体系的分散化的力量，但却没有完全消灭早期遗留下来的带有制约因素的制度。在法国，虽然最高法庭原本有的对国王的法令进行辩论以及有时拒绝登记该法令的权力被否决掉了，但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仍然存在。虽然地方会议和市议会的行动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但它们也仍然存在着。当然，从总体看，法国在这一时期达成了空前的政治统一和强有力的中央控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法国当时也享受了文化繁荣，法语变成了欧洲上层阶级的语言。法国的发展是后来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出现世界性文明的重要因素。因此，路易 14 的时代被称之为「伟大时代」。

当时，法国的等级会议发展成为国家的议会，但其内部却缺乏向心力，它划分为三个等级，引发了明显的等级利益冲突，从而削弱了国会制约行政权力的功能。第一和第二等级享受了很多特权，特别是免税的特

权。这种 既得利益使他们倾向于与国王合作。于是，就只剩下第三等级单独对抗国王，他们徒然无功地抗拒君主的财政控制。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态势下，由三个等级组成的国会从未取得过立法的权力。自从 1614 年开会之后，以后的 175 年间均没有再次开会议事。似乎已成了一具僵死的躯壳。但正如中国谚语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了撼动世界的 1789 年，那貌似死寂的青山蕴积的柴火轰然燃烧了起来，历史遗留的政治摆设——国会，终于迸发出它内部蕴藏的巨大能量。

九、欧洲专制时代及其内部张力

除了英国、荷兰、波兰、瑞士之外，其他欧洲国家在 16—18 世纪这段时期都在趋向于法国式的君主专制。

在西班牙，由于国内各种力量无法联合起来对抗国王集权，因此，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得以建立起专权的统治。国王可以任意支配巨额税收，根本不需要国会批准。贵族获得免税待遇，与国王构成利益共同体，因而缺乏限制王权的意愿。不过，西班牙的中央集权的力量与程度都没有法国那样大。因为国会在宪法上还保留着控制司法与税收的权力。当然，它们只是早期遗留下来的东西，是一种传承自历史的花瓶。是消极的，不是主动的；是因地制宜的，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们的作用可以有时限制国王的过于无理的意旨，但是不能成为宪政国家的可靠基地，更无法组成代议制民主政府。

在日耳曼，各地方诸侯仿效法国国王，强化自己的权力。1555 年的奥格斯堡和平条约规定宗教事务由各国国王决定，在国王所管辖的区域内，或是罗马天主教，或是路德新教，概由国王作主。17 世纪中，日耳曼境内的重要国家的君主都致力于巩固自己的独裁，日耳曼大多数地方的议会都被取消了，帝国的议会在地方法会消灭后也成了一个只供清谈的躯壳。普鲁士的威廉(William Frederick, 1640-1688)大选侯把地方议会和行政机构严格置于国王的御前会议之下，该普鲁士方式成为一种专制模式，变成其他日耳曼国家模仿的对象。

在斯堪底那维亚半岛和俄罗斯，国王借助老百姓的合作铲除了贵族独立的可能。但是，由此确立的俄国沙皇的专制变得更加强大。虽然有若干代表性的议会仍然在俄国西部开会，虽然罗曼洛夫王朝的建立是由各主要城市的代表会议推选的，不过，这些都并不妨碍沙皇的高度专权。

即使是在荷兰、波兰、瑞士这些君权力量不太强的国家，民意的表达与功能也是相当有限的，在不少的方面受到了抑制。只有英国，正如我们上次所述，在 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建立起了宪政的基本框架，虽然当时政治参与的渠道还很狭窄，但是制度性的架构最先在那里搭起来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欧洲各国往下的发展，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酝酿，特别是在英国发展的启示下，一些敏锐的思想家的著作的影响，一场浩大的社会政治风暴就要降临了。

我们下一次要探讨的，就是大风暴前的重要思潮及其社会影响。

十、法国启蒙运动

思想的变迁在宪政演化中的作用如何？虽然难于精确评估，但却是无人能否认的。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为近现代西方宪政制度奠基的，除了前面谈的大宪章运动、文艺复兴、两次宗教改革以及英国君主立宪的确立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外，思想革命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指的主要是著名的启蒙运动，首先是法国的启蒙运动。

法国启蒙思想家主要崛起于法国开始反对路易 14 的专制王朝时期。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物质繁荣，开明的高度推崇理性的思想广为扩散，最重要的思想家有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 1689-1755）、卢梭（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78）、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以及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84）、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等人。

大体说来，这些法国思想家“把现存的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他们促使人民注意到专制的政治、不平等的社会、迷信的宗教、专横的教会以及在司法与财政方面的特权现象。总之，他们的思想倾向是批判的、否定的、激进反传统和反权威的，他们以革命的精神鼓动第三等级，希望创立一个建筑在理性的理想之上的崭新世界。在上述这些方面，百科全书派和伏尔泰表现得最为典型；就影响的深远而论，则是卢梭与孟德斯鸠。以下主要谈谈后面这两位的思想影响。

卢梭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不同处在于，他并不热衷于从知识论的理性角度讨论政治哲学，他的著作有时是自相矛盾的，然而笔锋却是充满激情的，并试图随时诉诸人们的道德良知。卢梭的主要政治著作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他那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开篇语，激励了世世代代人们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他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是人类平等，他所向往的是返还自然，他清晰地主张“主权在民”，而“公意”(general will)就是主权的表现，同时法律又是“公意”的表现。他认为国家的建立无非是平等的人们为维护公共福祉而达成的契约。他的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强烈地确立了这样的原则：不具有民意基础的政府是非法政府。这就为现代的“人民主权论”奠定了基石。但同时他又主张个人权利居于“公意”之下，这也就为“多数人的专政”开启了一道后门。以戏剧性的方式，法国大革命在这两方面都呼应了卢梭，因此它的成就与灾难都与卢梭的思想密切相关。

另外一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比卢梭更早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论，他的思想主要受到英国制度以及我们下面要讲的英国思想家洛克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比较平衡，较少争议，较有建设性，并从而牢牢地凝结在历史上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论法的精神》(本世纪初严复先生就翻译为中文名《法意》)。他主张渐进的有序的改革，并推崇英国宪政的优点。他指出，权力集中，其害无比；只有限制政府的权力，才能保

障自由。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理想的政治制度。他的很多基本主张，至今仍在宪政民主国家实行。

十一、苏格兰启蒙运动

英国的启蒙思想其实先于法国发生，这显然与英国首先达成宪政制度有关。

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是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应当说，他是英国 1688 年光荣革命的思想总结者，因而具有极大的世界性影响。譬如在法国，稳健的革新派(如伏尔泰)都信奉洛克，激进的革新派(如雅各宾派)则信奉卢梭，而美国的独立宣言带有很清晰的洛克的烙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人们公认，洛克是自由主义的鼻祖。

洛克的主要著作是《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以及《论宽容的信》，其基本思想是一种关于有限政府的社会契约理论。如果简括地说，就是：“就其权力而言，一切政府都应是有限的，而且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才得以存在。”他鲜明地主张，“所有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在他的契约论中，政府作为契约的一方，如果不履行契约中承担的义务，人民有正当的理由反对它。因此，他的思想的重要方面在于反驳霍布斯关于早期人对人的战争状态的学说，论证他的关于人类的自然状态的理论；论证自然法的重要性；论证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描述通过社会契约如何形成政治社会；阐明政府是如何建立的；论证宗教宽容的极端重要性；论证为何人民有权反对暴政。总之，洛克的中心关怀是自由，而他也鲜明地表明，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

这一切，已经勾勒出现代宪政的基本轮廓。

另一位重要的英国启蒙思想家是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这是一位极其深刻和锐利的怀疑论者。众所周知，他对以往的哲学信条和宗教信仰的深刻怀疑及其犀利的思索论证，在哲学界和人类思想史上惊世骇俗，具有翻天覆地的影响。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崇尚自由政府，认为在一个明智地构成的政府中，每个人都必须假设为无赖，即，人们总是追逐自己的利益。他对所谓“自然状态”的学说存疑，也反对流行的“社会契约论”。他的主要反驳是契约论与人类社会的实际历史以及有时人民的实际情感不一致。他认为，在人类的政治习惯中来一次巨大变革的推动力是人们的想象和理性。但是人们往往过高估计了理性的能力，因为它轻易地假定人们能准确地知道和预见自己的真正利益，但这是不对的。他非常尊重历史上形成的习惯、道德和传统的作用。他指出，政治措施的很多后果都是不能预估的，因此经验的指导是重要的。

休谟从近代自然法学说的基本原则开始，得出了很多与洛克相似的结论，同时也放弃了洛克的一些论证方法与原理。他的倾向比洛克略微谨慎和保守，但是对近代自由主义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因为他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弗格孙(A. Ferguson)等人构成了思想史上的所谓苏格兰启蒙学派，是与法国启蒙学派并列的现代自由主义的两大源头。由于苏格兰启蒙学派更多地凝结了对英国宪政道路的反思，因而在当代

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和重视。

十二、美国独立宣言

我们曾在第十讲谈到，欧洲宗教改革之后，在英国，作为少数派的清教徒，为反抗英国国教的迫害，1620年远走新大陆，努力在美洲创建一个信仰自由的平等的基督教共和国。这些新移民的确与背负沉重传统的欧洲人不同，他们特别富于独立的自由的精神，从而在北美洲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

在殖民统治时期，虽然北美殖民地沿袭了英国本土的大部分制度，但伦敦殖民当局对北美殖民地仍然有超额的经济盘剥和政治压制。鉴于不满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对他们的严苛的殖民统治，1775年4月，这些北美殖民地移民与英国宗主国爆发了彪炳史册的独立战争，其序幕是由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战斗揭开的。战争期间，殖民地的十三个州于1775年5月在费城召开了第2届大陆会议，会议任命G. 华盛顿为总司令。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和延续，双方和解的希望逐渐消失，完全独立已成为殖民地的目标。

1776年6月7日，在大陆会议的一次集会中，维吉尼亚的理查德德·亨利·李提出一个议案，宣称：「这些殖民地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6月10日大陆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草拟实际的起草工作由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负责。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获得通过，并分送十三州的议会签署及批准。

该宣言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政治哲学——民主与自由的哲学；第二部分列举若干具体的不平事例，以证明乔治三世破坏了美国的自由；第三部分郑重宣布独立，并宣誓支持该项宣言。

宣言以“不言而喻的真理”的名义，开宗明义地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独立宣言最后庄严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敲响了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嘹亮钟声。

独立战争历时八年之久。各州之间“为了共同的防御，安全的自由，相互的幸福，缔结一个坚强的友谊同盟。”当时，每州在这个同盟内都有平等的一票。该同盟有权宣战、缔约、铸钱、举债和统帅军队。但当时的美国还仅仅是一个为了应付危机的各州政府的联席会，是邦联，而不是各州人民共同的联邦政府。

在战时，同盟还算有效。然而一旦战争胜利，获得独立，因为每州各自为政，很多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士兵的抚恤和复员无机构统一管理，叛兵的滋事……等等。总之，秩序混乱，人心思定，渴望和平与统一。但是，要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实权的联邦政府，各州就必须放弃部分主权。然而当时人们刚刚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痛恨任何集中的权力。因此，面临着相当困难的建国工程。

直到 1785 年，统帅殖民地军队战胜英军的华盛顿将军，才获得了一个历史机会。当时弗吉利亚州与马里兰州因为航运问题发生争端，突出了各州各自为政的弊病。由于事关切身经济利益，双方容易妥协。华盛顿就此请两州代表协商合作办法。在会上，他提出了统一税额和币制的建议。后来又找来附近两州的代表参加，结果四州的代表决定在第二年九月召集一次十三州的商业会议。但到头来只到了五州的代表，不过仍有收获，他们已认识到联邦政府的重要性，它决定下一年五月再开会议，并扩大了会议议题。

这个定于 1787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会议，就是著名的费城会议，史称制宪会议。

十三、制宪会议和美国宪法

1787 年 5 月 25 日，美国的制宪会议正式在费城召开。

制宪会议得以进行，有赖于会议有规则有程序并且守规则守程序；同时，也有赖于主持会议的主席，是德高望重又谦虚冷静的前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即使如此，来自各州的代表们，由于理念与利益不完全相同，仍然爆发了华盛顿所预言的“可怕的争执”，连他本人也偶尔禁不住用尖刻的语言批评对手。场面十分火爆，眼看就要破裂了。这时，81 岁的富兰克林出面了，他要求休会三天，“让这一阵的激动过去，大家才能没有意气用事地、自由地、充分地对这些问题的仔细考虑。”同时，他提议请一位牧师祷告“宇宙的创造者，恳求他主持我们的会议，用他的智慧启迪我们的心灵，把真理和公平的爱好注入我们心中，使我们的辛苦能得到完全的成功。”

富兰克林的恳切，牧师的祈祷，触动了与会者心灵的深处，滋长了妥协的精神。这三天似乎上帝之光真的降临了。以至在 7 月 2 日重开会议时，奇迹发生，会议空气转变，协议的基础，后来被称为“伟大的折衷”的方案当天就提了出来，在 16 日终于以五比四通过了该方案，也就是现在美国宪法的最初草案。

经过三个月，于九月 17 日，三十九位代表(有 13 位代表离会，三位代表拒绝签字)在草案上签了字。虽然如此，但并非表明大家都满意了；相反，恐怕没有一人认为它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哈密尔顿在签字下注明：“没有一个人的意见比我自己离这个草案更远，但我们是继续在混乱和争吵中犹豫呢，还是不如在草案上寄托我们善意的期望？”富兰克林则说，这宪法中有几部分是他不赞成的，但他愿意信托别人的判断。华盛顿则总结说：“很可能我们所提议的不会被接受，也许还必须经过另一轮可怕的争执。如果为了要讨好

人民，我们提供一个自己不赞成的方案，今后我们又如何能为我们的工作辩护？还是让我们提高我们的标准，使智慧与和平得以实现，至于成功与否，本是上帝的意志。”

接下来的工作更困难：即，争取有九个以上的州的批准。因为草案规定上院是以州为单位均等组成。人口少的州很高兴，马上批准，但这只有四州，其余九州则迟迟不予批准。于是，在草案上签字的代表，抛弃了自己个人见解，努力推动在本州获得批准。

自认离草案理念最远的哈密尔顿，却成为最努力促成批准的人物。他是纽约州的代表，纽约州议会多数议员反对草案，于是哈密尔顿就发动浩大的宣传，写了很多文章，收入《联邦党人》书中，成为美国政治的经典。最后，纽约州以相差三票的微弱多数通过。

宾州有一些议员反对草案，拒绝赴议会，使批准的会议开不成。但该地人民在签字代表的解释下，群起到这些反对的议员家中把他们拖到会场，结果获得通过。

弗州议会辩论最激烈，因为著名群众领袖和雄辩家亨利领导着反对派，而主张批准的领袖居然是拒绝在草案上签字的郎道尔夫。他放弃了私见，竭力游说，结果以 89 比 79 批准。郎道尔夫后来成为第一任联邦检查官。

终于，美国的宪法确立了，它保障了美国两百多年的长治久安。它的制宪过程显示了政治过程中折衷和妥协的重要性，也彰显了美国开国先贤们的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开阔的政治胸怀，从而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十四、法国革命背景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特别是卢梭的思想鼓动，另外，加上英国宪政制度以及美国革命的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法国社会十八世纪末叶的社会状况，使法兰西逐步酝酿出了一种革命的气氛。

1774 年，在法国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氛围下，路易十六登基。一方面，长期的战争与政府开支的奢侈使国家财政日益窘迫；另一方面，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影响的老百姓则日益感到封建等级制度是对自己人格的污辱，而农民由于遭遇到极其沉重的不公平的负担，更是怨声载道。国王虽然高度专制，却完全没有政治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下层人民为贫穷所困，皇室与贵族则荒淫无度，国家行将破产而贵族与教士仍不愿放弃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国王提议召开已经多年未开的国会。于是，国会，即等级会议于 1789 年 5 月召开。

在国会上，主要由中产阶级与平民组成的第三等级反对当时法国的等级制，要求建立一个以财产为基础的代议制。这就导致 7 月 7 日成立立宪议会，该议会一诞生就与国王和贵族对抗。在革命氛围的激荡下，1789

年7月14日，愤怒的巴黎市民起义，他们一举攻占了象征法国专制的巴士底狱，从而使法国革命开始转向更为激进的阶段。

在国民会议上，大多数主张先要有一个指导立法的原则，再制定新宪法。这一指导原则就是名垂青史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在1789年8月26日诞生的人权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深远历史意义。它包含了法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它作为政治革命的总体方案，大部分基于英美的先例；而涉及主权在民以及人民在立法与法律面前的平等，则大多出自卢梭的思想。法国人在英美保障基本人权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不分出身，人人都有平等的参政议政任官的权利。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而“平等”则是当时的核心诉求。

在人权宣言基础上，1791年法国颁布了新宪法。该宪法使国王路易十六在立法方面丧失了提案权，而他的否决权只限于稽延性的用途。虽然国王在任命大臣和军队将领以及外交决策方面仍然有权。另外，地方政府也实行选举，选出的议会和官吏不再对国王而是对选民负责。立法机构是一院制，议员用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任期两年。法国没有采用英国的内阁制，国王的大臣不能由议员中挑选。新宪法采严格的分权制，规定，不管国王召集与否，国会均要开会，并且国王并无解散议会之权。因而，法国国王的权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

国王与国会，二者权力的一消一涨，孕育着更为激烈的政治风暴，产生了举世震撼的历史后果。

十五、革命法兰西的激进化及其对欧战争

由于欧洲其他君主国家集合起来反对法国革命，加上国王路易十六于1791年6月20到25日企图逃跑被败露，因此，革命阵营中的温和派如吉伦特派希望与国王和自由派贵族合作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设想完全破灭。1792年，由于革命面临着武装入侵的威胁，因此法国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并很快扩展为与欧洲多数国家的战争，早期战争的失利，导致更为惊慌和极端的措施，于是在1792年8月10日图拉里风暴中，废黜并处死国王，屠杀政治嫌疑犯。革命遂走向极端化。

激进比赛的结果，导致吉伦特派以及丹东等人被更激进的雅各宾派所取代。在对欧洲的战争期间，法国国内的个人自由受到很大的打击，宪政的基本原则受到破坏，实际上是宪政的倒退，在英国的《人身保护法》里确立的“不经法定手续不能逮捕或处死任何人”的原则受到践踏，出现了某种“多数人的恐怖”，即暴民政治。大群市民抓住并处决在警察押解下的犯人，后来又把屠杀扩大到监狱，约有一千多人丧生，其中多数是一般盗贼、妓女和游民，有1/4是牧师、贵族和政治犯。1793年，设立“公共安全委员会”，从而雅各宾派的紧急内阁获得了采取恐怖行动的权力，但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它有权对大臣与将领直接颁发指令，有权罢免全国的官吏，用中央提名的官吏代替选举的官吏，取消地方自主权，有权派遣委员分赴各地，执行独裁的权力。

在这种高度集权和对民众全面动员的情势下，法国当局集中力量进行战争，不仅赶走了入侵者，还发动了反攻。比利时和其他一些领土被并入法国，后来法国势力扩张到了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在此过程中，法兰西将领拿破仑的天才脱颖而出，他在意大利获胜后远征马耳他与埃及，把革命制度带到了他的枪炮所及的地方。只有对大不列颠群岛的攻击没有获得成功。

在这一时期，由于战争胜利而引发了对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反感，于是继很多领袖之后，他自己也被推上了断头台。1794年虽然恢复了资产阶级政府，但法国的民主已经大大削弱了。1795年，中央政府方面的民主被取消。虽然人权宣言仍然保留，但成人的选举权却受到压制，居住权与纳税成为选举权的条件。国会此时已分为两院，上院由用间接选举产生的250名40岁以上拥有财产的公民组成，有稽延法律的制定之权；下院则有500人，有创制法律之权。但这些都不能防止政府的腐败和遍及全国的政治冷感与厌恶。很多人开始希望结束革命的实验，重建秩序和安定，哪怕是恢复部分的专制。这种社会心理导致法国在1797-1799年放弃了民主，而逐步接受一个执政拿破仑的独裁乃至恢复帝制。不过，即使如此，法国革命的基本成果仍然得以保持了下来。

法国革命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竭力提倡平等，维护人的尊严，不管其出身与信仰，这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鼓舞。但是其激进化的“多数人强迫你‘自由’”的逻辑又开启了革命压制人权的暴民政治的先河。这两方面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后期法国用武力推行启蒙理念，从而导致了世界性民族主义的高涨。下一讲我们将继续讨论拿破仑时代欧洲政治发展的复杂局势。

十六、拿破仑时代

法国革命后期用武力向各国推行启蒙理念，既推广了以拿破仑法典为表征的共和制度，同时，由于欧洲各国反弹，又导致了世界性民族主义的高涨。于是，在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政治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作为法国革命的继承者和背叛者，拿破仑是一位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著名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曾经作交响曲献给他，后来听说他当皇帝后，又愤怒地涂掉他的名字。这一历史掌故就典型地反映了拿破仑充当的上述双重角色。

拿破仑是在1799年夺得法国政权的，当时仅有31岁。他的成功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在进攻北意大利和埃及及时他获得的辉煌战功；二是法国人在经历了革命后期的混乱、失望和政治冷感后，渴望一种有秩序的安定的生活。于是他们接受了拿破仑在1799年到1804年的第一执政地位，并被动地默认了拿破仑在1804到1814年作为法国皇帝的专制统治。

拿破仑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天才与军事天才。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中，采取了各种措施，实现了法国人民

拥有一个健全政府的要求，并为法国的很多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1800年的行政法令整顿了在革命中划分的郡区，削减了地方选举的各级议会的权力并派郡守去各地实施中央集权统治。

在政府与教会的关系上，1801年的《教务专约》解决了革命时期政权与教会之间的争执，它允许国家掌管教会的世俗权利，而把教皇限制在宗教事务的范围之内。它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真正实现了政教分离。

在教育方面，1801年的教育法令建立了设有奖学金的国立学校，它的目标在于培养文职官员与军官。

最重要的则是在法律体系方面，拿破仑1804年颁布了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确立了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确立了在革命中形成的财产权。而过去的旧贵族只要承认新政权，一律受到立法保护。

通过上述措施，拿破仑巩固了法国革命的各项具体成果，这些成果甚至在他倒台之后也延续了下去。虽然，拿破仑在取得这些成就时削弱了法国人的个人自由，并以行政效率取而代之。在这方面，议会的职能被削减到最低，行政代替了政治。法国成为一个农民和地主的国家，并拥有一套庞大而臃肿的官僚机器。不过，它毕竟使社会的才干之士有用武之地了。

拿破仑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外战争。从1803年起，拿破仑就连年征战。由于他的罕见的军事才能，法国军队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他采用分割敌军，并以优势兵力围敌的战略，1805、1806和1807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在耶拿，在弗里斯兰分别击败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联军，成为欧洲霸主，这是烜赫一时的拿破仑时代的顶点。

十七、拿破仑的失败及其遗产

拿破仑在顶峰之后继续取得了一些军事进展。1808年他闪电进攻西班牙，赶英军下海，1809年再胜奥地利。在这些军事胜利的背景下，他扩张法国领土，并把瑞士置于法国“保护”之下。他通过一系列合纵连横的外交运作，使西班牙、意大利东北部、那不勒斯和威斯特伐利亚都成为波拿巴家族成员统治下的附属王国：从奥地利和普鲁士夺来的波兰土地被拿破仑取名为“华沙大公国”。只有领土缩水了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和靠着与俄国结盟，保持了脆弱的独立。

拿破仑用战争输出法国的制度，推行《拿破仑法典》，在欧洲落后地区强行实施社会革命，同时也大量搜刮当时他势力所及的地区的资源以供法国之用。从而建立了一个以财富与功绩为标准，而不以祖传权利和特权为依归的新的社会形态。他的这一改革，由于是诉诸世俗的要求，而并非诉诸基督教，所以不仅在

欧洲的广大地区留下了痕迹，甚至也影响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的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模式，连南美洲和亚洲的日本也以《拿破仑法典》作为法律改革的样本。

拿破仑军事成就的转折点是他在 1812 年入侵疆域广大而多雪寒冷的俄国，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就是以它为背景。这一军事远征的失利导致奥地利、普鲁士与俄国三国的君主结成联盟去抗拒他。而这一联盟获得英国的巨大财政支持。

英国与法国的敌对主要由于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在地缘政治上和商业上，英国的国家利益不允许法国控制英吉利海峡沿岸，而法国政府的利益驱使它在商业上排斥英国贸易，因此拿破仑利用他在欧洲的大帝国体系抵制英国货。英国海军不断在地中海与波罗的海破坏拿破仑的大陆体系。然而，如果没有奥、普、俄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支援，英国不可能战胜拿破仑。因此，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格局：全球政治与工业最先进的国家英国与一些落后、反动的国家结盟，去抗击另一个正在政治与工业迅速兴起的国家法国。由此，我们看到，国家利益常常比意识形态更为强有力。这一现象，后来在历史上反复呈现。

1814 年，俄、普、英三国军队侵入法国，拿破仑战败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 年，他逃了出来并奇迹般地受到法国人的沿途欢迎，于是重新统治了法国一百天，号称“百日政变”。但是，最后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中被英国将领威灵顿打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幽禁，于 1821 年在该岛去世。

法国革命是世界性变革的伟大催化剂。它的影响所到之处，给所在地人民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带来了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原则。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的核心内容，也是二十世纪全球的主导观念。拿破仑用枪炮推行上述理念、制度和法国国家利益，使其在空间上大大扩展了。但是，由于他采取的民族侵略与压迫政策，同时也激起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反弹。这也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简单地说：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法国革命与拿破仑的两大主要遗产。

十八、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复辟

拿破仑于 1815 年被打败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欧洲进入以保守为基本特征的复辟时期。反法国的同盟国家在 1815 年召开了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该会由以保守著称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主导，它使欧洲复辟后的政治秩序制式化和稳定化了，史称维也纳体系。

但维也纳会议也有一项正面成果，就是导致了 30 年的世界和平。1815-1848 年间欧洲在维也纳体系下的和平，是在势力均衡原则的支配下，由维也纳会议与会各国对各自利益的讨价还价折中妥协而奠定的。其中，梅特涅的政治才干、各国对法国再起的警惕、加上民心思定等其它因素的配合起了重要作用。

譬如，在维也纳会议中，列强在领土分配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当时俄国欲得到整个波兰，普鲁士欲兼并

全部萨克逊，但是此举会大大提高俄国和普鲁士的势力，违背维也纳会议势力均衡的原则，所以奥地利和英国坚决反对俄、普的计划。梅特涅为了维护奥地利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以及维护欧洲列强利益的「互动关系」，基于「私利」和「共利」，提出「会议制度」。会议运作的模式是列强以和平的方法，本着合作磋商，互谅互让的精神，达成共识，以会谈代替战争，解决彼此的纷争。最后，双方作出让步，俄国得到波兰部分领土，普鲁士亦得到五分之二的萨克逊，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了维也纳会议中最爆炸性的问题。

梅特涅亦提出列强组成「国际政府」，并以「干预权利」镇压各地有关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强力维持社会的稳定。如在 1820 年，双西西里王国和萨丁尼亚—皮得蒙王国发生革命，国际政府授权奥地利派兵打击当地的革命运动，助其恢复了原来君主的绝对统治。

此外，各国内部的因素亦有助欧洲于 1815-1848 年间维持和平的局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各国人民经历了长期担惊受怕、流离失所的日子，均渴望和平、安定和秩序，厌战的情绪高涨。而且，经过战火的洗礼，欧洲各国灾情严重，即使英国亦不能幸免。故此，列强于战乱后忙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颈的重建工作，由于事务繁多，使列强无暇向外扩张，有助欧洲各国保持和平。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英国的制度性影响，各国对代议制日益感到兴趣，认为它是一种安全的制度，既可以基本满足民众的要求，又可以避免革命。当然，这里的代议制在政治参与的程度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权是很不相同的。

在当时，凡是采用代议制的国家几乎都采用两院制，即都设上院与下院。因为上层人士对于单一的由民众选出的一院制的人民会议不敢放心，怕他们易冲动，从而作出草率的决定。因此设立上院，由具有一定身分的、有资历、经验和特殊才能的人构成，形成对下院的一种牵制和平衡力量。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欧洲的某种保守与贵族的倾向。

但即使如此，当时的欧洲各国也无法完全抹杀掉法国革命的成就。拿破仑用枪炮推行自由平等理念虽然失败，但其遗产并未完全消亡。实际上，在其后欧洲各国制定的宪法中，也不得不引进一定限度的民主宪政原则。

十九、英国宪政在十九世纪的进化

由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英国在十九世纪实行了相当广泛的渐进宪政改革。

英国的工业革命，导致城乡分化，城市人口集中，企业制度兴起，对法国战争欠下的国债加重了大众的负担，城市生活造成的联合机会促使了民众权利意识的高涨。为调整与抑制社会的愤懑，上层认识到政治革新的必要。于是，在广大民众尚未达到忍耐的极限，还没有大声疾呼参政权利之前，政府已经允诺并开始扩大选举权范围。

1832年，英国大革新法案虽扩大了政治代表的基础，但仍不能称为完整的民主宪政制。各州郡中的出租土地者及不动产的所有者，都有选举权，但工人阶级却不得参政。当时英国人口约两千五百万，但有选举权者不到百万。不过，国会作为国家的代表机构这一原则，连国王与贵族都是承认的，已经获得普遍认同。

1835年至1838年的宪章运动(Charlist Movement)是由于民众对1832年的温和的大革新法案以及1835年的救贫法不满意而兴起的。实际上，早在1816年，就有人提出每年选举下议院议员一次，并给所有纳税人以选举权。这两项要求在1838年的宪章上有名的六条中都体现出来了。他们并且呼吁重新调整选区，使国会具有代表全民的性质；议员要发给薪水，使更多无产阶级能够进入下院。这次运动的基本目标是使国会受到选民的控制，这一目标是大体达到了的。

另外一项重要的发展是有关选举的比例代表制的出现。如何扩大国会的民意基础，照顾到广大地区人民的意愿，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哈尔(Hare)提出了比例代表制，以改进代议制，消除其中不合理之处。所谓比例代表制，就是按各地区人口的多少来分配国会议员的名额。譬如，如果某地区有5万人，可以推选出一名国会议员；则在具有10万选民的地区，就可以有两个议员的名额，.....依此类推。象美国各州的联邦众议员名额就是按各州人口多少按比例分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即穆勒，Mill)认为比例代表制可以使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士获选为国会议员。

这一系列发展和社会运动受到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家影响，最重要的是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家边沁(Bentham)以及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的影响。功利主义的主要口号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派别宣布民主为唯一合理的政体，在当时相当激进。因为要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必须大多数人掌握最高权力，因而逻辑地就要求废除由君主和贵族控制的上院，并承认由普选产生的下院为最高权力机构，不仅在立法上是最高的，而且要控制行政。

密尔，大家都知道是两本经典著作《论自由》和《论代议制政府》的作者，他虽然大体上赞成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主张，不过却认为如果把它作为政府行政的方法，可能产生重大流弊。边沁主张对于国会下院执行大多数人意旨的权力不加限制，密尔认为这就可能干预个人的权利范围，变成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时期的暴民政治。密尔坚决主张，立法机构最能增进公共福利的办法是尽量少干涉个人自由。他认为，多数统治，也许比任何其他政治制度更为公正，但不一定能产生最好的行政结果。

边沁的功利主义开了左翼自由主义(即工党思想)的先河，甚至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培养了政治气氛。密尔的主张总的来说较为平衡，较能经受历史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与美国的宪政原则与实践对欧洲大陆思想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1835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通过实地考察写了一本《美国的民主》，对于以抽象理念煽动感情的政治宣传方式表示反感，他对美国政治的客观冷静的比较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我们在下一次就考察一下美国的民主制

度特别是政党制度的特征。

二十、多党制在美国

现在，人们日益清楚了，民主宪政具有一种竞争式的政治形态，这就是政党政治形态，也称多党制。

但是为什么只有通过政党政治才能达到民主？为什么会有政党？政党是干什么用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考察美国的政党政治。因为美国由于没有欧洲国家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它的宪政民主之路比欧洲国家较为顺利和典型。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宪法并没有写入政党一词，那么政党是否合法呢？

政党当然是合法的。因为宪法里规定了人民有结社和言论自由。因此，人民就可以用这一自由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利益并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产生了政党。这里“结社”当然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政党只是其中之一，政党不过是政治见解和利益大体相同或相近的社团组织而已。(1998年，有北京的官员居然对申请组党的中国人说：“虽然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但是不准组织政党。”这不仅公然违宪，而且闹了一个天大的国际笑话。)

但是，民主国家的政党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大家知道，民主政治要以民众的意见为准，但是，大家意见纷纭，各不相同，如何知道民众意见呢？于是政治首先就要做“搜集整理民意”的工作。然而众人意见不一，七嘴八舌，如何收集呢？实际上都是要有人先写好一个草案，供大家批评，修改，形成比较系统的意见，其实这就是政党首先要做的事。一个政党就是一批政治见解大体一致的人的组合。由于大众的利益不同观点不同，就组成了各种各样的政党。在选举时，每个政党的党纲都想尽量反映多数人的意见，去同别的政党争取选民的支持。选民当然是投票给与自己意见最一致，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党。得选票多的政党就获得授权去执政，推行得到多数拥护的政纲。因此，第一，政党就是整理并靠拢民意并设法争取执政以贯彻民意的组织。

第二，政党还是推举人才的组织。因为有了纲领还需要能干的人去执行，否则纲领等于空话。虽然民主社会在理论上人人都可做官，但僧多粥少，没有那么多官位。如果每个人都出来竞选，全国必定乱成一锅粥。于是，就自然形成各个不同政见的人群组合。每一个群体中人们的政见和利益大体相同或相近。于是，每个群体推出少数人代表该群体，这就是他们的候选人。这个政见和利益大体相同或相近的群体，就是政党。各个政党为了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就必然把党内最优秀的人推出来去同别的党的人选竞争。竞争的结果，能干的人就冒出来了。

可见，民主宪政国家的政党的出现与选举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无非是整理民意和推举人才的政治组织，以便通过选举而使“主权在民”的原则落实。由于宪法规定了结社言论自由，而又要实践民主的原则，政党，于是就由于法律准许和民主政治需要而自然而然产生了。反之，如果没有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民主宪政就无法运转。

因此，政党政治是民主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十一、十九世纪欧洲的政党政治

欧洲的宪政发展虽然曲折复杂，不像美国那样典型单纯，但是只要是宪政民主，其政党政治仍然有一些基本功能和特征是一致的。这些特征构成了宪政民主的基本要素。很容易发现，它的特点与我们中国人所见到的所理解的政党很不同。

第一点不同是，宪政民主国家一定有多多个政党竞争，而不是一党垄断权力。原因很简单，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既然你可以组党，何以我就不能？大家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同时，社会上确实存在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人群。而一党垄断，没有竞争，则必然造成绝对权力。众所周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只有多党的竞争，才能相互制约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因此，多党制是有无民主的最重要的鉴别标准之一。

人们可能问，既然大家都可以组党，为什么近代史上宪政民主国家内并没有千千万万个政党，而仅有几个，甚至经常是两个主要政党在竞争呢？譬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一例。确实，人人都可以组党，但是小党在选举中根本没有可能胜利，因此，选举竞争的逻辑就使得各种党派为胜算而合并力量，以赢得选举。组合的结果，最后逐渐造成两个党势均力敌的局面。有些人误以为所谓“两党制”是宪法规定只许有两个党竞争政权，这是大错特错。宪法上甚至连“政党”这个词都没有。它是由于结社选举的政治逻辑自然形成的。

第二点是，后来二十世纪兴起的另类“政党”，已经完全脱离了上述政党的基本特征。譬如在当代中国，一说到入“党”，人们就想到自己的出身成分、介绍人、填入党申请书、内查外调、入党宣誓忠于党的领袖和意识形态、发党证、交党费、过党的组织生活……等等复杂手续。在美国，这一切都不需要。当代中国的这些特点实际上是控制严密的共产党以及法西斯党的特征。在美国，只是在大选前选民去注册时要填写党派归属(或独立人士)。那时你愿意注册为什么党，你就算是该党党员了。如你填共和党，表明你有资格参加共和党推举候选人大会而已，没有别的特权和义务。甚至你最后真正投票时，你也可以不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而投民主党。秘密投票，谁也管不着你。只有这样，才可以对政客有力量约束，使他们不敢得罪普通选民。

另外，很重要的是，美国的政党并没有一套严格的意识形态去约束党员，也没有严密的纪律去管理党员。而共产党与法西斯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及其严酷的纪律是众所周知的。也就是说，民主宪政国家的政党

不是限制人民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组织。虽然，各党之间的政治倾向有些差异，如大体而言，共和党倾向于小政府，少缴税，为企业家创造更好的竞争条件；民主党则较为重视社会福利，希望通过税收减少贫富间的差距等等，但大体上，每次选举，双方都会向中间立场靠拢，以便赢得更多选票。

总的来说，宪政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的政治组合。它们与后来兴起的那种高度纪律的、强化意识形态的、夺权后垄断政权的、入党做官发财的特权阶级政党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民主政党与列宁主义革命党之间的基本区别。

宪政演化的历史表明，所有宪政民主国家的政党，特别是美国政党，在十九世纪就已基本上具备了民主政党的特征，这一特征，成为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之一。

二十二、十九世纪法国民主道路的曲折历程

我们在前两讲谈到了十九世纪英国的渐进民主宪政改革和美国的政党政治，今天我们讨论法国宪政民主的进展。

法国拿破仑一世失败后，欧洲有一段复辟和倒退的时期，宪政民主事业陷入低潮。例如，在西班牙、那不勒斯、波兰等地，建立民主宪政的运动都受到了压制和打击。不过，这一段回潮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得太久，原因是，1830年发生了革命，它阻止了复辟倒退。法国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企图推翻法国国会制度，但没有成功。革命击破了君权神授的理论，波旁王朝自己反而被推翻了。继位的新奥尔良王朝的君主答应尊重民意并承诺与国会合作。这一发展导致了连锁反应：比利时起而反抗荷兰的统治，并且在独立后制定了一部自由的宪法。希腊也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在瑞士，则扩大了直接选举的范围。另外，意大利、德意志以及波兰也先后传来了日益响亮的民主诉求和激烈的民主运动，欧洲各国的任何统治者都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

1848年，欧洲发生了争取民主的更大规模的起义和混乱，威胁到了维也纳会议后各保守的君主制国家确立的世界秩序。但是，在有些国家，这一威胁由于统治者的明智而化解了。譬如有几个君主立宪的国家，由于逐步实行了民主宪政而成功地避免了革命，其中包括英国、荷兰及比利时。

唯一的例外是法国，它的新奥尔良王朝本来实行的也是君主立宪制度，但是却被一场激进的革命所颠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该政权没有能够获得中产阶级的积极支持，二是法国的选举权限制太严，引起了普遍不满。虽然当时的法国国王菲力普·路易(Louis Philippe)声称主张和平，但他厉行寡头政治。而在当时，法国民众憧憬的是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主张的政治平等和耀眼的外交成就。对这两点，新奥尔良王朝并无意愿也无能力提供给他们。

由于上述原因，法国的二月革命所遇到的抵抗很小，而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很快就答应给民众以普选权。不过，新成立的立宪会议排斥了革命运动中激进的一翼——以勃朗·路易(Louis Blanc)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参与政府，于是在巴黎爆发了巷战。这次事件使法国的资产阶级认为要建立秩序与安全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于是立宪会议修改宪法，实行总统制，把大权赋予了总统，由成年男性推选，任期四年，很大程度上不受立法机关约束。这一规定为法国的第二帝国开辟了道路。当时法国的民意被引导到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的倾向，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曾给法国带来自豪感的拿破仑家族。在这一普遍的社会心理支配下，年轻的雄心勃勃的路易拿破仑三世以压倒性的选票当选为总统。1851年12月宪法修改，国会下院仍由成年选举，但上院则由总统指定以牵制下院。而立法权的准则则交给国务会议负责，原为四年的总统任期改为十年，拿破仑第三显然成了操纵宪法的人。因而，在第二年即1852年他把法国再度改制为帝国就毫不奇怪了。

法国人的“拿破仑情结”使得法国的民主宪政又推迟了三十年！

二十三、日尔曼民族十九世纪的政治发展

在十九世纪日尔曼民族中，中产阶级成为自由主义的主要载体。他们痛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的专制制度，甚至支持革命要求。梅特涅在1815年建立的日尔曼联邦，实际上是他用于抑制民族团结与宪政要求的手段。只有在普鲁士，民众中支持专制的人数较多，因为普鲁士政府实行一种很精明的政策，把强有力的行政控制与有价值的行政改革联系了起来。1848年巴黎的革命爆发后，日尔曼南部各邦马上扩大了他们的国会制度，并且要求选出一个日尔曼的国会，从而实现德国的统一。

在这种情势下，1848年5月18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一个普选产生的日尔曼国民会议，并制定了一部比较周密自由宪法。宪法规定一个世袭的皇帝与责任内阁共同负责行政，立法权则交给两院制的国会，下院议员由成年选民选出，上院议员部分选举产生，部分是世袭的。但是日尔曼原有的当权的贵族并不愿放弃特权而实行议会制的宪政原则，因此，专制的统治仍然在维也纳与柏林维持，宪法条款被停止实行。1849年，德国皇冠被建议戴在普鲁士弗雷德里希·威廉四世皇帝头上，但他竟然拒绝了这项桂冠，即表示不承认法兰克福国民会议。于是，各原来的日尔曼邦国又重新活跃起来，企图阻止日尔曼民族统一的实现。

1862年，被普鲁士王威廉一世召唤到权力宝座上的俾斯麦，成为王国第一任首相。他用铁血手段实现了有利于普鲁士的德国统一，史称“铁血宰相”。1866年战胜奥地利后，他以北德意志联邦——集中了莱茵河北岸所有的城邦国家——代替了日耳曼联邦。1870年德国对法国的胜利，造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突飞猛进；南方各城邦国家向北德意志联邦靠拢以图创建德意志帝国。帝国于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城堡的水晶走廊里宣告诞生；威廉一世成了德国皇帝，俾斯麦被任命为首相。1871年5月的法兰克福条约，承认了阿尔萨斯—洛林让给德意志帝国。

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推行一种和平与联盟的政策以孤立法国。他的精明的外交谋略，使他成为国际政治的仲裁人。尽管获得如此巨大的内政外交成就，但到 1890 年，俾斯麦就被试图独断专行的威廉二世解除了职务。

在内政上，德国仍实施压制性政策，但受到了普遍抵制。同时，在巴伐利亚(Bavaria)与普鲁士王国，日尔曼国会的宪法仍然保留了下来。在匈牙利二月革命后，奥匈帝国已受到很大打击，民主宪政的思想和力量毕竟在欧洲弥漫开来了。

日尔曼民族的基本问题是，倡导自由思想的毕竟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因此在 19 世纪较少有发展出基于主权在民的共和政体的愿望。立法机构的成立是出于国王的许可。国会是比较软弱和缺乏效率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咨询、批评，不能过问军事与外交，而且当时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内阁。德国的首相也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首相。内阁阁员只对国王负责，不受下院不信任投票的影响。因此，只对普鲁士王负责。军事的任命权也操在普鲁士内阁手中。普鲁士参谋部是文官政府的后台。总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未推进宪政改革，政府是军国主义的，不是民主的。不过，由于下院由普选产生，因此还有若干宪政基础。

只有当德国军人势力与专制政体崩溃，宪政基础才会迅速地发挥作用，到那时，德国才可能真正建立自由秩序。

二十四、 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主实验

对比十九世纪法国与德国民主的曲折发展，以下我们继续谈谈欧洲其他国家民主演变的不同情况。

在中欧，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曾经统治了匈牙利 200 年。但 1848 年的革命浪潮引发 3 月 15 日的佩斯革命。1849 年 4 月 4 日哈布斯堡皇帝把王位交还给匈牙利，匈牙利即宣布为独立的国家，科苏特·拉约斯(Kossuth Lajos) 被选为国家领袖。这个在欧洲最久的民族革命，同年夏天又被哈布斯堡的援军俄罗斯军镇压，1849 年 8 月 13 日匈牙利向俄罗斯投降。

1867 年，匈牙利与哈布斯堡达成妥协，建立奥匈帝国。新成立的帝国除在外交、国防及财政等行政单位上是共建的，其他如立法机构、政府内阁及首都都是双重的。因著这种行政和立法的划分，1867 年至 1918 年期间也名为「双重时代」。奥匈帝国的皇帝在奥地利和在匈牙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皇帝在匈牙利的施政需要得到匈牙利国会大多数的支持才行，而在奥地利，皇帝则能够控制国会的召开与否。实际上，双重时期的奥匈帝国是匈牙利的「黄金时代」，它带有一定的宪政色彩。

在瑞典，国王是不可质疑的行政领袖，虽然，瑞典下院政治独立性的增长已经显示他们决心在该国促成责任内阁制，不过，整个十九世纪国王都能够脱离党派的立场为自己挑选阁员。这说明国会的权力是很有限

的。

在瑞士，1848年完成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体系，这使它从一个各州的联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它有一个小型的行政会议，而国会是两院制。1848年2月的革命促进了瑞士的民主。一方面地方的民主仍然富有活力，另一方面，人民开始了全国性的政治参与，例如遇到修宪的时候，人民有最后批准的权力。瑞士的制度是一种国会政府制度。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由国会选举一个七位阁员组成的执行会议，其任期与立法机关相同。这一制度的民主性在于，立法机关不仅能挑选与监督阁员，而且行政与立法两个机构都受人民直接投票的控制。行政机关获得了一种保障，即在国会两院均有发言和修改法案的权力。1848年的上述宪法给予中央的权力不大，于是1874年修宪时改变了这一点。但由于恐怕中央权力太集中，于是又规定了由民众直接投票来防止中央滥权的危险。由此可见，瑞士在行政的效率和人民的控制这两方面获得了某种平衡。

西班牙经历过相当长时期的骚乱与尝试革命，最后在1890年相对安定了下来，实现了一种普选的君主立宪政体。

从上面大家已经可以看出，欧洲各国民主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这种不同，实际上形成了欧洲各国制度的实验与竞争的局面。这种局面，显然是有利于较好的制度生长并去适应各国国情的。

我们这里所讲的制度性变迁主要是属于政治权利方面，其目标是要把主权，即国家的基本权力逐步使得广大民众都能参与和控制，并通过法治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自由。因此从英国开始，欧洲国家逐步发展出了一种代议制的民主宪政。

二十五、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欧洲的兴起

我们前面所讲的制度性变迁主要是属于政治权利方面，其目标是要把主权，即国家的基本权力逐步使得广大民众都能参与和控制，并通过法治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自由。因此从英国开始，欧洲国家逐步发展出了一种代议制的民主宪政。

在上述基本趋势下，自19世纪下半叶起，在一些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潮。它许诺了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

在当时前卫的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说法是，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建国和法国1789年大革命发其端，人类社会基本上找到了一条「政治民主」的生存方式，而现在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向「经济民主」的生存方式迈进。

的确，自从工业革命之后，敏锐的思想者注意到，政治民主并不足以保障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完全平等。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法国，经济问题似乎都越来越引人瞩目：城市人口的集中，企业制度的兴起，就业问题的出现，低廉的工资，繁重单调的工厂劳动，贫富两极的分化，阶级的分殊，失业现象的严重……，总之，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思索，这就是当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背景。

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想法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阶级差异。这就意味着国家为了公众的福利，为了收入的均等而进行经济的再分配，这也就意味着用政府的权力强制性地控制和改造社会。

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的影响大，在英国，即使是激进思想家，也倾向于采取渐进的改革路线。这与英国传统有关。社会主义思潮有很多派别，例如圣西门和欧文和拉萨尔，但是影响最大的则是大家都知道的德国籍的犹太人马克思。他的共产主义也是社会主义思潮中最激进的派别。他与恩格斯于 1848 年共同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突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滥觞。虽然他认为自己是对民主自由的进一步推进，但他在根本上是挑战代议制民主的基石——自由主义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却只有在自由主义的英国，才有条件充分研究并发表出来影响世界，这是对他的一个讽刺。

这种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最重要的是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及苏联的出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和红色中国的出现则是其顶峰。但是，这种「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二分法，在经历了历史性的考验后，显出了它的观察方式的肤浅和错误。事实表明，以「经济民主」相标榜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运动，不仅没有带给人类以经济民主，反而连这些社会原来享有的一些政治民主也被剥夺殆尽了，从而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度极权和普遍贫穷。

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于对人类现存的道德规范的批判、特别是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有关。如卢梭所呼唤的「返回自然」，返还到原始的所谓「公共财产」状态，如普鲁东对私有财产的攻击等，是这一思潮的核心论述。

因此，从 19 世纪中叶起，私产制度成了一个贬义词，私有财产成了罪恶的渊藪，对它的口诛笔伐成了一种时髦，对私产制度的批判一百多年来席卷了以该制度为根基的文明社会。批判私有产权的著作充满激情，很容易地获得了大众的支持，产生了撼动人心的效果。

在这种诉诸情绪的流行思潮的影响下，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知识界，批判私有产权居然成了这一段历史时期「进步」思想的天经地义和核心。

这种在理论上对於财产权合法性的摧毁，以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影响如此之剧烈，以至曾一度扭转了人类文明的方向，对民主宪政造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二十六、日本的明治维新

所有我们前面所涉及的都是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开始的宪政民主的发展，这股西风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吹到古老的东方，吹到我们自己生息繁衍的亚洲大陆。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首先对西方吹来的风敞开了胸怀。日本是个善于学习模仿的民族，它的历史，有两大关键点：一是大化革新(645-707)，一是明治维新(1868-1912)。大化革新是学中国，使日本摆脱部落时期，进入文明社会。明治维新是学西方，摆脱割据局面，实施宪政，富国强兵，使国家现代化。前者开创了日本古代文明，后者开创了日本现代文明。

当时的世界，是实现了工业化和宪政改革的西方国家大举向外扩张的时期，它迫使日本的孤立状态结束了。那时在位的日本明治天皇，虽然只有 15 岁，但已经表现出过人的才智，受到宫中所有人的拥戴。而日本当年的局面，就象中国古时的诸侯时代一样，各藩各据一方，而由德川幕府执政。但幕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敌对的反应，于是朝廷在 1867 年 10 月 10 日宣布讨伐幕府，幕府将军庆喜，同意把政权归还给朝廷。但是后来仍免不了一场惨烈的战斗。最后，幕府缴械投降。于是，执政 265 年的江户幕府灭亡。1868 年，明治时代来临了。

政权收归天皇后，明治大张旗鼓，实行维新变法。明治元年 3 月 14 日，明治天皇率领百官告祭天地神明，颁布五条誓文，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

- 1.广开言路，万机决于公论。
- 2.上下一心，共展经纶。
- 3.自官吏到庶民，务使各遂其志，人心振奋。
- 4.破除旧有习惯，一切基于天地公道。
- 5.吸收世界知识，大振皇基。

随后，仿效西方，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议会分为上下两院，实行内阁制度、爵位制度、废除武士特权、实施征兵制、陆军模仿法国、海军模仿英国、建造现代军舰、建立一套国民教育系统、选派大量留学生去西方学习、把藩邦划为郡县……。总之，一切组织都抄袭模仿欧美国家，并正式迁都江户，改名为东京。凡洋人会的，他们通通照抄；而过去遗留下来的好品德，他们也通通保存。于是很快的，日本就变成一个象模象样的近代国家了。

为了进一步把日本建成象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明治 22 年二月，正式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办法，希图完全具备欧美形态的政府模式。明治 23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贵族院与众议院一起举行了第一次议会开院式，由首相朗诵天皇开会的敕语，念完后捧给贵族院院长伊藤博文，仪式隆重，象真的一样，显示了日本佬的认真劲儿。

但是，这些主要是形式，日本那时还根本算不上民主国家，只是有一点宪政的意思而已。日本人本来就是一伙好勇斗狠的亡命徒，现在又有了西方式的先进枪炮，武力大大增强，更加双手痒痒、蠢蠢欲动，呈现出具有日本特色的军国主义色彩。

开初，它的外交还侧重于防务。1872 年宣布对琉球群岛拥有主权，不顾中国抗议，1879 年把它设为日本的一个县。接着就是接管小笠原群岛和千岛群岛。1894-1895 年，由于中国的保护国韩国与日本的争端而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战胜当时腐败的满清，签订《马关条约》，从而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使中国蒙受极大的民族心理耻辱，种下了一个世纪中日两国不和的仇恨种子。

二十七、中国对西方的初步反应——洋务（自强）运动的背景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一直到十七世纪，都居于世界的领先行列。然而正当西方在政治经济工业科学各方面高速崛起的近三百年这段时期，不幸的是，中国却正处于衰微的阶段。

大家知道，是迅速扩张的英国首先叩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政府为了制止鸦片贸易，为了防阻外来影响，导致与英国于 1839-1842 年的鸦片战争，战争使中国军队遭到惨败，其结果是租让香港以及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并享有「治外法权」。1842-43 年与英国，1844 年与美国与法国，1858 年与英、法、美、俄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了所谓「条约的世纪」。

这之后，中国又经历了太平天国造反的危机。这一危机从 1851 年 1 月 11 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兵开始，导致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持续达 14 年，纵横 18 省，席卷了半个中国。在危机平定后，自 1860 年起，中国开始了对西方冲击的第一步反应。这就是所谓「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1861 年，恭亲王奉命组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着中国一场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发端。

洋务运动早期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当年清政府剿灭了太平天国以后，中国的社会大环境相对处在一种较为平和的环境下，再经历十几年的“师夷长技”，呈现了一片“莺歌燕舞”的虚假繁荣，史称“同治中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正好是邻居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向西方学习，但结果却完全不同，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清朝官吏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因此学习西方的中心口号是著名封疆大吏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只学西方的技术，如造船造枪炮的技术，把它用于保卫中国原有的制度和价值观。而日本人，如我们上次所讲的，它原先的文化主要学习自中国，所以现在扭转方向改为学习西方也就没有像中国那样强大的心理障碍。于是，中日两国的学习的结果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中国的主政者不懂得，一旦采用西方机器，就得借用它的科学技术；借了科学就得借用其他知识和观念，接受了新观念就得改制度，最后走到宪政改革以至革命共和。这些是相互关联，一环扣一环的。事实上后来也是这样走的。不过，由于每一步都很不情愿，很被动，因此是「走两步，退一步」，充满了痛苦和血泪。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运气不佳，在这一关键时期(长达四十多年)，中国大清朝的最高统治权落到了一个无知而保守的慈禧太后手中，抑制了中国以革新的方式回应西方冲击的可能。而日本，则首先有了政治体制的变革，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并由进取心极强的年轻的明治天皇率领内阁全面向西方学习，社会获得全面的改造。

二十八、中国洋务（自强）运动的失败

1861 年，恭亲王奉命组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着中国一场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发端。

洋务运动早期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当年清政府剿灭了太平天国以后，中国的社会大环境相对处在一种较为平和的环境下，再经历十几年的“师夷长技”，呈现了一片“莺歌燕舞”的虚假繁荣，史称“同治中兴”。

洋务（自强）运动由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以及较年轻的助手李鸿章领导，这两位都是很能干的汉人官吏，恭亲王奕訢、左宗棠、张之洞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发展的民用工业有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李鸿章懂得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必须学习欧美机械以自强。除了造船炮以外，当时还要求更大范围的改革。于是，洋务运动超越了军事范畴，广泛的兴建铁路、矿山，政府甚至鼓励私人兴建工厂，社会上也出现了张謇这样一批实务救国论者。同时培训人才，大量翻译，甚至开始选派留学生出国。

但正如前面谈到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每一步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例如，中国第一位到美国的留学生容闳，1854 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八年之后回国，却等了十年才被曾国藩用于买机器和当翻译。他建议的留学政策，直到他回国 15 年后才实施。1872 年，他带了 120 名穿长袍的儿童到美国，同行的还有老式中国教师，好教儿童们学「之乎也者」以不忘本；另外，还派一位保守派与容闳同行，以便监视他并防止儿童被西方思想精神污染。后来，由于精神污染很难防止，于是到 1882 年，这一留学计划就被废除了。

此外，守旧派怕开矿、铁路、电报线会破坏风水，也极力阻挠。而仅有的企业都是官办官营，办事的商人被掌权的官员压榨，毫无效率。官办企业、官僚资本，贪污腐败，慈禧太后又派守旧派掣肘，因此，独立自主的民间企业始终无法达成。

1894年，中国与日本开战。这是一场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双方都使用了西方的技术来武装自己的军队。因此甲午战争正是检验中国洋务运动的成果的关键。

战前很多人看好中国，因为中国毕竟疆域广阔，舰艇的数量也多于日本。但李鸿章明白内情真相，极力阻止开战。试想，1880年末，海军军费竟被慈禧太后用去修颐和园。如何能战？而中国军舰有些没有炮弹，有些则没有火药，北洋舰队司令竟是一位骑兵老将，他把军舰按骑兵冲锋式一字排开，却被日本海军以两个纵队包围击败。

这次的失败不同于以往。日本长久以来一直视中国为自己的老师，但是它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后，日本已非昔日倭寇。这次战争让中国人深深陷入了苦恼——为什么经历了30年的改革，依然失败给外国，甚至是一个以前地位低于自身的小国。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洋务(自强)运动的失败。这是一次关键性的震撼。自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醒悟到必须从政治制度上入手了。

二十九、中国的改制：戊戌变法的兴起

我们已说过，1895年甲午海战，过去一直被中国瞧不起的东洋小日本竟然也打败了堂堂大中华，而原因只不过仅仅是30年前小日本模仿西方，改革了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一点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全国士大夫悲愤莫名，认识到非改革制度不可了。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国人群情激荡，于是著名学者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各个省份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反对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提倡“变法图强”，并组织强学会，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它开启了现代中国读书人集会上书，参与政治，呼唤变革的新篇章。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康有为的这些主张，得到了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翁同龢以及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实际上，湖南也一直在实践自强运动，是地方求新变革的先锋省份。1898年，康有为的机会来了。这一年，列强都要求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似乎已走到被瓜分的边缘。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上书，请求变法。1898年

4月他以保种、保国、保教为号召，成立保国会。然后，帝师翁同龢把他推荐给了光绪皇帝，在中国的这一关键时刻，康有为成了皇帝最信任的人。当时，慈禧太后已经把政权"归还"给了光绪皇帝，名义上皇帝已经可以独自主持国家大事了。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那些日子里，天天发布有关新政的"诏定国是"的文书，带给了中国人以崭新的政治框架，使中国士大夫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之情。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朝气蓬勃，新事物蒸蒸日上的时期，似乎一个崭新的宪政中国就要就降临到地球上了。

三十、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在百日维新期间，即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那103天中，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发布了大约40条新政诏谕，包括了行政、教育、法律、经济、工艺、军事、警察制度等各个方面：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把各省书院、祠庙改设为学堂；裁减各重迭机构；准许满族人自谋生计；并筹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设立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倡办各种实业；奖励各种新著作、新发明；设立翻译局，编译各国书籍；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提倡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编制国家预算，公布每年的收入支出；广开言路，提倡上书言事；举办农会、商会等。它模拟了日本等国的一系列宪政制度，基本的目标是建成一个君主立宪体制的现代国家。它的有些政策，例如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提倡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广开言路等等，一百年以后的当今中国，都还仍然没有实现。

"百日维新"开始后，新政措施虽未触及皇朝统治的基础，但是，却触犯了顽固势力的既得利益。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而当时的最高权力并不掌握在皇帝手中，而是在慈禧太后手中。有人上书慈禧，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李莲英也跪请太后"垂帘听政"；老谋深算的慈禧，则等到满朝文武几乎都觉得变法将使自己的特权丧失地位不保之后，才出面安排军事政变。于是，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9月21日，慈禧命令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而谭嗣同等协助变法的“戊戌六君子”，则在被逮捕之后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临刑前，谭嗣同慷慨陈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随后从容就义，为中国的近代宪政变革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至此，中国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运动被血腥镇压下去，悲壮地失败了。

三十一、戊戌失败后的宪政改革——晚清新政

前面谈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在慈禧太后及守旧势力的阻挠下，悲惨地夭折了。但是，中国当时的处境，已是风雨飘摇，不改革的确难于混下去了。这一点，连慈禧太后自己也并不是不清楚。因此，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讽刺的是，她自己也不得不执行戊戌烈士的遗嘱，小心谨慎地向宪政变法这一方向移动了。戊戌之后不到三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历史家称之为[新政改革上谕]，她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其中心是在教育、军事、警察、监狱、法律、司法等方面建立社会生活中的「新的政治体制」。这里的内容，大体上已包括了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的改革措施。

慈禧太后并且在1904年，大赦了戊戌变法后被捕的维新党人。1904年，中国最后一名状元兼近代实业家张謇草拟了支持立宪的奏章，后来，驻法公使于7月正式奏请立宪。当年夏天，张謇还印制了日本明治宪法的译本交给了慈禧，据说慈禧颇为赞赏。

在此期间，发生了日本与俄国的战争，日本大胜。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它意味着「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国内的立宪运动。1905年6月4日，在日本战胜沙皇俄国的前夕，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名上奏，要求立宪。仅仅六周之后，朝廷在7月16日上谕，派遣四名高级官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这表示政府将于不久后同意立宪。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定，废除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从此，一大批读书人游离出了政权的体系，成了教师、记者等各行各业的自由职业者，为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人才资源。1905年11月成立了考查政治馆，12月11日，五名考察政治大臣出国考察，长达半年。五大臣1906年回国后多次受慈禧召见，各自都发表了立宪意见。

其中，端方奏：宪法请仿日本，兵农工商请仿日德两国；

载泽面奏：要想立宪，就要先除满汉界限，满汉一心，改革方能奏效；又奏：请裁撤内监，西方政体中没有这种东西；

戴鸿慈进呈"欧美政治要义",共18章,奏言:"各国政体,美为合众,而专重民权;德本联邦,而实为君主;

惟英人循秩序而大好激进,法出自然,行之百年而无弊。"还有,"有宪法不联合之国,如瑞典挪威则分离矣;

有宪法不完全之国,如土耳其埃及则衰弱矣;有宪法不平允之国,如俄罗斯则扰乱无已时矣。"又论"哪国富,哪国强,哪国志气伟大,哪国风俗厚焉,哪国失之太骄,哪国虽自由而太放任....."论来论去,最后说:"穷其得失之源,实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维,然后可收举国一致之益也!"

如此,五大臣争相发表各自的考察心得和对中国变法的建议。8月26日,袁世凯到北京,参与军机大臣会议、讨论五大臣条陈。虽然各自意见不尽相同,但要求变法则是一致的。最后,终于一致建议立即实行宪政。

三十二、晚清新政的内容

1906年9月1日,大清国宣示预备立宪,清廷公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预备立宪之诏》,内容是由袁世凯、铁良和端方撰写。诏书先论西方各国宪政的好处以及大清必追而仿效的决心,然后笔锋一转,说:

"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诏书决定成立官制编制馆,它的23名起草委员中大多是曾经留学日本或接触新思想的学生。官制编制馆草拟了1906年11月6日的厘定官制上谕,实质上是重组中央政府。

当时的立宪,为使得慈禧和保守官僚放心,主要仿效日本。立宪官员说,法国、美国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不能仿效;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也不能仿效;德国虽有成文宪法,但是须在议会通过后施行,是强加于皇帝的,仍然不能仿效。只有日本,既有成文宪法,又不侵犯皇室特权,事先也不必接受公众查核评论,而日本与中国又同属亚洲,政体、民情最为接近,所以一致决定采用日本形式的宪法。

1907年8月13日成立了宪政编查馆。该馆编写了于1908年采纳的23条《宪法大纲》,这个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一、第二条差不多是日本《明治宪法》第一、三两条的翻译:「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它甚至与皇帝是按「天命」统治的这一

中国传统都不同，完全是日本式的，其特权甚至超过了日本。

1908年，慈禧和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又云："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这就是说，他们按照日本模式，订出所谓九年预备立宪的时间表，最后颁布宪法。计划于1916年进行全国选举，1917年召开国会。

但是，已经晚了，这一保守的立宪措施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政治要求了。特别是慈禧与光绪于1908年11月14、15日相继去世后，权力轴心顿成虚弱，满清王朝基于本能的退缩，更把「维护王朝维持稳定」看做「压倒一切的大事」。但另一方面，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更趋高涨。立宪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导致两者合作的最终破裂。满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呼喊声中摇摇欲坠。于是，终于引来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延续了2100年的帝制统治突然之间就崩溃了。这显然与晚清改革的拖延与保守是有关的。

三十三、中国的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

杀害了戊戌变法人士的慈禧太后，虽然在最后几年为挽救政权也被迫施行与戊戌维新相似的立宪措施，但是由于她过去的血腥手腕、她后来的拖延保守，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政治要求了。维新派与守旧派、汉族与满族之间的仇恨已经太深，特别是清政府在她死后又把「维护王朝、维持稳定」看做「压倒一切的大事」，终于，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

开初，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在中国的进步人士中，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另一派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的立宪派，他们之间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论战，革命派主张共和制，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制。但是，实际上他们要达成的基本社会体制仍是差不多的，即宪政民主体制。只是革命派的方法更激烈而已。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地方精英很多是既对革命派提供经费，又积极参与立宪运动的。

辛亥革命的前奏曲是1911年春夏之交的四川保路运动。公元1911年5月，清廷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策划下，强行收回民间集资自办的粤汉和川汉铁路。此措施引致川、粤、鄂、湘四省的地方精英群起反对，商股补偿问题又未得到解决，四川绅商乃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誓死力争。这股保路风潮迅速发展为四川全省性的骚动，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鉴于湖北防务空虚，于是，革命党人趁机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新军的工程营首先发难起义，在全国支持保路的风潮中，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为旗帜，进攻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澂闻风逃遁，革命党人随即在湖北成立军政府。不久，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许多省份也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因这次革命爆发于农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

命”。不久，孙中山由美国归国，他领导的同盟会于 1912 年元旦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当时，清朝已日暮西山，隆裕太后企图起用袁世凯以挽颓势，但袁本人有当皇帝的野心，他当时的位置正是左右逢源，一方面凭借军力优势胁迫孙中山让位，威胁要解散国会巩固自己的超级地位；另一方面，借用南方民军的压力胁迫宣统皇帝退位。1912 年 2 月 12 日，隆裕太后被逼在获得清室优待条件下于养心殿签发清帝退位诏书，满清王朝宣告灭亡，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结束。

中国，成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三十四、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尝试

但是，民国虽然成立，战争并未结束。虽然南方各省节节胜利，但垂死挣扎的清王朝任命拥有军事实力的汉人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在北方率军抗拒义军，一时僵持不下。袁世凯一方面以满清力量阻拦革命军，一方面又以革命军的力量要挟和逼迫清廷。为避免长期流血内战，在经过一系列妥协商议之后，革命军与袁世凯达成了南北议和协议，孙中山提出辞职，而袁世凯于 1912 年 3 月就任总统，清朝皇帝正式宣布退位。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就这样顷刻覆灭了。

袁世凯虽然参与过晚清的宪政改革，但骨子里是个旧式政客，也是「军阀之父」。他熟悉中国皇权政治统治中国的那一套权术，对现在这样有 800 名国会议员的争吵与党派纷争，自己不能为所欲为任意操纵的局面，感到十分厌烦。他的目的是，既要促进经济发展，又要巩固自己的独裁权力。就是说，他既要照搬晚清末年的新政，推进象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变革，又不给变革的代表力量--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丝毫参政的权利。

当时民国初建，中国翻开了带有部分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色彩的历史篇章：新闻不受管制，各县、市、省选举出了自己的议会(咨议局)代表，国会由不同党派的议员组成。但是，袁世凯对议会制度、各省自治以及言论自由怀有强烈敌意。以同盟会和一些小的团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 1913 年大选中获胜，从而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因此国民党的宋教仁成了国会领袖，也就成了袁世凯的眼中钉。1913 年 3 月，属于袁世凯北洋系的、当时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年轻有为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全国大哗。当时的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法院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罪犯密切来往的证据，确为 20 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的大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

宋教仁的被害，使孙中山悲愤难抑，他断然力排众议，拒绝依法解决，发动了“二次革命”。但革命迅速就失败了。于是，袁世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叛党”之名解散了国民党，进而于12月解散了国会。1914年2月4日，袁世凯又撤销了各省的咨议局和地方自治机构，这些机构是在1912-1913年根据扩大选举法（占成年男性人口四分之一）重新选举的，并在辛亥之后控制了地方的权力。袁世凯解散它们后，由自己控制了地方官吏的任命权，从而掌握了国家行政管理的实权，由大总统变成了终身大总统，巩固了自己的独裁，使民国初年的民主宪政尝试奄奄一息，名存实亡了。

三十五、袁世凯称帝及其失败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先是，7月12日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随后，黄兴在江苏兴师讨袁，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市独立，向袁世凯宣战。但由于兵力及士气不足，力量对比不利。加上以袁世凯又从列强处取得了「善后大借款」等因素，「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至此，袁世凯的气焰登峰造极。他一心想着尽快当上正式总统。虽然他对国会向来没有好感，不过此时他要利用一下国会为他选举正式大总统服务。在袁世凯的催促下，正式宪法中的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先期完成。袁世凯急欲在10月10日“国庆节”正式任职，用金钱收买一些社团大拉选票。10月6日国会投票选举，为保万无一失，袁派一千多名打手装扮成公民将国会团团围住，经过三次投票，直到晚上九点才勉强选出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在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

袁世凯当正式总统如愿以偿后，国会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了。10月14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出《天坛宪法草案》，草案虽明显扩大了总统权限，但仍含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等内容，袁断然不能接受。袁提出增修宪法案，要求扩大总统职权，提出宪法公布权属于总统。遭到抵制后，袁气急败坏，将总理熊希龄任热河都统时擅拿承德行宫宝物一事公诸于世，挟迫熊辞职并签署解散国民党的命令。1914年1月，袁下令停止议员职务，非法解散了国会。5月，袁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宣布废除《临时约法》，为其实行独裁统治复辟帝制扫清了道路。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权令智昏，开始做起「皇帝梦」了。5月1日，袁下令撤销国务院，撤销总统府军事处，成立“陆海空大元帅统率办事处”。10月，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排斥出去。9月28日，袁率文武官员到孔庙祭孔；12月23日至天坛祭天，为称帝从思想上到舆论上做准备。他先弄了一个「筹安会」，找了一批所谓社会贤达捧场，鼓吹「中国国情特殊论」，认为中国传统与国情不适于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以此为复辟帝制作舆论准备。但是，地方菁英以沉默相对抗，袁世凯无法得到他急需的「全民拥戴」的表象。为获得国际支持，他于1915年5月先接受了日本对中国极为苛刻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在自以为取得了国际的支持后，复辟帝制事宜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了所谓国民代表大会，一致投票赞成帝制。12月11日上午，参议院开会，通过了请袁称帝的推戴书。袁假意推托。按预谋，下午5点再次开会，通过第二次推戴书。袁故意做出一副推托不过而称帝的姿态。但实际已在着手准

备元旦的登基大典。接着，在当年 12 月宣布把次年即 1916 年改为洪宪元年，准备披龙袍坐龙椅当皇帝了。但是，他的梦做得太早了。就在他宣布改年号的 12 月，著名将领蔡锷将军，在其老师梁启超支持下，经红颜知己小凤仙的协助，历经艰难曲折、戏剧性地从北京潜逃回云南，誓师起义，发动了著名的「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帝制自为。立刻，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举兵响应，坚决捍卫民国，反对恢复帝制。面对风起云涌的反对，袁世凯于 1916 年 3 月 22 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改回大总统称号。1916 年 6 月 6 日，在全国的声讨声中，袁世凯忧惧而死。

三十六、民初中国社会发展

袁世凯死后，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但其内部却迅速分崩离析。早在袁世凯在世时，北洋军阀就存在着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袁死后，又分裂出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各派军阀分别与不同的列强国有着不一样的亲疏关系。为扩充势力范围、争夺权力不断混战，从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社会的控制。

民国成立后直到 1927 年国民党掌握政权之前，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动的状态中。这里有两条主线在发展：一条是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低落，由于各地军阀的连年征战，中央政府对全国已经失去了全面控制，而地方军阀的力量却逐渐成形。特别是在袁世凯死后，形成了某种割据的局面。另一条则是外国的影响空前发展，外来商品、外来思想、外来行事方式不断流入，特别是沿海以及各通商口岸更是如此。

对于第一方面的发展，军阀盘踞一方当然扰乱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特别是军阀之间的混战更是带来了动乱，这是其糟糕的方面。但另外，由于中央控制的减弱，地方主义的兴起，使当时「联省自治」、「区域自治」、「地区独立」等诉求与实践都日益高涨，当年毛泽东也曾鼓吹「湖南独立」。这一倾向，削弱了原本中国大一统的中央皇权统治的传统，使地方的权利有了明显的增长。

对于第二方面的发展，可以看到，那一段时期，由于外来新事物的大量涌入，特别是由于中央权威与控制力的减弱，该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相对于 1927 年之后特别是相对于 1949 年之后，那时是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的新闻界最为自由的时期。例如，那一时期，中国的报纸开始蓬勃发展，在二十年中间增加了好几倍。特别有名的如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上海《申报》、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商务印书馆》等，一时间蔚为风潮。在教育方面，有戊戌变法遗产的北京大学，也有众多由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这是中国现代教育起步的时期，同时也是教育界最为宽松，最不受政府干预和意识形态钳制的时期，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培育生长出来的。

上面这些发展，是未受或少受到传统官僚体系控制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它有助于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但却

不一定利于促进政权的统一。而政治统一的诉求，在中国传统中是很强大的。我们将看到，这种传统的大一统力量，不久之后就又会发挥它的主宰作用了。

三十七、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

在前面，我们谈到过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的兴起，而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派别。表面上，马克思主义似乎是民主自由的进一步发展，即从政治平等发展到经济平等。它的核心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阶级，最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世界大同，即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马克思用了一套黑格尔哲学的方式来表述他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阶段的辩证发展。最后的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天国的降临，当然，马克思就成了先知，而无产阶级则是上帝的选民了。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极有鼓动力量；虽然，马克思主义宣称他把社会主义科学化了，但深入冷静地考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都不过是一个独断的信仰体系，一个现代的乌托邦而已。

然而，当年，它却以它那种充满激情的要消除社会不公的道德力量感染了很多中国人，也以它那种庞大的黑格尔式的理论体系征服了不少知识分子，满足了他们的道德上和智力上的要求，因此它发展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了挑战现行代议制民主体制和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意识形态。

但讽刺的是，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在马克思念念有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德国出现，而是在不发达的落后的俄国发生的。

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俄国的国力，削弱了沙皇政府。于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商人、军人、贵族都想推翻它。但是，这个政府却垮在奉命解散大罢工的卫戍部队的一次哗变中。那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外地，他闻讯后，急于想赶回首都彼得堡，但半路遭铁路工人阻拦，于是，只好在3月15日宣布退位。这时，政权就转移到国家杜马(国会)中著名的政治家所组成的临时政府手中了。

但是，当时，还有另一个力量中心，即，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他们中的激进领袖宣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它领导着全国各地的苏维埃。开初，两个「权力中心」的不稳定并不明显，并且苏维埃中的温和派如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还在5月参加了临时政府，连布尔什维克起先也给予政府以有限的支持。

然而，1917年4月，当列宁回到彼得堡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说，整个欧洲都面临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推翻临时政府，把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于是，他们以停止(世界大战的)战争，要求和平、土地和面包为口号，动员了许多工人和士兵。这样，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发动叛乱，炮打冬宫，武装攻击临时政府，逮捕了政府官员，以苏维埃的名义夺取了政权。

那时，他们的政权很不稳定。当战争中的敌国——德国要求俄国以割让领土为条件换取和平时，大多数人不愿投降。当时，列宁为了巩固政权，与德国签订了割让土地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又秘密杀死了沙皇一家人。稳住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权。

从此，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并且，世界历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依照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由共产党行使绝对的权力，构成了对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历史性挑战，即，宪政民主制度诞生以来最大最严重的挑战。

三十八、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宪政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从欧洲向东亚推进时，会产生怎样一种历史后果？这是史家反复琢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前面我们曾谈到，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而于 1916 年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在实践上，宪政试验陷入困境，老百姓遭受了局部战乱之苦；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权威与控制力的减弱，由于国门开启，西方思潮涌入，致使该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政治理念大飞跃的时期。

象狂飙降临，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兴起的。

如果仔细分析，事实上，有两个「五四」，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

一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它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是从 1915 年到 1923 年掀起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其基本的精神资源是自由主义，其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

另一个是作为救国运动的「五四」，即 1919 年 5 月 4 日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爆发的学生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事件，直到 6 月 3 日上海的总罢市为止。其基本精神资源是民族主义，其基本口号是「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可以看出，这两个「五四」虽然不是绝对冲突，但根本精神是很不相同的，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中国的文言文，即过去一直沿用的书面文字。它是由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博士发起的。文言文与人们普通的口头语言很不相同，只有极少数的人一辈子下苦功才能学会，而不会的人根本不能进入上层社会，也无法书面表达自己的思想。胡适的文学革命，首先就要大家

用白话文来写作，「我手写我口」。古文的专制从此就被推翻了。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激烈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儒家伦理，提倡「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陈独秀。应当指出，当时提倡的「民主」，主要是指反对等级，反对专制，倡导平等，主张平民主义，带有民粹主义倾向。而当时提倡的「科学」，则是「真理」的代名词，不容怀疑和批评。

新文化运动在文学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鲁迅。他使用天才的白话文创作的小说等精神产品，对中国专制与宗法传统进行了深入骨髓的空前尖锐的抨击，他从过去「仁义道德」的书本中，读出了满篇的「吃人」二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五四」的另一面，即民族主义方面，实际上更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中国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学生运动传统的发煌。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竟然把山东原来德国的租界移交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传到北京，北大及其他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门游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租界，拒绝和约签字。他们火烧赵家楼，拳打驻日本公使，北京政府逮捕30多名学生，全北京学生立即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于是发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广州、九江和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商人罢市并抵制日货。在全国强大压力下，6月6日至10日，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负有责任的官员曹汝霖、陆宗輿和章宗祥的职务，并于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一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它是由知识分子所发动和领导的。这些人正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受新学校教育或留学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读书人，他们极大地强化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同时，如前所述，当时，在邻居俄国，又发生了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列宁把该意识形态改写为非西方的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很快传入中国，在当时中国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看来，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们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支配了相当一批中国知识者。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声音很快就减弱了。

三十九、五四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西方价值与制度形态向东方推进的另一个重大历史后果，就是导致东方诸国兴起了现代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虽然也是现代化的衍生物，但在其崛起的历史过程中，宪政发展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相当复杂

的。在不少时间里，二者的关系的是负面的，民族主义往往抑制了宪政的推进。

就中国来说，「五四」的另一产物，即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五四的自由主义相比，它实际上更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中国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学生运动传统的发煌。

1919年5月4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竟然把原来德国拥有的山东租界移交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传到北京，北大及其他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门游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租界，拒绝和约签字。他们火烧赵家楼，拳打驻日本公使，北京政府逮捕30多名学生，全北京学生立即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于是发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广州、九江和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商人罢市并抵制日货。在全国强大压力下，6月6日至10日，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负有责任的官员曹汝霖、陆宗輿和章宗祥的职务，并于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一爱国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它是由知识分子所发动和领导的。这些人正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受新学校教育或留学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读书人，是清末宪政改革的产物。他们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环境有所了解，从而有一种忧患感和民族危机感。他们把富国强兵看作最高的目标，千方百计试图与列强一争高下。他们的心态与行为，极大地强化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同时，如前所述，当时，在邻居俄国，又发生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列宁把该意识形态改写为非西方的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很快传入中国，在当时中国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看来，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们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这种反西方的“西化”，支配了相当一批中国知识者。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声音很快就减弱了。这一点，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后遗症。

四十、中国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我们已经指出，在北洋政府时代，特别是袁世凯去世后，由于中央控制力减弱，造成了地方自主力量壮大和文化活泼繁荣的五四时期。但是，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也引起了反弹，导致了全国性的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治要求，以及废止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争主权要求。

这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二次革命」的挫折。同时，孙又与原来的合作者广东军人陈炯明产生了政见分歧：孙中山主张建立单一制国家，而陈炯明则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强调各省的自治权。于是，孙中山设想的借助南方军人力量以统一中国的战略遭致失败，国民党势单力薄，在这一情势下，孙决定向才诞生不久的苏联求援。因为苏联当时宣称废除俄国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列宁当时的「世界革命

论」又有很强的反帝国主义色彩，相当符合落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口味。于是，孙先生从 1922 年起，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合作，凭借苏联的人才、金钱和枪炮，重组国民党。他请苏联的鲍罗廷担任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开办政治学校，起草党章，并按苏联的模式发展了很多地方性的基层组织。孙先生还派遣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在蒋 1924 年归国后任命他为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于与第三国际合作的背景，年轻的中共干部周恩来出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孙的转向，使国民党染上了列宁主义的色彩。

而其实在这之前，共产国际就已经派了荷兰人马林来中国，在他的指导下，1921 年 7 月于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会。经由办刊物、开书店、翻译、办研究会、组织工会，以阶级斗争为宗旨，成了一个「行动的意识形态」的、以夺权为目的、集权的、秘密的列宁主义政党。

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共产党部分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从此，国、共两党就开始了分分合合的历史，两党的恩恩怨怨支配了现代中国的主要政治舞台。

1923 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南方革命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对峙。1925 年 3 月孙先生去世后，自 1926 年起，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上海后，革命阵营内部的左翼和右翼的矛盾终于公开化，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于 1927 年 4 月在上海清党，逮捕并处决共产党员，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分裂了。

1928 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并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实现了基本的全国统一。于是，中国获得了自辛亥革命后第二次建设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历史机会。

当时，政府里不少留学海外的菁英，现代独立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都具备了。在社会上，继续着民国初年的一些文明发展，汽车、电影、剧院、书报杂志、现代学校、自主的海关税务等等都出现了。虽然言论比民国初年被样式亲控制得更紧，但大体上民间媒体还是存在的。虽然国民党在这段时期已经显露出保守腐败和专制的陋习，并打压社会变革，但在大都市以及外交军事等方面也一步步在走向现代化，以至那之后一段时期被称作有限而短暂的十年繁荣时期，一个历史的机会。

但是，现代中国的宿敌——日本，打断了中国的希望。从 30 年代起，日本的阴影一步步向中国逼压过来了。

四十一、五四之后中国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 1930 年代，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相对稳定时期。当时，在中国知识界内部，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国家政治方向的大辩论：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由于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更主要是由于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股世界性的思潮在蔓延，那就是：对宪政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否定的潮流。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和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是曾在国外留学过的学者。一方是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人，一方是胡适等人。

早在1932年6月，著名学者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蒋廷黻还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再次强调国会制度。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一时间，“新式独裁”论在知识界得到热烈的响应。胡适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再度强调民主，他说：“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丁文江等认为当时日本一天一天向中国压迫，中国国势危急，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因而需要一段时期的独裁。而胡适等人则认为，仍然应当坚持实自由民主的政治，这种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认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应当公平地说，当时双方都是在理性地讨论，丁文江等学者，并不是要向国民党献策鼓励蒋介石走希特勒的道路。他们最终也希望中国走上民主道路，只是认为中国当时若要抵抗日本侵略的话，必须有一个权威的中心力量把全国统一起来。就是说，在国家危亡时，救亡第一，民主只能暂时舍弃了。这场论辩虽然未分胜负，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在学术思想水准上平分秋色，而且树立了一个在知识界理性讨论政治的典范。但很可惜，这一切很快被日本气势汹汹的侵犯打断了。

四十二、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背景

前面我提到的中国在 30 年代的「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实际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国际大背景有关。一战之后，人们普遍对当时的西方的主流政治秩序产生了怀疑和绝望的情绪。因此，在俄国共产党用暴力夺取政权后不久，1922 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创立了法西斯党。作为右翼政党，他们与左翼的共产党都认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民主制度已经过时了。左右两翼的思想家都认为，自从英国 1688 年光荣革命以来，世界是以「自由」为旗帜的时代，而自从 1914 年第一次大战以来，世界已经变为以「组织」为旗帜了。当时，一些德国的国家至上的思想家说：「作为一种新的理想，『组织』必定战胜『自由』。在其他国家仍在个人主义制度下生活着的同时，我们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制度。」因此，左右两翼都非常崇拜高度的组织化和集中化，认为这是解决当时自由主义制度的困难和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特别是，在 1929 年，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更加深了人们关于自由主义已经不能应付现代世界的印象。

在这样种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

就其意识形态与政治目标而论，法西斯运动代表了近代欧洲所曾经历的最强劲和型态上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其目标是创造一种新式的民族主义极权国家。

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尤其表现于该运动之风格和组织方面。它主要强调集会、象征、和政治表演之美学造型，特别是倚赖浪漫和神秘的面向。所有的法西斯运动都尝试达成群众动员，政治关系和风格之军事化，以及由群众组成党军(mass party militia)之目标。和某些其他种类的激进分子不同，法西斯主义者热衷于暴力，而且极为强调阳刚原则和男性支配。至于领导问题，法西斯运动则展现一种趋于权威主义、卡里斯玛式、个人独裁的风格（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说法，即领袖原则【**fuhrerprinzip**】）。

激进的右翼团体可能具有部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目标；同样的，革命的左翼运动也显出某些法西斯主义在风格上和组织上的特徵。法西斯主义以激进姿态拒绝文化和经济的保守主义、拒绝右派的社会菁英主义，拒绝国际主义。其历史独特性在于：具备所有（而不仅是部分）这些共同特徵的重要政治运动只存在于 1919 至 1945 年间的欧洲。

法西斯主义者宣称其代表全国的所有阶级，特别是广大的群众。比较而言，法西斯运动的支持者最大部分乃是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因为下层中产阶级是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间欧洲社会最大的阶层之一，所以同样的说法也可用于其他各种政治团体。

只有墨索里尼（1922—1943）和希特勒（1933—1945）的法西斯运动建立了属于它们自己的独立政权，而

且只有在后者的例子中该运动的领袖才获得完全控制国家的权力。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因为政治利益冲突而互相敌对，但他们双方的行为方式是非常相象的，例如，绝不宽容异端。实行一元化，反对多元化，实施言论管制，反对出版自由；实施极权统治，反对民主政治。坚决奉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崇拜暴力；崇拜组织；实行管制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宣扬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只不过，法西斯主义推崇的是国家民族至上的集体主义，而共产主义推崇的是阶级利益和政党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在所有以上这些方面，二者简直是双胞胎——维妙维肖、异曲同工！而双方都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

四十三、希特勒与德国纳粹的兴起

德国的希特勒正是前述的否定民主潮流之下的产物。他创立的政党叫做「国家社会主义党」(简称纳粹党 NAZI)，其名称就显示了它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渊源关系。德国纳粹党采取了比意大利法西斯还要暴烈和激进的手段。当时德国由于是战败国的缘故，不仅国内民生凋敝，而且对外还需偿还天文数字的赔款，国内人心惶惶，各种乱象都凸显出当时的魏玛政府的无能，德国人民对于这样的民主政体感到十分不满。希特勒看中了这一点，利用德国人在一战失败后渴望洗刷民族耻辱的心理，全力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声言权力和意志比理性和平等更高尚。挑动仇恨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思潮，宣传日尔曼民族至上的狭隘情结，声称日尔曼「统治种族」，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其政党，就这样，希特勒在党中的威望日隆。某日，希特勒以政党协商为由，邀集了许多地方上的有力人士至慕尼黑集会，之后以暴力手段胁迫各政党领袖承认纳粹的统治，但不久后即被政府平定，而希特勒也因此下狱，并在狱中完成了自传《我的奋斗》。数月后出狱。之后的希特勒平步青云，在德国政府中位居要津。当年迈的兴登堡总理去世后，希特勒在弥漫着「德国至上」的普遍民族情绪中，终于在 1933 年夺得了德国政权正式继任为德国总理。

希特勒上台后，煽动狂热青年，建立横行霸道打砸抢杀的「冲锋队」，把德国从魏玛共和国变成了空前恐怖独裁的第三帝国。他严密控制社会，由纳粹党掌控了一切宣传媒体，制造国会纵火案，实行谎言统治；焚书坑「儒」，迫害犹太人和知识分子，全力清算自由主义思想；实施纳粹青年运动，强制德国青年下乡劳动；宣称战争是正常状态，而不是异常状态，大肆扩军备战，意欲称霸欧洲与全球。它与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结盟，精心而凶险地开始了他政府全球的狂妄战略。

首先希特勒施展外交方略，利用英、法等国的侥幸绥靖心态，取得奥地利与捷克。然而当他更进一步想要夺取波兰时，却使得英、法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对之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突然采取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外交策略——和苏俄结盟。正当英、法还在瞠目结舌之时，波兰已落入德国手中。

希特勒利用与共产主义苏联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东部后方的保障，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于是，他开始一步一步地向西推进，侵犯其他国家，意图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全球王国。

之后的欧洲，在希特勒闪电战的横扫下，除英、俄、意之外，全部沦于德国之手，而屠杀犹太人的计画也就从此开始。纳粹在各地建立无数的集中营，并强迫犹太人胸前需戴上黄色的五芒星以示区别，其间更有所谓的「盖世太保」在各地找寻犹太人的踪迹。在这样的迫害行动中最为知名的包括安妮·法兰克（「安妮的日记」作者）以及爱因斯坦等。

在这样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全世界笼罩在一片浓重的法西斯主义阴云之下，民主宪政国家受到了严重威胁，自由主义事业遭遇到左右两翼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由人类的命运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

四十四、日本侵华战争

前已讲到，北伐胜利后 1928 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有不民主和腐败等弊病，但仍在城市及沿海各地逐步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体制和设施，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以至三十年代前半段被人称为近代中国的一段「黄金时代」。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在日益缩小和边缘化，从一切迹象看，倘若没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是可以从那时一直发展下去而融入主流文明的国际秩序的。

但是，中日战争打断了这一进程。

1931 年发生的「9.18」事件以及随后由日本扶持清末代皇帝建立的傀儡「满州国」，已经显露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同时，也在中国激起了越来越高涨的抗日热潮。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受南京政府首脑蒋介石之命追击歼灭中共军队的张学良将军，在抗日情绪支配下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要求蒋联共抗日，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西安事变」挽救了濒于绝境的中共，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军队在芦沟桥向中国军队开枪，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日本由于早有准备，所以开始时长驱直入，凶猛而血腥，国民政府且战且退。37 年 12 月，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军疯狂屠城，南京 30 万左右的平民死于屠刀之下。第二年，日军横扫了半个中国，声称要建立一个把亚洲国家从西方解放出来的「大东亚共荣圈」。

这时，中国政府已经迁都重庆，英美两国经过缅甸公路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支持其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1 年 6 月，踏平了欧洲大陆的希特勒德国突然转身东进，撕毁「德苏条约」，闪电式攻打苏联。同年 12 月 7 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并于随后吞并了菲律宾和马来亚等地。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全球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融为一体了。

抗战开始，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同意放弃对政府的武装斗争与土改，把红军改编为受中央政府指挥的八路军；而国民政府则准许中共在多个城市设办事处，在重庆发行中共的《新华日报》。虽然如此，实际上双方一开始就明争暗斗。延安方面不许政府的参谋官进入该地区，八路军虽然拿了国府的钱，却不接受其指挥。

当时的中国，分为三块地区，一是被日本占领的沦陷区，是各沿海大城市及沿铁路线的富庶地区；二是大后方，即西南部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府控制地区，又称自由中国；三是在沦陷区后方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控制区，又称陕甘宁边区。

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役，是在国府军队与日本军队之间展开的，例如，气壮山河的台儿庄大战就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中共按照毛泽东保存实力的方针，与日本人只有极少量的接触。象中共经常挂在嘴上的平型关战役其实只是规模很小的一场遭遇战。而中共将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事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其主要罪状就是消耗了中共的实力。当时，中共以延安为据点，以抗日为招牌，大肆招兵买马，吸引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到延安，动员农民，扩大地盘。在此期间，中共从 1937 年 4 万名党员，到 1945 年激增为 120 万，整整 30 倍之多！而军队则从 37 年的 9 万 2 千人增加到 45 年的 91 万人，也有整整 10 倍多！

当国府军队在主战场艰苦抗日的同时，毛泽东在这段时期，通过 1942-1944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思想整肃和改造。他所创造的一系列审查、批判、斗争、坦白乃至镇压……等群众洗脑措施，摧毁了被改造者的尊严和自信，扼杀了千千万万投奔中共的知识青年残存的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和民主理念，使之完全听命于党组织和毛泽东。这一套办法，开创了中共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基本模式。它完成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使命，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绝对权威地位。为抗战之后中共与国民党争夺政权，准备了人力基础和精神基础。

四十五、民主对法西斯的世界大战

在 1929 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后，民主国家受到严重挫折，而法西斯主义却日益猖獗。世界分裂为两大武装集团：一是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轴心国」，即法西斯国家阵营；另一个是由英国、法国与美国为首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同盟。在二者之间还有一个苏联，它封闭于世界市场之外，两大集团交替地与它结盟或孤立它。

希特勒德国的扩张主义最为明显和狂妄。它一步步向外进犯，先是夺回萨尔和重新武装莱茵兰，继而利用英国法国的绥靖政策和侥幸心理，在 1938 年兼并了奥地利，又通过慕尼黑协议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

1939 年，得寸进尺的希特勒，仗着 8 月刚与苏联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势头，终于于 9 月大举

侵犯波兰。英、法忍无可忍，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开战之初，希特勒运用闪电战横扫欧洲，1940 年征服丹麦、挪威，进而突破马其诺防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败了法国，并使英国军队蒙受敦克尔克海滩大溃败之耻辱。

但是英国并未屈服。希特勒为准备渡海攻打英国，先对英格兰发动了空中攻势，在开初蒙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后，为保卫民主而战的骄傲的英国人，终于顶住了希特勒的空袭，希特勒的空中攻势失败了。他不得不搁置进攻英国的计划。

斯大林在二战前夕与希特勒做交易，订了德苏条约，得到的报答是瓜分波兰东部、波罗的海北部沿岸各国和比萨拉比亚。芬兰曾进行反抗，但最后被苏军打败了。当斯大林正在为自己的高明算计得意忘形时，出乎他的意料，1941 年 6 月，希特勒在空袭英国受挫后，突然撕毁「德苏条约」，实施「巴巴罗萨」计划，挥师东进苏联，把斯大林打了个措手不及。

美国是在希特勒吞并捷克后才认真对付德国的。它虽然还未直接参战，但通过租借法案对艰苦战斗中的英国以巨大援助。

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事件才使美国全力投入了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战，并使战局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从战争开始直到 1942 年上半年，英美盟军在西太平洋与日本的较量全面受挫，进攻的态势和主动权基本上都操在轴心国手上。

但是 1942 年 6 月美日之间悲壮血腥的中途岛大战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基本形势。在此之前，日本一次未输；在此之后，日本一次未赢。

1942 年末，取得了主动权的盟军部队兵分四路，进攻日本。麦克阿瑟从南面挥师北上，发动两栖作战，由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到菲律宾，最后直逼冲绳岛。1943 年，尼米兹将军统帅太平洋战区部队发动了横越太平洋的一系列协同攻势，在莱特湾大战中取得辉煌胜利。英国与印度军队挡住了日军，并开始解放东南亚。而美国则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美国空军也开始从中国起飞去轰炸日本本土。到此时，日本已经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德国在进攻苏联之后，开始半年节节胜利，但是到冬季后，正象当年拿破仑军队被困于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一样，希特勒的进攻也严重受阻。随着英军在阿拉梅因的胜利，英美同盟军在北部非洲的登陆，以及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到 1942 年 11 月，德国已经丧失了战争的主控权。而到 43 年 2 月，当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的六个集团军被歼灭，以及北非全线失守，德军损失 25 万人之后，第三帝国的败局也已经显露出来了。

1944年6月，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开始了解放纳粹铁蹄下的欧洲的伟大进军，这是这场战争象征同盟国胜利的辉煌战役，是20世纪历史的伟大转折点。

从此，法西斯轴心国失败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四十六、战后秩序和冷战的肇始

1944年6月，英美盟军诺曼底登陆之后，轴心国家大势已去。随后的战争，虽然还有一些起伏曲折，但总体上已是同盟国军队节节推进，法西斯国家节节败退的格局了。

1945年1月，苏联向德国东部发起总攻。2月，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在雅尔塔开会，商议筹建联合国以及战后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分。罗斯福为了竭力争取苏联参加联合国，对斯大林作了极大让步，英美承认苏联在波兰的地位，并同意更改波兰边界以满足苏联。

1945年4月，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身亡，5月7日，邓尼兹海军上将代表纳粹德国向盟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东部战场，1945年3月之后，日本的大城市成了盟军地毯式轰炸的靶子。而英军和印度军队已开始解放东南亚了。1945年7月，美国科学家研制的秘密武器—原子弹已经完成，为给日本一个投降的机会，盟国同月发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投降，否则将面临毁灭，重申1943年《开罗宣言》原则：剥夺日本自1895年以来夺得的领土，解除日本的武装，盟军将联合占领日本，建立和平与负责的政府。日本没有回应。于是，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三天后，在长崎投下第二颗。次日凌晨，日本天皇在帝国会议上决定投降，一周之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接受了日本的投降。

至此，一场攸关人类命运的世界大战，以法西斯的彻底败亡而告结束。

但是，原子弹的蘑菇云还没有消散，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却已悄悄地降临到我们的星球上了。

这场「战争」就是冷战。即，以西方民主国家为一方同以共产党国家为一方的对抗，也被称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前者以美国为首，后者则听从苏联老大哥。

本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都强烈反对自由主义的核心——一个

人主义。前者以种族为效忠的集体，后者以阶级为效忠的集体。所以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共产国家则崇拜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但是，阴差阳错，由于希特勒在二战中背弃了他与斯大林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才迫使斯大林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抗击希特勒。这一结盟居然使得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多存活了几十年！

战后世界的新秩序，就是在上述冷战的气氛下确立的。实际上，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苏联与西方就已经通过交易各自分得了地盘和势力范围。譬如，德国被一劈为四，即：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的四个占领区。实际上后来是两个占领区：苏军占领的东德和西方占领的西德(西德在 1955 年后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以及与此平行的两个柏林——东柏林与西柏林。东欧的一些国家,例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由于是苏军把占领在那里的德国军队赶走，因此，他们在政治地图上就成了苏联的卫星国。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就是这样形成的。

冷战时期的最大特征就是两大军事集团——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方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对峙，并因此爆发过好几次重大的危机。

于是，在战胜了法西斯之后，共产主义成了民主国家的最主要威胁。

四十七、二战后中国的宪政实验

在战胜了法西斯之后，共产主义成了宪政民主制度的最主要威胁。但是，除了丘吉尔等富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外，大多数人的政治方向迷茫,并未深刻意识到这一威胁。中国当时的战后情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政治与军事斗争立即成为中国国内的首要问题，也是美国等西方盟国关注的焦点。毛泽东于 1945 年 8 月 28 日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之邀到重庆，两党代表多次商谈，于 10 月 10 日发表会谈纪要——国共双十协定。双方同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为达成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中共当时力倡由国共两方面与其他独立人士组成「联合政府」，不必经过党派竞争的选举。美国人为防止中国内战，也基本支持这一想法。虽然国共双方暗中积极备战，但在表面上，国共双方都拥护这一主张。于是，在美国总统派遣的马歇尔特使的调停下，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正式开幕。

政协会议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最重要规模最大且最具关键性的一次会议。经过讨价还价，参加政协的代表为：国民党 8 人，中共 7 人，民盟 9 人，青年党 5 人，无党派人士 9 人。上述 5 种政治团体，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集团势力：一个以国民党为首，包括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中亲国民党者，如傅斯年、王云五等；另一个以中共为首，包括民盟及无党派人士中亲中共者。

1946年1月31日，通过激烈的争辩和交易，政协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等五项政协决议，这是政协会议的重大成就，也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调停国共双方冲突的重大成就。

其中宪法草案案就是政协会议修改五五宪草的12项原则。在如何修改宪草上国共两党有重要分歧，但分歧大部分还属于技术问题；况且，既然国民大会的组织是完全按照国共两党在政协通过的国民大会案处理的，则任何一方，包括国共，都应当接受国民代表大会对宪草的可能修改。

政协之后的宪草修改，国共两党分别由王世杰和周恩来通过蒋介石邀请宪法专家、非国非共的张君勱先生执笔。

宪草审议推定 孙科、王宠惠、张君勱、王云五、陈启天、吴经熊、周恩来七人为起草小组，张君勱先生执笔。写成的宪法草案，交给宪草审议委员会讨论。

其中另一重大成果是关于军事问题案上所取得的进展。众所共知，当时，国共双方对“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强调秩序是不同的。国民党强调“军队国家化”，而共产党则强调“政治民主化”。二者有明显的政党利益动机。但是，在马歇尔将军的大力干预下，双方终于达成了“军队整编寄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并于1946年2月25日由国共双方代表和马歇尔一起签了字。马歇尔称这一协定是所有协定中最出色的。

看来，二战后的中国，似乎看得见一缕宪政民主的曙光了。

四十八、国共谈判破裂与中国内战爆发

上一讲已经谈到，在马歇尔将军努力斡旋下，1946年一月召开的政协达成了五项决议，似乎和平民主宪政的中国已隐然在望了。但历史的进展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破灭了。

世纪上，国共两党尽管在美国调停下握手谈判，但内部都坚决相信，只有战场上的结果才能解决问题，双方都在积极备战，这使美国与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方势力极度失望。

在政协之后的制宪过程中，由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理念相差很大，导致众多摩擦与纠纷。另外因为国民党内许多人主张应采孙中山理念的「五五宪草」，因此必须透过不断的沟通、协商，最后才将两份宪草加以调和。张君勱多次坚决抵制来自双方的压力，有时甚至不惜退席抗争，以伸张自己的宪法理念。当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开会时，张君勱很快便提出一份草案供讨论。因此，有史家称「中华民国宪法」是张君勱「一人之宪法」。张君勱也以美国的汉弥尔顿、麦迪逊自诩，而隐然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1946年的宪法，通过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的沟通、妥协，终于在1946年年底产生。从最后的宪法条文看，除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包括共产党在原则与条文上的主张都基本采纳了。因此，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参加了1946年的制宪是一个历史事实。虽然共产党和民盟最后退出国大，没有履行最后一步的批准程序，但从它以及其它各方参与的程度看，那仍然是一次基本符合宪政主义原则的制宪，是广泛政治参与的产物。

但是，由于当时国共双方互不信任，不能以正常心态看待对方，缺乏诚意。因此，双方最后在如何通向多党政治的宪政体系问题上吵翻了。对于当时的分歧，共产党主张用政治解决，而国民党则主张法律解决。中共当时大打民主牌，其代表口口声声宣称：「在中国一党专政是行不通的，中国只应实现多党政治。」大肆抨击国民党对于言论、新闻和出版的限制，同时对在野的民盟等党派大施统战手法，赢得了相当部分知识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同情。（只是到了中共掌权后，民盟等党派才懂得了：「在国民党那里，自由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那里，自由则是有无的问题。」但到那时已经太晚了。）而当时国民党由于政权在手，也显得胸襟狭小，心态保守，不敢作出更多的让步；迷信武力，并且漠视蔑视第三势力，以至丧失了国际国内的全力支持。当时，国民党错误估计形势，迷信美国会全力支持。而共产党则背靠苏联。双方都有恃无恐。最后，僵持的结果就是全面内战的爆发。

调解失败，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1月8日离开中国。临行前，它遗憾地声明：“和平的最大障碍，阙为国共双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对。……在国民政府实际上亦即国民党方面，……对于我促成真正联合政府的努力，几乎无不加以反对。……在中共方面，则不惜任何激烈手段以求达到其目的。……中共手段中既有害极煽动性方面则为宣传文字，……已经全然不顾真相和事实经过，……欺骗中国及世界人民。”“国民大会已经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不幸共产党未能认可参与此次大会，而该会通过的宪法，则似已包括中共所要求的各个主要事项在内。”

就这样，一场血腥的战争，使刚刚通过的一部具有合法性和民意基础的宪法，失去了在中国大陆施行的可能。

一个重要的实施宪政的历史机会，又从中国人的身边滑过了。

四十九、战后日本的民主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经济和政治上复兴最快的国家，在西方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在东方，则是日本。这两个国家是主要的战败国，战前都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战败之后，都被盟军占领，战犯被国际法庭审判，它们战前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恶性肿瘤经过了外科手术式的割除，国家体制被强行进行了非军国主义改造和民主重建，并制定了和平宪法，声言永不武装。其政治体制经过了民主改造后，战前的法西斯独裁因素得到消除。

在日本，盟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施行了一项有战略眼光的政策，虽然他知道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

有基本责任，但是，为了稳健顺利地实现民主过渡，他仍然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在最低限度上维持一部分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从而以真正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方式，在日本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德国和日本尽管都是战败国，但是战争破坏的程度、原有管理体制保存的程度有所不同。在日本，原有体系的大框架没有被破坏。麦克阿瑟除了保留天皇制外，同时还取消了陆军部和海军部遣散 600 多万日本旧军人的计划，迅速安定了军心。因为天皇制一旦崩溃，日本人的社会必将激烈动荡，而一旦造反起来，就需要增加 100 万占领军进行弹压，而且还会与日本人结下世代代的深仇大恨。

麦克阿瑟的做法是：让天皇任命一位亲英美的外交元老组建临时内阁，负责安排诸如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改革民事和司法管理和起草新宪法等过渡事宜。到 1946 年 4 月，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新宪法就出台了。依照新宪法，日本举行了选举，逐步走上了追随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道路。

在战后的上述政治进程中，日本建立了大体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和新闻自由，并大幅减少了其军费开支，从而促进了日本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

日本的政党政治虽然也有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但与西方典型的两党制和多党制有所不同，它被称为“一党独大制度”，即，日本自民党一直赢得国会中大部分议席，该党从 1955 年至 1993 年一直执政。其他在野党无法挑战其地位。该体制又被称为“五五年体制”。主要的政治竞争发生在自民党内部，自民党内部派系间的更迭和平衡取代了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和政权交替，与之形成意识形态对立的革新政党被置于长期在野地位。在自民党垄断政权的一极与群星般散在的大小在野党之间，表现出一种制度性的“一极多元”，形式上有多党竞争，原则上各党都有执政可能。但在日本，事实上只一个处于绝对优势的政党独擅国家政权的特殊状态，正是 1955 年至 1993 年中长达 38 年日本政党制度的基本模式。

日本因为实施市场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动荡国际格局下，在历史的夹缝中，日本人卧薪尝胆，渔翁得利，大发战争财，获得了经济的奇迹般的起飞。这一系列战后的正面发展，同日本国民教育程度较高、基本素质高、以及人口构成简单有很大的关系；另一个原因，也是由于整个管理系统没有遭到破坏，从而无需从头开始，无需在废墟上建设有关。

五十、战后德国的民主重建

二战后，德国民族面对的是一个彻底战败的、被占领的国家，接受的是纳粹政权以人民的名义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累累暴行，承受的是精神空虚、麻木和物质巨大损失的苦难。

在德国，整个国家被炸成焦土，所有民事和司法系统均不复存在，所有的官员都是纳粹分子，无法启用，一切都要占领军亲自去办，几乎所有的村庄和街道都由占领军官兵管理。相对于美国在日本的间接占领和间接改造，盟军对德国的占领和重建是直接的，因此费时 4 年之多，直到 1949 年，东、西德才相继产生了议会。这其中当然还有美苏英法分区占领的因素。

1946年,阿登纳当选为二战后的联邦第一任总理,他把管理国内经济的权力交给了经济部长艾哈德教授(艾哈德制定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为50年代末的联邦带来“经济奇迹”),自己则腾出精力处理政治,尤其是外交事务。1951年,美、法、英等占领国决定把外交事务权力移交给联邦,同意其设立外交部,由阿登纳亲自兼外交部长;1953年,阿登纳首访美国获得成功,回国时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1955年,占领法规结束,联邦开始享有主权,同年联邦加入北约。

德国的政治文化重建是德国全民族对战争的反省和忏悔同步的。基督教传统深厚的德国,对纳粹的兴起,对犹太人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对其他国家的战争摧残,都有至深的内疚。这样一种全民的忏悔,对预防德国重蹈覆辙,对战后德国重建为一个重视法治,保障基本人权的国度,有一种精神性的奠基功能。

短短几年间,联邦德国不但摆脱了战败国地位,获得独立的主权,而且与美、英等国一道,共同担负防卫欧洲的重任,1957年,联邦的国有和法、意、荷、比、卢等国在罗马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建立六国共同市场,迈出了欧洲统一的第一步。

以1955年为界,西方三国结束了对联邦德国的占领,从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它在1952年加入了欧洲煤钢联营,在1955年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凭借自身历史上的工业基础和法治精神,很快就重建为一个工业民主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中重要的一员。

另外,在战后的其他一些国家,例如欧洲的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都进行了民主建国,亚洲的印度也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民主制度,从而形成了二战后的民主浪潮。

五十一、 柏林危机(1948-1949)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由于苏联占领了一部分东欧国家以及东德,斯大林迅速封锁了这些国家的边界,隔绝了这些国家人民与外界的联系,降下了红色的「铁幕」,从而引发了与西方国家的长期对峙和冷战。

这里处于前线的是柏林。柏林在东德境内,但它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属于东德;另一部分是西方管辖的西柏林,属于联邦;同一城市分割为二,二者实行完全不同的制度,而这个大城市本身又在苏占区的包围之下。苏占区实行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党-国”制度,并发行有自己的货币。而在西方占领区的西柏林,实行的是一套完全不同于共产主义的民主制度。因此,西柏林这块“自由的飞地”能否长期存在,就成了冷战的最前沿的问题和东西方较量的关键,也成了两种制度优劣对比的符号象征。

苏联当然处心积虑地想消除西柏林这一块心病。于是,在1948年6月24日,苏联占领当局突然断绝了西

柏林与外界的所有陆路水路交通，企图断绝西柏林人民的生路，迫使他们向苏联归降。这就是说，西柏林从陆地上被全面封锁了。

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切断了盟军经由东德领土出入西柏林的所有通道，包括公路、水路和地下铁路，使一个依靠东德的地面通道与西方经济联系从而得以运转的西柏林，立即变成了一块死地。

全球的目光投向西柏林，焦虑地关注着西方盟国的反应。

两天之后，答案揭晓：空运！西方从空中破除苏联的陆地封锁。

英美两国联合行动，以空中运输的方式，从外部向西柏林输送食物、衣物、燃料以及一切所需的生活物资。这一举措，既未让西柏林奄奄一息，束手待毙；也未直接在陆地突破封锁，与苏军交火；而是另辟蹊径，从天而降。

这一决策，勇敢而富于创意。同时，也承担了重大的风险。因为空运必须经过东德领空，有可能遭致苏联空军的攻击或阻挠，是一次勇气和实力的较量。这一设想是由美国驻西德的军事指挥官克莱提出的。

苏联慑于西方工业国家的强大实力，没有敢拦截空运。

于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空中运输走廊出现了！西方盟国为了捍卫西柏林人民的自由与生存，每天向西柏林人民空运大量食品与其他人道主义急需品，构成了人类航空史上空前壮观而感人的景象。从西德法兰克福机场到西柏林的空中，有5层飞行路线，同时并用。每层飞行路线之间的距离，只有500英尺。在运输高峰期，西柏林上空昼夜24小时，飞机声轰鸣不断，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降落。空运的高峰时期，每天运输总量达12000吨，比封锁前的地面快递运输量还要大。至1949年5月苏联面对西方的决心而承认失败，封锁终于解除之时，美国与英国的飞机总计已向西柏林人民空投了150多万吨重的物资！

试设想，一个大城市人口所需的所有物资，完全靠它上空滚动着的一条黑压压的空中补给线来维系，而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乎一年之久！如果这不是奇迹，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动人更壮观的奇迹了。

1949年5月，苏联面对宪政民主国家不可摧毁的维护自由的意志，屈服了，斯大林终于解除了西柏林的地面封锁。这一次柏林危机预示了东西方冷战对抗的基本模式与结局。

柏林危机的解决为宪政民主国家注入了对抗共产制度的信心。而东西德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明显差距更表明了共产党东德的失败。1953年，东柏林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方式举行了著名的起义，起

义很快扩展到了东德其他地区，但后来被苏军和东德警察残酷镇压下去了。为了阻止东德人民如潮水般涌向西柏林和西德，1961年8月13日，东德警察在一夜之间突然修起了一座高墙，划开了东西柏林，阻隔开了专制与自由两个世界，成为20世纪象征共产主义失败与丑恶的重要标志。

五十二、战后中国内战

如果把目光从欧洲转向东亚，战后情势是很不一样的。前已说到，国民党由于相信自己的武力，不愿让步；而共产党则背靠苏联，也获得一些日军在东北投降时的装备，同样有恃无恐。因此，尽管有美国调停以及民众反对内战，但全面内战还是爆发了。

很多人都难于理解，在中国内战之初，国民政府的兵力至少是共产党军队的两倍，并且有较为先进的美式装备，大都市和大部分领土也在它的掌握之中，何以经过三年多血战之后，国民党竟然丢掉了大陆？

答案是各色各样的，不过基本上不超出如下几点：

- 1)军事方面——国军战略的错误；以及苏联在东北对共军的全力支持。
- 2)经济方面——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导致极高的通货膨胀，半年之内物价竟上涨8万5千倍！穷富各阶层都遭到空前剥夺。
- 3)政治方面——政府对民众反内战的呼声和运动一律镇压、视之为共产党的阴谋，完全不顾其中民意的真实成分，并且使外界看来似乎国府比共产党更倾向于开战。而对原来日本占领区的人民抱有成见与疑虑，一律施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再教育，破坏了国民团结认同的向心力；加以对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等人深怀戒备，从而失去了知识界的人心。
- 4)国际外交方面，由于英美法等国家在战后都把焦点放在欧洲，特别是柏林危机的持续，使西方强国无暇东顾，而中共军队则获得苏联的切实军事援助。
- 5)宣传方面——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赢得了想自己分有一块土地的大批农村贫苦农民支持与入伍。在城市，中共则以「反独裁，要民主，争自由」为号召，竭力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堕落，尖锐抨击国民党侵犯人权，拉拢知识界和第三势力，声称自己要民主建国。事实上，当时国民党虽然专制，但是它还没有滴水不漏地控制社会控制新闻。因此，它干的坏事都被中共报刊和其他半独立的新闻界、外国记者透露了出来，而它的特务系统，常常给它帮倒忙，弄出不少丑闻和公开的劣迹。因此，当时国民党的形象之糟，一半是由于它腐败专制，另一半又是因为它没有做到真正彻底的极权专制，没有如中共后来那样控制一切新闻资讯所造成的。

当时，只有极少极少的自由派人士认识到，「在国民党那里，自由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那里，自由则是有无的问题。」但后来当他们认识到这点后，已经迟了，他们已经没有公开的渠道表达这一点了。

当然，失败首先还是在军事上。蒋介石先生以占领土地、尤其是占领大城市为第一优先，以便显示自己已经掌控全中国的印象，但因此却犯了把战线拉得太长的兵家大忌。另外，他只要美国的武器军援，而不要美军的专业顾问。例如，不要把战线拉得太长，放手让前线将领自己决定战术，就都是顾问们的建议，然而蒋先生并未采纳。而毛泽东先生则更注重军队有生力量的获得与损失。他通过迂回运动，使共军只在享有绝对力量优势时才与国军决战。于是，在反复拉锯战过程中，国军力量日益缩小，共军人数则在不断上升。

此外，中共的优势是在北方，尤其是苏军击败日本后占领的东北，它竭力发挥了这一优势。当时，有狂热精神的华北中共干部进入东北，实施地方生产整顿、思想灌输、土地改革、新干部思想改造、运用社会宣传操纵技术征招兵员。东北人久受日本欺凌，听到中共的民族主义与土地改革口号后，多数表示认同和支持。国民党不重用东北本地人，而它从华南派到东北的官员，又作威作福，不得人心。因此，国军得不到当地情报，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借动员乡下老百姓而赢得了东北。

以后国共之间的那几场著名的大战役，是东北战场林彪胜利的延续；特别是邓小平指挥的淮海大战，奠定了中共军事胜利的基础。

1949年，蒋介石率领剩下的政府官员、军队以及中华民国的法统，败退到了台湾；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以胜利者的姿态取消中华民国称号，宣布中共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两个政权对峙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

五十三、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冷战降临后第一场西方民主国家对抗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西方国家与苏联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划分已经大体尘埃落定。在朝鲜半岛，北部由共产党统治，南部则是大韩民国，与西方国家联系紧密。双方以北纬38度线为界。1950年，北韓共产党金日成企图用武力打破这一划分，把南北韩统一为共产朝鲜。他错误判断了大国的意向、国际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实力，执意发动战争，横扫南韩。斯大林开初犹豫，但在金日成信誓旦旦战必速胜保证下，在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把朝鲜排除在美国关注的区域这一信息误导下，经不起巨大战略利益的诱惑，终于同意了金的冒险。

刚刚在中国夺得政权的毛泽东，为争取苏联援助，为消除斯大林对他闹独立的担心，一开始就宣布他的外

交是“一边倒”，唯斯大林马首是瞻，所以表态支持金日成南犯，并希望苏联出钱出军火，只是要求斯大林在金拿下南朝鲜后，苏联再回头帮助他解决台湾问题。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有恃无恐的金日成发动突然袭击，挥军跨过38线。同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北韩侵略。三天之后，南韩首都汉城就沦陷了。

韩战爆发，联合国谴责北韩，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立即发表“台湾中立化方针”的声明，为防堵共产主义蔓延，并派遣第七舰队于6月28日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隔开了海峡两岸的武装力量，防止了毛泽东渡海吞并台湾。

八月初，在准备充分的北韩军队的凌厉攻势下，南韩的领土只剩下十分之一。北朝鲜的宣传机器已经迫不及待地敲起长鼓，以庆祝“解放南韩，统一祖国”了。

但是，北韩庆祝得早了一点。1950年九月十五日凌晨，风云突变。获得安理会6月27日反侵略决议案授权的联合国军队，在二战英雄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于南韩仁川登陆，随即迅速对北韩侵略军实施分割、包围，使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联合国军并乘势迅速挥师北上。

此时，金日成惊恐万状，急急向苏、中求援，他修书向毛泽东曰：“毛泽东同志：……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敌人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当时中共由于刚建政不足一年，百废待举，高层大多不同意出兵朝鲜。但毛以中朝“唇亡齿寒”，美军可能进入中国东北为由，执意要出兵。（但后来解密档案证明，他的这一致命的判断是错误的。）出兵前夕，中共突然又面临斯大林毁约——推翻原来所说的以空军支援中共军队的承诺的情况下——毛仍执意出兵。于是，在毛独断意志的强力主宰下，中共军队于1950年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卷入韩战，以人海战术，以中国无数年轻士兵的血肉之躯，去对抗联合国军，以救援在军事上正在失败的北韩部队。

金日成、斯大林发动韩战的最后结果，是交战双方在三年多后仍然回到金日成南犯之前的三八线两侧，双方领土毫无增减；然而，这一荒唐的毫无结果毫无必要的战争，却使各方都付出了无数生命和财产的代价，并强化了全球的冷战对峙气氛，东西方对抗的格局由于朝鲜战争的发生而日益壁垒森严，并走向了极端化。1954年，美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成为冷战中「围堵」政策的一部分，稳定了台海两岸的局势。

因此，朝鲜战争对朝鲜、中国，甚至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东亚的基本格局，其影响都是巨大的。

五十四、中国“党-国”体制的形成

毛泽东用武力夺得中国大陆政权后，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任何实行独立的外交路线的空间。但是由于意识形

态与苏联的内在一致性、由于在内战中得到苏联支援，特别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共完全倒向了苏联一边。

在内部政治方面，本来，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的高度通货膨胀与社会不满之后，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民族主义许诺和鼓动下，大多数民众对新统治者中共是充满了期待的。而开初中共的表现，由于军队纪律相对森严，并雷厉风行地打击娼妓和盗窃等社会弊端，同时，也仿效苏联，订立了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似乎也确实显示了一些新气象。

但逐渐地，随中共政策方针的逐步出台，如水银泄地如天罗地网般控制社会的中共统治方式慢慢地使人们产生了某种莫名的恐惧感。

建政不久，中共就开展了一系列运动：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财产)、「镇压反革命」(镇反)、「肃清反革命」(肃反)、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交心运动、批判胡适、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等等，通过这些运动，中共已经系统地控制和操纵了社会各阶层，制定了统一的模式，指定了统一的思想方式，形成了某种肃杀的定于一尊的气氛，奠定了中共极权统治的基础。

独立的新闻媒体逐步被取消了，所有报刊杂志都成了共产“党的喉舌”。大学及其他教育科研机构一步步落入军管会以及之后的共产党党委的管辖下，甚至连街道也被中共派人管理了起来，监视着居民的一切行为。可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没有共产党的触角伸不到的角落。

毛泽东按照他的意识形态原则，在中国这个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了清理和重新组织。中国原有的民间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消失了，而以党为中心的「党-国」体系象一个巨大无边的蜘蛛网，笼罩了一切。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消灭了中层的结构，消除了大小形形色色的中间组织，只剩下一个单一的控制中心全权独揽。“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社会已经不存在了。

毛泽东利用垂直性的各级政权机构，特别是富于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的“单位制”、“公社制”和“户口制”，“一杆子插到底”地包管了中国的广袤疆域和庞大人口。其严酷程度，可谓「空前绝后」。

这种控制，建政之初主要是通过“单位制”及“户口制”进行的；1958年之后，在农村，则通过“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态进行控制。

中国大陆的“单位”与一般国家的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是很不相同的。它实质上是政权体系的延伸，它对于在职或退休职工及其家属进行的包管和监控，从经济、政治、思想灌输、行为管束、道德训导、文化教育、婚姻、生老病死，包罗万象，无所不至。它是代表国家机器垂直监控个人的最基本的执行机构。在毛时代，国家的意志，实际上就是各个单位的意志。

中共发明的“户口制”，则是政权对全社会所有人口进行监督、限制和划分等级的对于“单位制”的补充性体制。特别是，“户口制”对中国人口作了等级森严的划分，划为“农村户口”(非商品粮户口)和“城市户口”(商品粮户口)两大类，二者几乎是世袭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农民实际上成了现代中国的“贱民”，受到严重的盘剥，其地位十分卑下，且世代没有指望。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缺乏自由的现象，已经为后来的“文革”式大动荡准备了精神和社会条件。

五十五、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

毛泽东建立政权后，除了前面我讲过如天罗地网一样的统治结构外，在统治方式上，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以「运动」来巩固政权，建立效忠机制。建国的最初三年在国内有「三大运动」：1) 土改 2) 镇压反革命 3) 三反五反。这三大运动皆以蔑视法治、侵犯人权为特征，因而与现正背道而驰。

我们先看看「土改」，它是土地改革的简称，是建政初年中共在农村推行的运动。

其实，中共自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为其中心政策。只要占有地盘必实行「土改」，在江西苏区时期便是如此。一九二九年秋毛泽东写过一首词《清平乐》，最后两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描写土改的。

共产党夺得政权后，土改的目的是给所有农村人口划分阶级地位，除了意识形态的要求外，主要是为了分而治之，便于统治。其基本目标是，打倒地主富农，让贫雇农翻身。中共派工作队进入农村，组织农民去斗争地主，消灭地主。

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群众控诉，公开审判，随意处死，造成一片恐怖气氛。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不是夸大。依各种不同的估算，死人应在几百万至一千万之间。

中共在土改时期所用的残酷手法，今日六十岁以下的人听来都很难相信，甚至以为是天方夜谭。但确实大量的材料和亲见亲闻之事实，证实了那种残忍与血腥。

本来土地改革只要通过有价收购的和平手段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实行土改，其前提是侵犯和否定原有的财产权，并把财产拥有者视作罪人，是彻底剥夺地主富农的人格尊严乃至生命。

当时为了杀人，每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士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霸」

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赈济大陆水灾，捐款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但「三霸」都是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

土改期间最拿手好戏是斗争会。在每一个乡村、集镇集合全体百姓斗争中共所架出来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这个地主曾经剥削、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但老百姓实在说不出曾被地主剥削了甚么？有一件典型事件当时传遍北方各省，一个老百姓被共产党干部逼急了，说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个鸡蛋没有给钱。」行了，那位干部抓住这项证据，当众算帐，这一个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这只小鸡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鸡，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一笔账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乾淨等候「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

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干部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甚么罪？」下面安排好的干部大喊：「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出头斗争的无知青年想不到会有这样结果，所斗死的人皆是邻里亲戚，有些地方甚至发动兄弟相斗，儿子斗老子。

同时，土改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内战时期还成为招兵的重要手段。因为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人的「英雄」便成了过街老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撤退，这些人就只有「参军」死心塌地跟著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中共干部中流行一种口号「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共产党这种办法十足是水浒传逼上梁上的翻版。

中共在其建国初年的「土改」，是一次大规模侵犯人权、特别是财产权和生命权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为后来中共侵犯人权的一系列运动开了先河。

五十六、中共的镇反运动

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二大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它更是一场连最低标准的司法程序都缺乏的大规模人权侵犯。

对于镇反，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从一九五〇年「双十指示」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结束，长达三年。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张旗鼓而迅速捕杀，第二阶段是五一年五月收缩范围，第三阶段则是五二年的深入调查。镇压的对象是所谓五个方面：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俗称「社会上的反革命」。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个字，即处决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

无可否认，五方面对象中是有一些恶霸和以流血暴力反抗新政权的份子，但更多的是所谓「反动党团骨干」等并无现行反抗活动的份子。即，原来政权的官员，主要是中低级官员。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

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基层没有半点实力，留著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这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

究竟镇压了多少人？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透露过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年有四百万人被处死（这当然不只是镇反的杀人数）。国外的估计则数百万到两千万都有。美国专家倾向于有二百多万人。

大规模的滥杀行为是该运动的最大弊端。当时，借助抗美援朝所形成的类似战时气氛，只要当地领导人点头，「群众」说该杀，或现场负责人认为该杀，就格杀勿论。那个时代活过来的人都记得每个县都有杀人场，三天两头开完大会，就成批地拉去枪决。

被镇压者中很多只具敌对阵营身份，而无敌对行为，他们实际上处于「俘虏」地位。镇压他们，是一种阶级报复心理表现。红色政权要向全社会显示暴力专政的淫威，制造有利于统治的恐怖环境。

中共宣传说镇反中杀的是民愤极大的恶霸。这种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依靠群众狂热镇反的做法明显存在如下问题：

1)所谓群众镇反，实质仍是中共镇反。中共定了目标，宣传机器一宣传，群众一哄而上，实际上是利用群众肃清政敌的手段而已。

2)以法治观点看，任何罪犯的处理，都是极为专业的工作，绝非群众运动可为。

3)所谓镇压反革命，实质乃是一块国共斗争的挡箭牌，以人民的名义报党派之私仇。

中共也许只有一个辩护角度可以迷惑一些人：五十年代初的镇反，属于革命暴风雨时期的行为，过火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事实上，镇反时期，中共政权及社会安定并无明显危机，肃清土匪恶霸及残余敌对活动都在有效地进行（五〇年至五二年中共以一百三十九个师兵力，消灭土匪二百七十万人）。

中共发动大规模群众镇反运动，涉及的乃是它漫长征途中一个根本性问题，造反导致内战的成功令他们迷信群众动员之力，而不知法治为何物。不言而喻，由于镇反模式被毛定为一尊，其后在城市地区发展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更趋恶化，从而使 1949 年后，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严重地退化了。

五十七、三反五反运动在中国

三反五反是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三大运动。它们本来是两个运动。后来人们因为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它本来是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是希望在执政初期建立一个自己的行政系统。过去的旧官僚系统显然不能相信，旧人不能掌权，必须从重要岗位上拉下来，换上中共自己的人，从而使行政系统彻底中共化。

但是，大批中共的干部们过去在山沟里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这下进城当了官，接触了花花世界，眼界大开，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该的，于是吃喝玩乐尽情享乐。同时，大批大批地把过去的结发妻子-「黄脸婆」休掉，换上洋学生「爱人」，人称「换妻运动」。更要命的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想，这还得了，这不重复当年李自成进京的故事了！于是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针对共产党干部。而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干部被判了罪。

但是搞「三反」过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乾淨，为甚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了资本家的毒，归根究底罪在资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资本家的毒素，于是在 1952 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1953 年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为第一目标，为害最烈，上海商人得祸也最惨。中共作家周而复写的小说《上海的早晨》就是描写这场运动的。虽然他为中共护短已算呕心沥血，可悲的是，他自己晚年在邓小平时代仍被中共抓住出国时的资产阶级腐化(嫖妓)作风而遭到整肃。

毛泽东所定下的「五反」范围，等于土改时的「三霸」，任何人都逃不掉。如，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的商人。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是自杀，为甚么不跳黄浦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

在「五反运动」中，中共实行和强化了一种揭发和告密的人人自危的方法。即：先是动员大家主动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并宣布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充分利用人们的恐惧和过关心理，利用人性中恶的阴暗的一面，使人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或出于邀功请赏，而揭发陷害他人，作出一些卑鄙下作之事。这种官方怂恿的告密和揭发的普遍化，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中共的三反五反运动，制造了空前的恐怖气氛，使人人丧失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进一步剥夺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五十八、共产党在中国知识界的洗脑运动

前面我们讲了中共建国初期开展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这三大运动，这些运动都是有特殊内容和具体时间限制的。这里要讲的，则是常规性的无时间限制的，就是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即「洗脑」。当然在这种经常性的洗脑中，时时也插入一些具体的有时间限制的小运动，如：交心运动、批判胡适、批判武训、批判红学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它们是对中国宪政民主的精神资源和载体的摧毁。

大家知道，在 1949 年以前，中国的知识阶层，除了追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左右两翼以外，还有一批人是所谓「第三势力」，他们大部分是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对国共两党都持批评态度，是对民主宪政最为渴求的一批中国人，即毛泽东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例如，当时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的特约撰稿人，著名的如胡适、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等。这些人当时批评国民党专制都很激烈，为什么后来留在大陆的都失去了独立性和锋芒，没有声音了呢？

这就涉及中共的体制。它的极权统治比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严酷和有效得多。

首先是在经济基础上。过去批评国民党，损失常常不过就是当不成官，不受政权青睐而已，但你还有退路，你可以当记者，甚至报纸被封了你还可以到私立大学、中学、小学去教书，还可以到私人企业去当职员，甚至还可以象陶渊明一样，靠老家的几亩薄田维生，「不为五斗米折腰」。

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你的一切生计都捏在它手里。你想当陶渊明？没门！你家的田地 in 土改中已经被没收，你回去就是地主，只有挨斗的份；你要经商摆个小摊，不行，资本家是要被逐步消灭的对象。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凭一技之长谋生，只有向党政机关、学校、国营工厂、企业商店求职，但所有这些单位全都是共产党控制的。真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当时全国只有一个大「老板」，就是共产党，别无分店。除了服从中共或者饿死之外，别无选择。因此，为了五斗米，所有人都得折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在这种体制下，过去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怎么还可能发出独立的

声音呢？当然，接受洗脑就是唯一出路了。

中共的洗脑，第一个方法是所谓「政治学习」。无论哪个单位，所有员工都得参加这种政治学习，内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具体包括官方统一的社会发展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各次政治运动发下来的文件和党报社论。政治学习不分文化程度，不管是教授还是清洁工，都是同样的材料与学习方式。由于这一强制性的学习，无休止的灌输，鹦鹉学舌，众口一词，长期的重复与积累之后，人们的思想逐步僵化，被一种官方语言所支配，成了一台留声机，对任何事物都有一套社论语言应对，陈词滥调，千篇一律。学习的后期阶段往往是批判自己过去的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实际上就是丧失自我，消灭自我。

洗脑的第二个方法是使告密、揭发合法化，并建立整人害人的「档案制度」。

告密即中共所说的「向组织汇报」，为了控制每个人，它鼓励人们互相告密，互相揭发，利用人性的弱点，利用人的求生和向上爬的本能，鼓励他们定期「打小报告」，揭发他人的言行乃至私生活，使这些人几乎成了专业密探，无孔不入，如影随形。这些「小报告」往往断章取义，甚至歪曲捏造，而单位领导常常不经对证，实行「有罪推定」，把这些材料装进人事部门的个人档案袋中，跟随你一辈子。你的入学、求职、升迁、工作调动，都与此紧密相关。而你自己一辈子都看不到它，不知道你的档案里装了些什么「黑材料」！有些人一辈子不顺、挨整，至死搞不清原因，原来是档案中的一条告密毁了他一生！

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最严酷的特务政治，而中国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人权保障离它已经越来越远了。

五十九、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前面我们曾经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的冷战随即开始。在 1945 年 7-8 月的波茨坦会议后，斯大林决心强化对东欧的共产主义控制。于是，从 1947 年到 1948 年 2 月，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落入苏联的掌控之中，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一个以莫斯科为最高指挥核心的政治军事的共产主义“神圣同盟”——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了。

但是，暴君尽管掌握有绝对的政治军事权力，但却无法抗拒自然的力量。1953 年 3 月 5 日晚上 9 时 50 分，超级红色沙皇斯大林停止了呼吸。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最高当局经过迅速处决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实行了一段短期的集体领导。随后，经历一场尖锐巧妙的权力斗争，带有某种旧的斯大林主义色彩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失败，而具有一定革新倾向的赫鲁晓夫，通过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的某种反叛，通过与二战英雄的元帅们和中央委员会结盟，脱颖而出，成为权力中枢。

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获得最高权力后，赫鲁晓夫开始向斯大林留下的帝国挑战了。他的第一个战役，便是 1956 年 2 月 24 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

紧接着，赫鲁晓夫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他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 1935—1955 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到 1956 年 8 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

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虽然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消除控制了社会的、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机构，但至少在除掉贝利亚之后，秘密警察对党和军队的控制削弱了，而在大规模的平反运动中看到了野蛮的政治恐怖后，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使秘密警察不敢越轨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同样，在处决贝利亚和大规模平反之后，“人们才开始过另一种生活，才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对政府委员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就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解冻”时期，它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六十、1956 年匈牙利革命

赫鲁晓夫的“解冻”努力，必定也要在外交领域反映出来。1955 年 5 月，苏联改变斯大林时期的方针，与持独立立场的南斯拉夫领袖铁托的重新和好。这就导致了东欧国家的某种宽松的政治气氛。

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先是在波兰，1956 年 3 月，原来被打成铁托分子的哥穆尔卡及其同伴获得平反，大批占据领导层的斯大林主义者被迫辞职。新闻界与民众获得了公开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于是，1956 年 6 月，在波兹南市，成千上万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工，要求面包、自由以及终结苏联的支配。10 月 19 日，波兰联合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决定结束苏联控制。会议期间，苏共头目赫鲁晓夫带了六人从莫斯科飞抵波兰，要求把亲苏的波兰党与军队的头目保留在政治局中。但是，波兰党蔑视苏俄压力，开除了亲苏头目，并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领袖。（后来哥穆尔卡以保留苏驻军为条件同莫斯科达成了妥协，延续了温和政策的生命）。

在东欧的那些传统的欧洲国家内部，由于本国土地上驻有外国苏联的军队，丧失独立主权，变成苏联的附庸；没有民主自由，变成极权政体，因此社会上一直怀有强烈的不满和抗拒情绪。例如在匈牙利，就有诗人和作家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知识界与民众的上述情绪。

在波兰上述成就的鼓舞下，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从 10 月 21 日开始，爆发了大规模学生与工人的示威，呼吁威望很高的纳吉(Imre Nagy)上台组织政府，并强烈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10 月 23 日，原共党头目请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军出面恢复秩序，于是，苏军在第二天进攻示威者并在之后对匈牙利人民发动了强大的袭击。但为了安抚民情，匈牙利工人党于 10 月 24 日提名纳吉出任总理，卡达尔为党的第一书记。在随后几天里，纳吉的新政府对街头反叛者的要求作出了更多的让步。

10 月 30 日，纳吉宣布放弃一党制度，实行自由选举；同时，他还要求苏联自匈牙利撤军。31 日，苏军开始撤离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11 月 2 日，纳吉谴责了东欧共产国家的军事防御体系，并宣布匈牙利中立。

这就超出了赫鲁晓夫改革所能容忍的限度。11 月 4 日，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悍然派遣苏联装甲部队开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大城市，严酷地镇压了匈牙利的独立运动。当天，纳吉就被赶出政府，并于随后被驱逐到了罗马尼亚。在苏军刺刀下成立的以卡达尔为总理的新政府，虽然继续了纳吉的一些政策，但卡达尔明确宣布：他的党将保证一党制度，匈牙利将保持与苏联结盟，苏军将留驻匈牙利直至秩序恢复。

匈牙利起义者虽然只有简陋的轻武器，但是仍然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抵抗。在力量极其悬殊的战斗中，布达佩斯的人民一直到 11 月 14 日才被迫放下武器。但即使如此，后方仍有游击活动此起彼伏，并有连续不断的总罢工，直至 12 月中旬才告大体平息。数千游击队员及其家属随后逃亡到奥地利，这一悲壮的「出埃及记」连续上演了好几个星期。

接下来，从 1957 年 1 月起，卡达尔政府的政策转向血腥和严酷，于是，大逮捕大清洗大屠杀开始了。罢工与革命的许多领导者被逮捕；2 月 18 日，布达佩斯开始了一系列公审；5 月，42 人被当局处死。同时，成千上万的年轻匈牙利人被关押进强迫劳动的集中营。当局拒绝了联合国派人前往调查该国事态发展的要求。1958 年 6 月 17 日，匈牙利政府宣布，纳吉以及另外三名 1956 年「叛乱」的领导人已经被执行死刑。

发生在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一场壮烈的要求民主自由和国家独立的革命，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匈牙利事件惊醒了世界上对社会主义心存幻想的人们，斯大林主义的铁幕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腥裂缝。

六十一、中共的反右派运动

1956 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极大地震撼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主

义国家内知识界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及其巨大力量。但是毛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与那些东欧的党领导人不同，认为自己真正获得了广泛拥护，不会重蹈覆辙。他在想一条中国的独出心裁的道路与方法。

这就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下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在一个讲话里呼吁知识分子大胆批评中共的官僚主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声称要形成一种更加生气勃勃的活跃的政治空气。以区别于东欧国家。

开初，由于前面所说到过的「思想改造」的经验，知识界还诚惶诚恐，不敢大胆说话，后来在中共的反复劝诱下，终于鼓足勇气，放胆发言了。

著名自由主义者、原《观察》杂志总编储安平先生提出「党天下」之论，指出：中共「把国家当作共产党所有，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共产党做头，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头算数，成为共产党一家天下。」

章伯钧先生提出了成立「政治设计院」的构想，主张各党各派应当「轮流坐桩」，都有权设计中国的政治道路和具体政策。

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则提出了「平反委员会」的设想，实际上是要求中共对 49 年之后打击知识界、迫害中国人的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如潘光旦、费孝通、钱伟长、曾昭伦，以及一些年轻的党内知识分子如刘宾雁、王蒙，以及更年轻的大学生如谭天荣、林希翎.....等等，也对中共领导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批评，如拆除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高「墙」论、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论等等，一时风起云涌，议论纷纷，群情激昂。

在这一「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原来与共产党联手反对国民党的、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民盟，起了先锋与中坚的作用，其他民主党派也发表了各种批评意见。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惊恐不安，再也坐不住了，他感到匈牙利事件的阴影逐步逼近，他认为这些言论已经危及他和中共的领导地位。于是，毛背信弃义，抛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决定反击。他先发表社论，把自己的声音称作「工人说话了」，从而吹响了所谓「反击右派进攻」的号角。然后亲自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文章，声色俱厉，直捣民主党派的言论阵地。他利用中共控制的天罗地网——各级党组织召开对右派的批判会，划定各单位应揪出的右派的比例。

于是，中国 50 万以上的知识菁英、专业人才中箭落马，被打入地狱；一大批从国外归来或在国内受教育的高级人才，被打成「贱民」和「不可接触者」，流放到边远的地方，20 年不得翻身；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不获使用。中国等于被砍了脑袋，真正正直敢言聪明有才的人几乎都从自己

的专业岗位上消失了。这 50 多万右派的遭遇，个个都可以写一部椎心沥血的伤心史，很多人没能熬到平反的日子而含恨死去，默默地消失在穷乡僻野的尘土之中了。

从此，全国鸦雀无声，人民噤若寒蝉，这种政治气氛，为一切荒谬绝伦、残酷暴虐的行为开了绿灯。

从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失去任何独立性，成为政坛摆设的八个花瓶。多党民主政治已成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从此，中国进入所谓「迷失的 20 年」，从五四开始的自由主义思想幼苗被暴政掐断，以致文革之后的年轻一代需要从头开始，在黑暗中摸索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真髓了。

所以，有人把 1957 年中共的「反右」，称为历史的「大逆转」，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它是对中国民主资源的一次大摧毁、大破坏。

六十二、毛的乌托邦及其失败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即国有化运动。它凭借政权力量的暴风骤雨，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和象征性的所谓「赎买政策」，大体上经由「三部曲」：私营---公私合营---国营，把中国城市中的各种私人企业，变成了直接属于国家所有并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整个经济变成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些国有企业就是我们说过的「单位」，其实也就是政权体系的延伸。它们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细胞，掌管了人们的生老病死，主要是掌握了所有人的饭碗，不服从者不得食，使得历史上与政权相对独立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国家结构的一次重大转变。

而上次讲过，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方面，接着在 1957 年开展了「反右派运动」，毛泽东通过「反右」，使全国鸦雀无声，人民噤若寒蝉，造成了一种持续性的恐怖政治气氛，经济专家和其他专才都被斗倒、被流放了，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说话、不敢批评。于是，中国就象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装置的汽车，一场荒谬绝伦的戏剧开始在神州大地上无人阻拦地上演了。

首先，最为惨烈的，是因为毛泽东推行大跃进和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导致了历史上惨不忍睹的人为大饥荒。这是证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最近结论的一个典型范例，他的研究结论是：所有的大饥荒都发生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

毛泽东在土改后没有多久，就通过合作化运动，特别是 1958 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运动，把土地收归国有。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把历史上的镇、乡、村这三级变成了公社、大队、小队这三级，既是政权机构，又是生产组织，由中共党组织统一领导指挥生产与分配。农民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变成人身依附于这种高度控制下的组织的农奴。

于是，在这种组织与舆论的准备下，毛泽东开始了他的所谓「大跃进」，即「超英赶美」的狂热经济冒进。他运用他熟悉的军事动员方法，把全国六亿五千万人鼓动起来，青壮年被派去大砍树木，实行「土法炼钢」，到 1958 年十月，全国各地的土「炼钢炉」竟有一百万座！人们砸烂锅盆碗灶「炼钢」，被赶到公共食堂里去吃大锅饭，结果「炼」出的东西只是一堆废铁，根本不能用。其余的人被动员成整队整团地排着军事队伍，敲鼓扬旗，去兴建道路、开垦荒地、兴修水库、围湖造田，……。各地方在这种「乌托邦」的气氛下，虚报产量，制定了野心很大的增产目标。中共也以此为依据，要 1959 年比 1958 年再增产 50%。

然而，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是不可能有生产积极性的，吓人的增产指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各省各县已经报上去了成倍的高指标，结果，在实际产量下降的同时，政府却继续强迫高额征收粮食，于是，从 1959 年起，中国各地严重缺粮，出现了空前的人为大饥荒。1959-1961 这三年，农村有相当多的人饿死，在有些情况严重的县份，甚至有一半的人口死于非命。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这次大饥荒至少使三千万人丧生。城市人口虽然也挨饿，但毕竟有政府配给的少量粮食，总算是艰难地渡过了这一劫。

这一次惨重的失败，使毛泽东在中共高层的威望大受损害。虽然他在 1959 年庐山会议时严厉地驳斥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对大跃进的委婉质疑，并解除了彭的国防部长职位，但在后来，大饥荒的事实已经无法掩盖后，他不得不暂时退却。于是，在一个中共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把「国家主席」这一位置让给了其副手刘少奇，他自己则只当党的主席，并「退居二线」。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才着手调整左的政策，开始让民众有了一点生产积极性，从而逐步挽救了在悬崖边上的中国经济。

但是，这一调整，也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这是高度极权的体制中难以避免的权力斗争的惨剧。

六十三、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前面已讲到，毛泽东因大跃进失败而「退居二线」。但是，他并不甘愿如此退隐。实际上，从 1963 年起，即大饥荒刚过去，不甘于坐冷板凳的毛已经在筹备反攻，他开始搞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提高阶级斗争的调门，用林彪掌握军队，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已经暗中把矛头转向了在第一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官僚体系。

实际上，到 1966 年发动文革，中共的所谓文革前“十七年体制”已经使各级领导成为中国普通百姓头上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作威作福，颐指气使，享有不容置疑、更不容任何挑战的绝对权势。再加上文革前一、二年，以“深入贯彻阶级路线”为标志、“家庭出身歧视”的泛化到全社会，政治迫害业已制度化。这样，通过十七年的积累，在底层百姓中特别是各类出身不好的“贱民”中，埋藏了对各级领导的极深的怨气。

毛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官僚体系，他就想到了要借助民众的这股怨气。

当然，毛发动文革的动机，除了权力斗争的逻辑对毛的要求外，毛还欲给自己增加道义上的分量。就是说，在翦除其政治对手这一现实的目标之外，他还欲赋予自己以崇高的道义形象。毛批评中共大官僚们说：“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

因此，可以看出，毛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高的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既要作为一个国家体系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要作为受该体系压制的下层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身而兼二任，既是民粹主义者又是极权主义者。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角色。而毛正是以这种“首创者”的角色自命的。毛在前半生的惊人成功使其飘飘然，无限地膨胀了他的自我估价。

开始，大家并不清楚毛的意图，以为文革也是与 57 年反右一样整社会上阶级敌人的运动。所以，文革早期，即所谓“老红卫兵”或“联动”时期，也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期，对老知识分子和原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以及菁英文化大打出手，实际上还不过是十七年体制顺理成章的发展和极化。

但是，1966 年 10 月之后，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轰然而起。在毛泽东的意旨下，文革出现了新的方向——实质上是质疑和挑战前十七年体制的方向。这是毛的文革与中共过去历次运动的最大不同点。

新特点是，这次，毛以下层阶级的代表自居。于是，一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诞生了：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运动。它内含先天的逻辑悖论：即，一个体制的主要缔造者和象征符号起而号召反对该体制。由于其中所固有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使毛的举措充满矛盾。

文革一开始，他鼓动学生“炮打司令部”“反对资反路线”，明显地要全面摧毁原十七年的官僚体制的同时，但他又预留一手，把军队排除在运动之外，亲自制止“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造反，精心地要维持原十七年体制的最主要支柱——军队；

他在六六年怒斥刘邓工作组“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声称“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到后来的 1968 年八月他自己又把工宣队、军宣队派驻进校，镇压学生组织，并于之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使类似六六年“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恐怖时代重新降临；等等。

于是，影响中国当代历史极为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一种疯狂的气氛中，同时也在毛泽东矛盾的策略运作下席卷了中国。

六十四、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毛恢复旧秩序

毛泽东利用文化革命这种非常方式在 1967 年打垮了刘少奇的官僚体系后，发现他放的野火已经难于驾驭。红卫兵横冲直撞，毁灭文明，并发展到放火焚烧英国和印尼驻华使馆的地步。后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工厂工人又划为派系，其中特别是“造反派”，其改变自己文革前受压的地位，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的意志和表现，确实可圈可点。当时，各地两大派都打着毛的旗号，互相却斗得你死我活，并从文斗发展为武斗，已濒于内战边缘。

毛为了控制局势，不得不起用了他最后一张王牌——军队来收拾局面。于是，各省市代替被摧毁的旧官僚体系的，是以军人为主的所谓「革命委员会」。1968 年，毛解散了他一手扶植起来的红卫兵，把他们赶到了农村，使他们的革命幻想和社会地位受到致命的打击。1969 年 4 月中共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号称「全国山河一片红」，文革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与会的代表中却竟然有 45% 是军人，而支持毛文革的军人林彪被党章正式定为毛的「接班人」！中国已变成一个文明蜕化的野蛮的准军事国家。

中国的经济在这样的混乱时局下停滞不前，由于生产效益与劳动者的收入不发生任何关系，因此，整个中国大陆实际上已变成一个“懒人社会”，官方对经济已经束手无策，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日益暗淡艰难，与当时充斥全国的火红革命口号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新秩序已经变得越来越行不通，进入死胡同，他不得不致力于恢复秩序。

毛恢复旧秩序的努力有两个基本方向：在内政上，逐步淡化军方在政权中的影响力；在外交上，为摆脱日益孤立的态势，为应付北方邻国苏联的巨大压力，开始暗中向他多年来的头号敌人美国摇动橄榄枝。这两个方向，都意味着从文革中暴发崛起的林彪势力的衰落，以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官僚势力的上升。

毛和周用了极为精巧的政治手腕来突破外交困境，整顿内政，搞掉林彪，而恰巧美国当时也有同样的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于是，一拍即合，在历史上留下了的 1971 年 7 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和同年 9 月 13 日林彪的座机在外蒙古坠毁的两大著名事件。后者的真实内幕至今仍处在神秘的黑墙背后，成为历史之谜。不过，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如此之接近，就已经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启蒙的萌动

林彪之死，是文化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实质上是解除了毛泽东笼罩在全中国之上的魔咒。从此，毛泽东“洞察一切”的神话破灭了，文革作为一场大悲剧大闹剧的形象逐渐显现出来了，知识青年的被欺瞒被利用的感觉骤然产生了。同时，也由于联美抗苏的需要，或多或少使外部世界暴露在中国人眼前，于是，

“世界三分之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对于中国人自身水深火热状态的巨大嘲弄！自此之后，普遍的幻灭感弥漫了，深刻的怀疑滋长了，知识青年的地下读书活动兴起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新阶级》甚至海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等等内部发行的“白皮书”、“灰皮书”，在青年人中间迅速地流传着，象阅读被偷来的圣火，如饥似渴，废寝忘食。那些曾经在毛的魅力下疯狂的年轻人，在中国农村惊人落后乡间和暗淡的油灯下，苦苦思索着中国灾难的原因及其将来的命运。各自在探索自己的答案。

这些精神历程必定要结出它的思想果实和社会果实。于是，传承着文革初期的遇罗克和杨曦光等的精神传统，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等各种重要文章和大字报破土而出，在中国人中，文革末期正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思想启蒙。

六十五、1976 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文革结束

“四五天安门事件”

前已说明，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不得不部分恢复旧秩序，在周恩来帮助下，打开了中美关系及搞垮了他的文革盟友林彪。在一段时间内，他依靠周恩来，起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主持政务。于是，政府与经济管理由周、邓为首的务实的旧官僚负责，而宣传舆论与文化教育由毛夫人江青为首的上海帮文革新贵负责，形成“左右”派系对峙共管的格局。

邓小平恢复全国秩序的整顿措施必定涉及对文化革命的部分否定，这当然引起了江青一派文革得益者的反对；而文革作为毛后半生的主要事业，无疑涉及他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因此毛虽然在两派之间搞平衡，但本质上是为江青的“四人帮”撑腰的。其中更重要的是，两派谁胜谁负还涉及到毛之后权力由谁继承的问题。

于是，一场冲突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毛支持江青等首先公开批判邓小平，指责他否定文革。接着，发动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毛的纵容下，毛妻江青等组织人马在全国“评法批儒”，“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矛头直指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已经病入膏肓，自从 1975 年初他在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后，就一直卧床不起，直至 1976 年 1 月 8 日去世。当时，不得人心的江青一伙禁止人们的追悼活动。但是到了 4 月 5 日清明节这天，数以十万的民众不顾阻拦，涌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用花圈和诗歌汇成了白色的海洋。人们向周恩来致哀，支持邓小平主持政务，强烈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并宣称“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直指中共的专制。这次事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开民意表达。当天晚上，当局出动几十万民兵，手持棒棍，血腥镇压了群众的这一集会。

这就是著名的 1976 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周是作为替代毛的政治符号而被启用的，是作

为毛的竞争性对立形象而出现的，由於不可能直接反毛，因而颂周就成了反毛的基本方式。不容否认，“两害相权取其轻”，周式的官僚体系的专政仍比毛式的血腥暴民专政好许多。四五事件蕴涵的反毛情绪，预示着毛时代已经进入尾声。

毛之死与文革终结

“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治大倒退，日益黑暗。当时主政者的一系列荒谬措施引起了天怒人怨。中国民间与极左的当权派之间的鸿沟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不久，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按中国传统看来，这是变天——即皇朝崩溃的前兆。果然，地震之后两个月，毛泽东于9月9日驾崩。一个历史的机会出现了。

1976年10月6日，务实派的元帅叶剑英等与毛钦定的倾向折衷的接班人华国锋联手，用非常手段逮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上海帮。这件事标志着文革真正彻底结束了。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正式终结。

在毛时代结束与新时代的方向获得确立之间，有一段扑朔迷离的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时候，文革后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中经历的痛苦思考和探索有机会展示它的基本成果了。这一成果的核心，就是民主。它的具体外化，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出现。

六十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

经济自由化的胜利

六十年代之后，正当中国封闭在毛的统治下日益左倾愈演愈烈之时，在其他的一些并非社会主义的威权主义国家，却正在出现意义重大的历史演变，这就是：从经济自由化逐步向政治民主化的渐进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浪潮——日本、印度、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走上了民主之路之后，从六十年代开始，原来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逐渐在向这一方向靠拢，开始酝酿了七、八十年代的又一次自由化与民主化。它们的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道路，使喧嚣一时的所谓「依赖理论」黯然失色。

当时，渊源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后来由普列必希等左翼学者提出的时髦的「依赖理论」认为，先进西方国家支配世界贸易，确定游戏规则，运用跨国企业强迫第三世界进行不均衡发展——输出原料和粗加工产品，输入发达国家的飞机、汽车等精密产品，使后发展国家永远落后，与核心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加大。

上述「依赖理论」，由于台湾、南韩、香港等参与国际市场的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起飞与政治发展而破产了。照「依赖理论」，开发中的「边陲」国家参加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只会使自己与「核心」发达国家差

距越来越大。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国家使自己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获得了极其惊人的经济成长，差距日益缩小；同时，在政治上也启动了开明化、自由化和民主化。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经济制度的强烈对比。譬如，台湾与中国大陆，在 1949 年时的生活水准几乎是一样的。然而经过两种经济体系的 40 年发展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台湾的实际国民收入每年增长 8.7%，到 1989 年个人所得为 7,500 美元，而中国大陆 1989 年个人仅为 350 美元，而其中大部分还是开放十年后市场经济的贡献。

除亚洲外，欧洲的西班牙从 1958 年起开始经济自由化后，也获得了极快的经济发展。

政治民主化转型

不过，上述经济起飞的国家与地区，在政治上开始还属于右翼专制统治，或称威权主义时期。如两蒋统治的台湾，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统治的南韩以及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香港虽然有良好的法治和人权保障，但仍是由港英总督进行威权统治。总之，所有这些地区，当时都还没有民主。而且，客观的说，在市场导向型的威权主义统治下，这些地区的经济起飞都相当快速。

然而，社会到达一定的经济水准后，上述威权主义统治就受到来自社会的越来越强大的质疑和挑战了。

首先，是因为社会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日益多元化了。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为各方所认可的解决机制，在当今世界上，它只能是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有可能使各方相信其裁决具有公正性和正当性。

其次，经济起飞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教育水准提高的过程。譬如，到 80 年代，台湾的执政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45% 都有大学学位，大多在美国取得。与国际政治规范和潮流接轨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议员强有力地推动更加民主的议会制度。高素质的社会菁英在中产阶级支持下也起而挑战威权统治的合法性，积极筹组反对派别甚至反对党。

第三，在右翼威权主义统治下，军人、技术官僚、企业家等权力集团在通向权力的斗争中常常精疲力尽，在谁也无法完全吃掉谁或压倒谁的情势下，不得已而接受权力的分割与分享。

于是，民主体制就在这种菁英的权力斗争中逐步产生出来了。

当然，离不开一些特定的偶然条件。如 1975 年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后，经济已相当发达的西班牙迈向民主；如蒋经国先生晚年在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零下，在反对派压力下，为增强统治合法性而毅然于 1986 年开放「党禁」、「报禁」，使台湾走上了民主之路；还有南韩卢泰愚总统在压力下开放总统选举等。但是，

所有这些民主转型与前一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是有很强联系的。

六十七、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布拉格之春的兴起

我们曾讲过，1956年匈牙利事件代表了共产国家早期的自由民主以及国家独立的渴求。它虽然被残酷镇压，但火种已在东欧国家播下了。加以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的以非斯大林化的“秘密报告”为标志“解冻”，促使了东欧各国的社会改革。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典型，尤其是它的知识分子，非常活跃。到六十年代中期，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捷克当局已经不得不开始经济改革，并向西方作有限度的开放。到了1967年春天，捷克已形成某种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以哈维尔为代表的捷克作家甚至不顾当局干涉，在作家协会上宣读了索尔仁尼琴致苏维埃作协的公开信。当时，改革已经成为整个捷克社会的共识。

在这一背景下，1968年1月5日，改革派杜布切克接任了捷共第一书记。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兴起了，史称“布拉格之春”。

杜布切克上任后，一方面举荐斯沃薄达将军为捷克总统，表明与苏联联系的意愿，另一方面加强改革，提出“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于4月公布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新社会主义之路”的改革纲领。他们大规模地平反斯大林大清洗时代的冤假错案，释放被囚禁的知识分子，放松对新闻媒体控制，鼓励自由的学术讨论，允许公民自由出国，松弛对宗教的监控，在党内选举中推行无记名投票，限制领导人任期，……。这些举措，使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动人政治局面。

“布拉格之春”的终结和历史影响

但是，在莫斯科眼中，“布拉格之春”既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和挑战，同时，它还有泛滥扩展到其他东欧国家的隐忧，因此，必须消除这个心腹大患。从68年3月到8月，苏共头目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东欧共产国家领导人与杜布切克举行过五次高峰会谈，企图压服他放弃民主改革。杜布切克强顶硬磨，拒不就范。于是，摊牌势在必行了。

不过，苏共与华沙条约国首脑们在摊牌前夕的表演实在是可圈可点。8月3日，他们在与捷克的最后一次高峰会上还信誓旦旦地祝贺捷克在“华沙条约内部继续进行民主实验”，但十六天之后，六千三百辆坦克就开进了捷克！历时八个月的“布拉格之春”被坦克车的履带碾碎了。从此，坦克成为共产国家极权镇压的象征，一直延续到1989年的天安门。

面对野蛮的坦克，捷克人民没有屈服，他们用沉默抗议和逃亡出走反抗。杜布切克被逮捕，然而他拒不屈服，后被押往莫斯科，苏共逼迫其签署一个妥协性文件，然后不得不释放他回国。回国后，他重新担任

第一书记至 69 年 4 月。他在此期间，虽无法进行民主化改革，但仍捍卫并扩大了民族自主权。后来，在苏军兵临城下的情势下，以胡萨克为首的亲苏当局开始进行大镇压，把捷克带入了一个空前的“黑暗时期”。他们大肆逮捕，数千人入狱；数以万计的人被开除公职，50 万人被开除出党，并株连到妻子儿女。

“布拉格之春”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镇压的代价是极为严重的。事件之后一年，戈尔巴乔夫 69 年去捷克考察，发现捷克人极端仇视苏联。他后来回忆到，从那时起，他认为不仅不应镇压捷克，而且苏联也应当追随捷克，进行改革。

镇压过去多年之后，捷克的公民社会仍然坚持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 1977 年，在东西方共同签署的“赫尔辛基宣言”的启示和激励下，以著名作家哈维尔为首的 260 名捷克异议知识分子签署了著名的“七七宪章”，从而吹响了共产帝国衰亡的先声。

六十八、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

“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

前面已讲过，在毛泽东去世后与新时代开始之前，中国大陆处于一段扑朔迷离、方向不定的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

时代的风标终于开始转向了。这段时期，中共高层紧张斗争，邓小平逐步崛起，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通过胡耀邦大规模平反毛泽东历次运动中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从而使非毛化思潮在中共内部酝酿发酵；同时，整个社会也逐步觉醒，开始思索中国一系列灾难的原因，公开批判毛以及中共统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至罪行，具体的表现，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出现。

1978 年冬天，在北京西单的一面近一百米长的墙上，出现了一批公开否定中共政权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抨击以毛的接班人华国锋为首的亲毛派，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大字报。它们吸引了数百万民众前往观看、阅读和抄写。同时，一批民间创办的刊物如《探索》、《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启蒙》、《今天》、《萌芽》、《人民之声》、《责任》……等杂志也破土而出，在民间广泛流传。于是，在经过“摧残百花”的“反右”二十年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它的解冻时期。

当时，中共高层邓小平、胡耀邦等在抨击亲毛派时，公开赞扬了民主墙，他们借助民间“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社会压力，形成了党内的主流共识，从而铲除了中共高层毛泽东残余势力“凡是派”，成功地使中共转向了邓式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心的路线，开辟了一个与毛的左倾极权方向不同的邓小平时代。

一时间，中国似乎就要面临民主化的前景了。

“经济放开，政治收紧”

但是，邓小平毕竟是老共产党人。当他利用民主墙的民意肃清了政敌，目的达到之后，就迅速回过头来，过河拆桥，对社会的民主力量下手了。1979年3月，邓小平宣布了“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后，在1979年12月，当民主墙挺立了整整一年之后，被宣布取缔，当局并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张贴大字报，逮捕了各民主社团的主要成员，特别著名的是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的魏京生，并随之查禁了所有的民间刊物。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启蒙运动在中共的强力镇压下夭折了。

邓小平的基本策略是“经济放开，政治收紧”。在这一方针下，他强力推动经济体系向国际体系“接轨”。最主要的两大措施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在部分地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

农村的改革，即分田到户的办法，首先是安徽的某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搞起来的。后来，四川的赵紫阳与安徽的万里认可了这一变革，最后也获得邓小平赞成，于是，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到了全国。这一破除毛式意识形态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发展，八十年代农业增长了大约两倍半，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是邓小平改革的重大成就。

所谓“经济特区”政策，是把一块特殊地理位置的地区划为不能随便进出的特别地区，专供外国公司建厂和建设基本设施，以吸收外国资本与技术。有点类似与其他国家的所谓“自由港”。八十年代初中国设了三个特区，其中靠近香港的深圳最为成功。后来到1984年，华东沿海共有14个港市开放给外贸与外资，这些大多是历史上的通商口岸，在封闭30多年后，终于重新面对世界了。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原因，特区政策开初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后来由于中国基本的法律体系等问题，也遇到不少障碍。有鉴于此，特区政策的推行对于改进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对于中国总体法律体制的改善，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逐步向世界打开了。

六十九、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众所周知，冷战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全球范围的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斗争的主要表现。前面已经谈到，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以及1977年的“七七宪章”运动，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反共产极权的运动；但是，1980年代在波兰发生的反抗运动，范围就大大扩展了，它从工人运动发展成了几乎是全民的汹涌澎湃的运动。这一事件是共产制度进入衰亡期的鲜明标志。

这就是团结工会运动。

推动这一运动的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罗马天主教对波兰民众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一位波兰人当选为罗马教皇(教皇保罗二世)后更是如此；二是波兰共产制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惨重失败导致工人的广泛抗议。

1980年，在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发生了史诗般的一系列大罢工，这些罢工的后果是诞生了后来被称为“团结工会”(Solidarity)的全国性组织，它是由各个独立自由的工会自发组成的新联盟，除了经济诉求，还有政治目标。其领导人是一位多次被关进监狱的原电工瓦文萨(Lech Walesa)，具有卓越的政治直觉和魅力。

在团结工会领导下，罢工向全国蔓延，政府当局被迫作了让步，承认它是独立自主的工会组织，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当局还同意了星期天的天主教弥撒向全国广播。然而，波兰的全国性危机并未消除，且日益深化。奇怪的是，不象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苏联并没有出兵干预。这是莫斯科政策开始改变的重要征兆。

1981年，波兰危机加深，不过瓦文萨小心翼翼地不去过分触怒当局，不使情势走向摊牌。华沙条约苏俄指挥官共5次抵达华沙施压，在最后一次，激进的团结工会成员冲破了瓦文萨的控制，号召在政府宣布紧急状态时进行全国总罢工。于是，1981年12月13日，政府发布了戒严令，紧接着就是大镇压，反对派共有几百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不过，戒严令也使波兰免除了苏军入侵的命运。

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军事管制既没有使波兰的经济恶化停止，反而进一步加深，且又无法获得社会的支持，共产主义已经完全声誉扫地了。在戒严后期，波兰似乎象一个被内战分裂为二的国家，人们不理睬当局，秘密组织，秘密出版，罢工与示威此起彼伏，政府与人民已经完全疏离了。

在国际方面，虽然波兰经济一蹶不振，但由于政府对人民的严厉镇压，它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帮助与同情。这种状况，直到1985年之后才稍有改变。

1985年，苏联政府改由戈巴乔夫执政，他提倡“新思维”，实行“公开化”政治改革，这一系列改变影响到了华沙。其进展的最高潮是1989年，它是波兰同时也是大多数共产国家最辉煌的历史性年代。团结工会再次公开化，并迅速进入政治变革过程。作为政治多元化的第一步，1989年6月在波兰举行了真正的自由竞争的选举，团结工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久，新的国会诞生了，这是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波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它谴责了1968年华沙条约军队对捷克的入侵，并建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1981年波兰军管以来的政治谋杀事件。

1989年8月，团结工会宣布支持联合政府，同时戈巴乔夫也通知波兰的顽固派联合政府将被公正地选出。9月，由团结工会主导的联合政府和1945年以来第一位非共产党的总理在波兰诞生，从此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同时也是民主与极权斗争的历史性胜利。

七十、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停滞、压抑和不满的年代

第一个共产国家、全球两大超强之一的苏联的走向，维系着冷战的前途乃至人类的命运，一直是全世界翘首关注的焦点。

自从1964年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后，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勃涅日列夫向斯大林主义作了部分倒退，其统治持续了漫长的十八年，这就是历史所称的平庸、沉闷、压抑的勃涅日列夫时代。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困时代里，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出了他的史诗般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对作为一个大监狱的共产极权社会进行了入骨三分的刻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苏联的“氢弹之父”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则于1971年和1972年公开发表其两份“改革方案”，勇敢地起而呼吁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他的具体改革建议包括大赦政治犯、停止秘密审判、开放边界、开放外国文献书刊、停止干扰外国广播、废止死刑等.....，凸显了一位知识分子高贵的人类良知，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在苏联与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1975年当西方与东方华沙条约成员国签订了赫尔辛基协定后，苏联与东欧的异议分子群体冒险犯难，破土而出，对照协定，对共产制度提出批评与挑战。在苏联乃至其他东欧国家，由于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全面的制度性失败，对无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不民主的“党-国”极权政治体制的怀疑，在民众中，特别是在知识界普遍滋长起来了。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与组织网络都无法控制的空间了，即是说，与政权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正在逐步长成的过程中。

戈尔巴乔夫的新政

1982年11月，勃涅日列夫去世。以后，紧接的两任继任人不久也相继故世。于是，1985年仅54岁的、曾被西方视为强硬派的戈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出任苏共总书记。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一系列新政策连续不断地从莫斯科推出，震惊了世界。人们骤然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可能开始了。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第一次吹出了新的政治音调——不同于几十年来共产党的陈词滥调——“新思维”、“公开化”、“透明度”、“重建”.....成了他的主要音符。透过这些新的旋律，他使苏联人民清楚地体认到：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再也无法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已经不能支撑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已经不能向海外盟友提供过去那样的援助，已经无力保证科学技术的持续不断的代代创新了。当时，外有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充满反差的鲜明对比，在中国有邓小平主导的抛弃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革实验，在东欧国家有对作为苏联“卫星国”的不满暗流，在国内则有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增强的声音。这一切，是这位苏共第三代领导人转向新思维的重要因素、压力和契机。他甚至亲自打电话给流放在西伯利亚的萨哈罗夫，请他重返莫斯科。随着时间的一步步推移，戈尔巴乔夫发出的信号越来越明确：只有自

由化，苏联才有出路。

应当看到，当时苏联的以军事重工业为重心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形成庞大的体系，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以经济改革入手所遇到的阻力太大，因此，他首先进行的是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改革。这点与邓小平是不同的。

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Reagan)敏锐地对此作出了反应。在同戈尔巴乔夫的外交谈判中，里根抓住机会，双方迅速达成了延长削减军备协议、中程核导弹控制的协议等，并连带导致其他重大成果：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美苏双方表现出他们可以不通过战争处理其冲突和世界性危机。国际局势逐渐走向缓和

后来，里根抛出费用浩大的“星球大战”计划，逼使苏联跟进。然而苏联的国力已被耗尽，再也没有经济力量同美国进行高科技的军备竞争了。在内外交困之下，预埋下了以后苏联垮台的种子。

七十一、台湾的宁静革命

从左翼极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转向考察右翼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化。其中，台湾是一个典型范例。

中国国民党在内战失败 1949 年退守台湾之后，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法，实施了相当严厉的威权主义统治。在政治上，审查新闻媒体，严禁反对党出现，时松时紧地镇压异议人士。因此时常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与压力。

但是，它与左翼极权仍有两点重要的不同：首先，它的法律保障私有财产，这就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基础；政府并通过出口导向政策和留学政策，使其经济体系和社会日益国际化。第二，从迁台之日起，台湾即存在选举。虽然从 1950 至 1969 年这 20 年间，台湾选举只到省议员和县市长层次，中央选举是冻结的，因而不会影响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但这种选举具有合法地集结反对派政治力量作用，同时具有整合中央与地方菁英的功能。

台湾的反对派力量很早就开始了民主奋斗，他们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办刊与参选。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

在刊物方面，早在台湾蒋介石统治的五十年代，以著名杂志《自由中国》为核心，集合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中国》以雷震为主编，抨击时政，力倡言论自由。后来，在自由派精神领袖胡适鼓励下，雷震宣布在 1960 年 9 月底成立“中国民主党”。9 月 4 日，雷震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中国民主党”流产，杂志夭折。这就是著名的“自由中国事件”。

这种严厉的政治气氛持续了十年左右，由于 1971 年之后台湾的国际处境风雨飘摇，第二波独立于官方的刊物如《文星》、《大学杂志》、《台湾政论》、《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又陆续出现。它们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这导致蒋经国提出本土化改革，即所谓“向内的合法化”运动。

在选举方面，前已说过，它具有合法地集合政治力量作用。相对于严厉的平时，选举期间成为比较宽松的“民主假期”。由于不能成立反对党，当选的非国民党人士就被称为“党外”，而通过选举过程集结的“党外”，实际上变成一个准政党。

1978 年，增额中央民代改选，“党外”开始正式组织化，以巡回助选团到台湾各地大串联，并发表 12 条共同政见：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解严、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司法独立、军队中立等。并获得台湾逐步兴起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1979 年 5 月《美丽岛》杂志社成立，其组织方式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这导致国民党政府镇压，《美丽岛》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全部被审入狱。政权的合法化进程倒退。

但是，“党外”并未因此消失。80 年底，“党外”入狱者的家属参加选举，高票当选。国际支持日隆。震撼当局。1981 年地方选举，“党外”中央民意代表在县市推荐人选出战，获得极出色的成绩。从此，“党外”以准政党式的室内集会以及议会改革为主线了。

在这种情势下，当局意识到，镇压除了能暂时免除了对自己垄断权力的威胁外，并不能消灭反对运动，徒然增加社会与政权的两极对立，丧失统治合法性，受到国际孤立。即是说，镇压手段的代价已经比宽容要大得多，于是他们开始考虑调整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了。其核心，就是统治集团如何把反对力量吸纳入政治体制内的问题。

1986 年 9 月 28 日，“党外”人士集会于圆山饭店，正式成立反对党——“民进党”。当局采取了容忍的政策。不久，1986 年 12 月，蒋经国总统决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于是，台湾民主化闸门打开，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呈现出生气勃勃波澜壮阔的景象。1991 年，中央民意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1996 年，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直接选举的总统诞生，标志着其民主体制已经确立了。

七十二、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

菲律宾早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美菲战争后，宗主国变成美国。自此，美国的一系列宪政原则：多党制、文官政府、军队中立……等理念就影响了菲律宾的政治文化。早在 1898 年菲律宾就颁布了一部民主宪法。二战期间它曾被日本占领。1944 年，美军重归菲律宾，击败日军。1946 年，菲律宾正式独立。独立后实行过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基本体制。

但是，自从 1965 年强人马科斯(Ferdinand E. Marcos)当选总统后，他以打击游击队为名，在全国实施军管，日益走向独裁专制。在内政上，取缔反对政党，随意拘捕政治犯，限制新闻自由，大力培植亲信，残酷排除异己。在军队中，大搞派系平衡，试图完全掌控武装力量。在外交上，他逐步疏远美国，积极靠拢亚洲的一些极权政府；例如，他多次去北京拜见毛泽东，以至浓妆艳抹的马科斯夫人成为文革期间茕茕孑立的毛政权的外交点缀之一。

不过，他的专制不仅与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也与菲律宾的社会土壤不相适应。

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当时的教会，在经济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于政权，它在全国建有地方的组织机构和广大的社区活动中心，竭力开展对公民的各项互助服务和思想启蒙，并捍卫他们的基本权益。

菲律宾的军队是于 1936 年创立的。由于 1898 年的马洛洛宪法的明文规定了文官领导武装力量的原则，在美国统治时期，“文官至上”原则制度化了；加以在菲律宾政治体系中，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都相当高，因此，在菲律宾军人中，军队中立化、职业化，忠于宪法，忠于合法政府这些宪政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因而，尽管马科斯 20 年的统治中极力设法掌控军队，但其成效是很有限的。

1983 年，菲律宾机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放逐到美国的菲律宾反对派领袖阿基诺，刚走下返国的飞机，就被杀手开枪当场暗杀。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

本来，菲律宾原有的政治文化及社会力量，对于马科斯越来越高压的专制统治，就已经不能忍受了，这件事更犯了众怒。而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菲律宾政府侵犯人权的残酷行为，也日益反感，暗杀尤其超过了忍耐的极限。

当年，阿基诺在马科斯实行军事管制后立刻被抓进监狱，以所谓颠覆罪被判处死刑，后来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改为终身监禁，此后又获准赴美就医。不料欲回国参选却遇此大难。此事导致美国完全撤销了对马科斯政权的任何支持，同时这一血腥惨案也导致菲律宾反对派的大联合。实际上，自从美国卡特政府推行“人权外交”之后，美方就一直向马科斯施加压力，要求他取消军管，还政于民，恢复多党制与宪政。阿基诺案后，国际社会更是群情愤怒，加紧了施压。

美国促成了反对派在 1986 年大选中推举阿基诺夫人柯拉蓉·阿基诺为总统候选人。而当马科斯企图通过操纵选举继续掌权时，国际观察组织及时揭露了大选中的舞弊，于是造成了人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此时，军队中的高级将领拉莫斯和恩里莱在阿奎纳尔多军营起义，天主教会 的贝利塔斯电台率先报导了重大消息，紧接着，美国宣布支持阿基诺夫人并要求马科斯放弃权力。天主教的辛大主教呼吁全国支持和保护起义部队。于是，几十万民众风起云涌，拥向街头，拥向军营，忠于宪政的军队于是掉转枪口，支持人民，

汇成了一幅人民和平革命的壮阔画面，成功地谱写了菲律宾的民主转型的史诗。

四面楚歌之下，马科斯终于被迫下台，出逃他国。阿基诺夫人在民众簇拥下，当选为菲律宾总统。宪政民主终于在菲律宾确立了。

这是八十年代世界民主浪潮中的历史象征图景之一。

七十三、南韩转向民主

众所周知，南韩发展的起点是朝鲜战争后的一片废墟，而它发展的基本环境则是与北朝鲜的分裂对峙，并随时准备应付北方的军事挑衅和侵略。这种条件，使它在经济发展初期采取了一种威权主义的政治架构。当时东西方不少人为这种威权主义辩护的理由是：只有建立一个威权中心，才能防止北韓的军事进攻和间谍的颠覆破坏；同时，这种威权体制也有利于摧毁政治腐败，从而进行方向明确的社会改革，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威权体制时期，限制人民的政治权利是难免的。但这是国家发展需付出的“必要的代价”。

这种理论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它的经济起飞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如何防止威权领导人迫害异己、长期迷恋权力并凝固现状上，在如何防止权力本身的腐败上，以后的发展说明，上述辩护是存在问题的。

当时，这种威权统治的源泉来自军事力量。因此，朝鲜战争中受过美国军事培训的一批军官成为韩国军界乃至政界的少壮派，以 1961 年“5.16”事变的领袖朴正熙、金钟泌为代表人物。他们抗拒过去的旧式政客操纵，力图掌握实权；同时，由于受现代思想影响，他们又主张通过控制政党、操纵选举来获取权力以及统治合法性，反对明目张胆的专权。这就为他们镇压反对派时留有一定的底线，不愿意斩尽杀绝。

韩国社会早就存在多党政治的思潮。在朴正熙时代，就有新韩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存在。后来该党分化出统一民主党、和平民主党等重要的反对党；而金大中、金泳三等著名反对派领袖虽然屡遭迫害，金大中甚至曾判处过死刑，但是在其不屈不挠的抗争过程中，他们也在国际与国内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和政治资源。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南韩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中产阶级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在与国际社会的经贸交往中，国际政治秩序对它的影响和压力也越来越大；同时，选举虽然徒有其名，但毕竟一直存在；反对派虽遭受镇压，其力量仍然获得保存，并屡扑屡起；此外，南韩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息，给当局向民主转型，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于是，在上述内外压力的交互作用下，1987 年，以卢泰愚为首的军队实力派，发表“6.29”宣言，向各界特别是反对派声称：不管大选结果如何，军队都将忠于宪法和民选政府。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军方态度

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也表明南韩人民三十多年的奋斗，国际社会持续的压力，终于获得了成果。虽然，当年那场选举，由于反对派内部分裂，金大中与金泳三互不相让，而使卢泰愚渔翁得利，被选为总统；但毕竟，基本公正的选举程序已经建立起来了。待到下一届大选，金泳三当选总统，建立了南韩第一个真正的文官政府。它肃清吏治，撤换了与全斗焕独裁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批高级军官，确立了军人不干政的宪政原则。后来，韩国法院还审判了全斗焕等人在军事统治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终于还给了历史以正义。1997年，曾经被判处过死刑的反对派领袖金大中竞选成功，成为韩国总统。所有这一系列发展表明。韩国已经走上民主政治的不归路了。

韩国人民经历的曲折道路，是一条典型的从军事威权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道路，是一个分裂国家内的一方走向宪政体制的道路，同时，也是一个曾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逐步走向民主的道路，它给了亚洲很多国家、特别是儒家文化圈国家以重要的启示。

七十四、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八十年代，比较而言，是中共自1949年执政以来仅有的一段相对开明的“黄金时代”。原因主要在于中共在经济政策方面走出了毛泽东的阴影，从极权主义的统制型经济向自由经济迈出了第一步，从而解开了向宪政方向移动的经济束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恐怕是邓小平最得人心的一个口号。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臂，在八十年代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邓声称，天塌下来，有胡赵撑着。三人之间，在对毛的主要遗产的反叛上，在经济改革的理念上，是大体契合的。而胡的热情诚恳，开朗豪爽，大刀阔斧；赵的精明能干，思路开阔，厌恶教条，与邓的务实主义，少说多做，乾纲独断，正好相得益彰。因此，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在这一“铁三角”的推动下，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开山斧，拨乱反正，平反冤狱，权力下放，搞活经济。……长期沉闷窒息的神州，骤然风生水起，虎虎有声。

中共经济政策的核心，包括前面已提到的“包产到户”和“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措施，总起来看，可称为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改革，其方向实质是指向市场经济。

所谓“分权化改革”，首先是针对原来中共高度极权的经济体制，实行中央对企业的权力下放和利益下放，并逐步向“政企分开”过渡。因此原来在毛时代不可想象的东西，如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雇工、长途贩运、农民大量进城、股份制、股票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一系列在毛统治下的稀奇古怪之物，稀奇古怪之论，如潮涌现，纷至沓来。它们释放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对财富的欲望，调动了被撒切尔夫人称为“天生的资本主义者”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使中国的经济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日益密切。由于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的出现，给中国人提供了选择职业的空间，这就削弱了过去毛时代的国有化的“单位制”对人民的全面控制能力。

所谓“分权化改革”，另一层涵义是区域经济自治的意思，是指中央对省市自治区等地方的权力下放，利益分成。并使各个地区相互之间出现体制性竞争，导致促进制度改革的目的。实际上，“经济特区”政策就是区域经济自治的措施之一。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独立性的相对增加，使地方政府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利益的代言人，而日益减弱了其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利益的角色。它们与中央的经济关系日益增强了讨价还价的谈判协商关系的成分，而越来越削弱了直接听命于中央的上下级关系色彩。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个显著成果是乡镇企业的兴起。这种农村办工业、农民办工厂的现象，构成了中国的八十年代区域性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和景观。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大陆在城乡户口严格划分的制度前提下，农民只能“离土不离乡”办工业的客观处境；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是中国在经济起飞初期的一种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地转移的创造性模式。它在八十年代带动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就全国来看，国营经济成分在国家经济中比重的降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后果。在农村，本来就少有国营经济，在改革前，农民的家庭收入 2/3 来自集体经济，1/3 来自私人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城市亲戚的帮助。但自从实行包产到户之后，从 1983 年起，农民收入中来自集体的部分竟然大幅度下降到了 1/10！在城市，改革前，国营经济几乎垄断了全部经济活动。但是改革之后到 1989 年，城市职工的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半以上是与市场挂钩，而不是与国家计划挂钩了。同时，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 1988 年也下降到了 56%。而国营经济的衰落与民营经济的崛起几乎是同步发生的，这使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

七十五、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

在八十年代，邓小平虽然实行“经济放开，政治收紧”的政策，但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并非毫无认知。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他曾发表了一篇有关民主法治的不错的讲话，指出类似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并强调中国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必要性。实际上，他已经看到，阻碍中国发展的正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源泉，他又不能“砍倒旗帜”，只能“挂羊头，卖狗肉”，在原有意识形态旗帜下改变其内涵。即是说，仍然使用马列毛的话语系统，但是通过强调重心的移位，通过淡化意识形态，邓为自己的经济政策的转向作了实用主义的辩护。

中共与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用反对(马列毛)意识形态的市场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对(马列毛)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只能做，不能说。

因此在八十年代，中共“逢双反左，逢单反右”，左右摇摆，出尔反尔；理论界“批判-沉寂-活跃”、“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跃”，即根源于中共政策的相互冲突的“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四个坚持」。路向矛盾的方

针正如两匹南辕北辙的奔马，在撕裂北京领导层。

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是不能放弃的。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必然突破中共意识形态的牢笼，必然导致某种政治后果。

因此，伴随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八十年代发生过几次政治及意识形态争论，影响到了中国的政局及其发展方向。

首先是 1978 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拥毛派与拥邓派的一次较量，是邓小平非毛化政策的起点。这次讨论是务实派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反复酝酿后发动的，胡耀邦与邓小平利用该讨论，通过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取消了毛泽东作为真理裁判官的地位，从而削弱了毛泽东留在中共高层的代言人“凡是派”华国峰、汪东兴等的权力，为邓小平掌权扫清了道路。1978 年底，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邓小平的务实路线。

我们在前面谈过，邓小平在党内舆论以及民主墙时期的党外民主思潮的气氛中上台后，立即提出“四个坚持”，逮捕异议人士，开始了他的“经济放开，政治收紧”的左右摇摆的方针。

1983 年，邓小平指责中国的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着精神污染现象。”他把知识界中流行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等作为“精神污染”，从而开展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过这一运动在胡耀邦干预下，只持续了 28 天就夭折了。

“清污”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一段政治上宽松的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1986 年底从安徽合肥、上海到北京，爆发了学生运动，中共党内的左翼顽固派趁势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位知识分子，并把矛头指向了党内开明派领袖胡耀邦。

前已说过，邓、胡、赵“铁三角”本来是当时经济改革最开明的领导核心。然而其权力的结构有隐患，即：“名实不符，权责不一”。所谓名实不符，是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称，系指权力与责任分离，最高权力归邓，责任则归胡、赵。这种结构性困难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如在胡耀邦推行邓式“新政”过程中，上述 1986 年底和 1987 年初的学运爆发，党内保守元老趁机发难攻击“新政”，邓亦隐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

这种畸形的权力结构和矛盾的左右摇摆的改革方针，造成政局的剧烈振荡，而且还留给中国政局更大的隐患。

七十六、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比较松动活跃的时代。

过去，在中共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系统是依附于政治系统的，并且被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网络所笼罩。极权政治的封锁使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各界极难从国外的精神资源和中国自身的精神道统中吸取养料。因此，自己没有独立的社会定位、精神定位和语言定位，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抗争的能力。

但从八十年代开始，上述情况有了重要的变化。国家能力的收缩，即政治系统对社会各行各业及各类团体的控制的削弱，社会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增长，国家和社会之间开始出现的某种对峙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制衡的加强、利益的分化、权力的分享，地区差距的拉大，利益倾斜的增加，各种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觉醒，中间组织建立自身道统的努力受国家干预程度的下降，使国家全权控制的社会逐步溢出了一部分自由流动的资源：如农民耕种的自主权，城市中国家对资金和生产资料的垄断减弱，外资的大量涌入，财政分灶吃饭，企业自留资金，市场提供的契约式就业机会，如此，个体、私营和“三资”、小集体等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的出现，都是这类自由流动的资源。同时，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如农村多种经营“自由活动空间”，集市贸易和长途贩运的自由空间，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空间，农民进城做工的空间，城市中第三产业和零售业以及电子技术等高技术民营产业的自由空间，“三资”和“特区”的自由空间，知识界起伏不定的带民间性质的自由组合空间：编委会、研究所、书院、函授大学、沙龙以及有外资入股的杂志，以及国外和港、台流入的大众文化……等等。如此，人们正在体制的缝隙中一步步地挤出了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中间层。独立的文化系统正处于逐步成形的过程中。

自 1978 年到 1990 年，中国城市的社团组织增加了 24 倍！如果把它们划分为官办、半官办和民办三类的话，则官办只占百分之六，半官办占百分之七十，民办占百分之二十四。按照上述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社会的横向团粒网络型结构的出现的壮大是可以预期的，它将与纵向的金字塔结构达成某种势的平衡。这正是社会中间层的雏形。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从八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与文化界，兴起了一股文化讨论热潮，即“文化热”。与五四时期相似，“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再次成为最基本的划分方式和论战焦点。它席卷了当时几乎整个大陆知识文化界，并波及到大众文化层面，人称“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由于国门在某种程度上的开放，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当

代西方的思潮。虽然其中难免有囫囵吞枣、标新立异和急功近利的弊病，但不可否认，当时的气势与规模实为近代所罕见，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多年未有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勃勃生机，洋溢着一种全方位学习优秀制度和文化的紧迫心情。因此，不难想见，与五四相似，“文化热”中，反传统的激进西化派在气势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一发展的高潮是在其后期的 1988 年，代表“文化热”中主流观点的电视政论片《河殤》两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全中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波及海外。“文化热”掺杂着全社会普遍的骚动、不满和愤懑，迅速家喻户晓，从知识界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从学术讨论会和书刊进入了大众传播媒介，从菁英层面扩展到了大众层面。这种情绪与当时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效应。应当承认，鉴于中国的舆论控制仍相当严酷，因此，“文化热”借助五四灵感，使中国专制文化的弊端成为现实政治的替代靶子，一种特定的文化批判代替了政治批判，进入历史，并带来它未曾料到的巨大的政治后果。

七十七、一九八九年中国天安门事变

1989 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变。

前已谈到，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必定会产生政治后果。

当时，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制度变革的迫不及待和强烈要求；与中共高层的既得利益集团唯恐丧失权力垄断的心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巨大的紧张。二者之间利益冲突过于尖锐，观念鸿沟既深且巨。这样鲜明的反差，不摊牌是不可能的。诉诸中外各国改革和变法的先例，关键性的对决无可逃避。

如下种种因素，当年象火山喷发前隐隐运行的地火，促成了这一年举世震惊事件发生。

首先，深层原因是邓式“改革开放”与“四个坚持”的内在冲突；

其次，中共“闯物价关”失败，加上贪污腐化泛滥，导致通货膨胀，怨声载道；又缺乏独立自由的传媒来揭露黑幕，纾解民怨；

第三，十年开启国门后，对比外部世界，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和学生得风气之先，痛感中共极权体制的弊端，在传统的理想主义感召下，知识界冲破禁忌，起而推进民主转型；在年初连续发表三封致当局的公开信，要求释放已被关押十年之久的魏京生，这成了八九巨变的序幕；

第四，社会缺乏中间力量，缺乏缓冲机制和妥协精神，特别是在全球媒体聚焦注目下的“剧场效应”，双方

更难达成妥协；

第五，是中共高层的责权不统一的“垂帘听政”式的政治结构；

总之，事件的爆发，根本上源于旧的一套体制与意识形态已经容纳不下十年经济改革所产生的内部张力了。

事变的直接导火线，是曾因学运被保守派借机罢黜的中共原开明领袖胡耀邦，于 1989 年 4 月 15 日猝然去世。

北京的青年学子悲愤难抑，纷纷用大游行的大字报表达自己的哀悼与对当局的愤懑之情。同时，公开成立了体制之外的独立组织：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要求与中共首脑对话。这是中共体制内前所未有的。

中共的顽固势力利用这一态势并夸张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作了强硬的表态，这就是恶名昭著的人民日报的 4.26 社论，它要求中共“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面对中共的蛮横，青年学生被激怒了。他们以更大规模的 4.27 大示威游行来回答。这次游行出人意料地成功把运动推向了高潮。

随之而来的，是中共内部两派与学生、民众之间的拉锯战式的较量。决定性的几个转折点是：

5 月 13 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绝食，从此学运变为全民运动。

5 月 16 日，在电视镜头下总书记赵紫阳对来华访问的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公开“透露”邓小平的实际最高权力地位与责任。

5 月 19 日晚，中共当局宣布对北京实行军事戒严。

5 月 19 至 6 月 3 日，来自全国的戒严部队竟然被北京上百万的民众所拦截，难于进城实施戒严。

当时的北京城，一方面是市中心的全球最大的天安门广场，高耸的民主女神像周围，变成了帐篷遍地的和平绝食露营区，成为全球日夜关注的新闻焦点和民主诉求的舞台；另一方面，城外几十万大军压境，步步进逼，北京百万市民通宵不眠，四出劝退和围堵军人军车。

一幅和平民主城市与武装专制军队对峙的壮观历史画面。

终于，6 月 3 日晚到 6 月 4 日，中共军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向和平民众开枪了。一辆辆坦克，一排排

士兵，横行在文化古都的大街上，数百上千的平民学生倒在了血泊之中。

六四，作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的基本诉求和基本命运的象征符号，已经篆刻在了历史上。中国未来的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不得不仔细地聆听 1989 年天安门广场的声音，都不得不慎重地考虑六四亡灵的遗愿。

六四，宣判了共产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死刑。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发生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变：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共产主义失败。

六四的遗产，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七十八、柏林墙的倒塌

戈尔巴乔夫的新政以及波兰团结工会的先例表明，苏联已经缺乏意愿甚至也缺乏力量去干预东欧国家内部的变革和独立倾向了，这就极大地鼓励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勇气。

首先，是匈牙利自 1986 年起加快了经济自由化进程，并且，它还拆除了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警报)障碍。这是一个讯号，意味着东西欧之间的界限第一次松动。

1989 年 6 月 4 日，中国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中国学生与市民的牺牲及中共的残暴震惊了东欧，震惊了全球！人们对共产主义已经彻底绝望了。

就在同年 8 月，东德人获准自由到匈牙利旅游，很多旅客借此渠道进入西德驻匈牙利的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9 月，匈牙利边界完全开放，捷克斯洛伐克也紧随其后配合，于是，小股人流汇成了洪流。三天之内竟有一万两千东德人涌向了西方。这是东德崩溃的开始！

1989 年 10 月 6 日，东德庆祝“建国”40 周年及其所谓“社会主义的胜利”；与此相对照，东德的防暴警察正同各个城市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民众发生激烈冲突。这些抗议活动是由著名的反对派组织「新论坛」以及路德教会领导的。正当此时，戈尔巴乔夫抵达东柏林访问，他告诫惊慌失措的东德首脑昂纳克“只有抓紧时机进行改革才有出路”。10 月 16 日，东德宣布取消前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旅行限制。10 月 18 日，昂纳克被迫下台并被软禁。此后，东德各大城市此起彼伏爆发了空前未有的更大的示威浪潮，要求民主化、新闻自由和真正的选举。11 月 5 日，一万多东德人有的开汽车、有的坐火车、有的步行经捷克到达了西德。11 月 7 日，东德民众涌入西德的速度达到每小时 120 人，这些移民大都相对年轻，有技术，懂专业，东德实际上已出现国家动脉大出血！在此严峻形势下，东德党政领导集体辞职。嗣后，党内改革派主掌了政权。

11月9日，东德被迫放弃了边界管制，如春潮汹涌，数以万计的东德人进入西柏林，欢欣雀跃的人们捣碎柏林墙，登上勃兰登堡大门。从此，矗立了数十年的铁幕的象征——柏林墙倒塌了。它进入了历史的烟尘之中。这一天，成了标志共产主义失败的历史性日子！

东德的与其他东欧国家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民主转型是与东西德的重新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获得了同胞的热情声援。

类似波兰与匈牙利，东德的各政党与组织于1989年12月8日召开了“圆桌会议”，与会的有德国统一社会党(即共产党，后更名为民主社会党)、以前的民主党派、「新论坛」和教会代表等。会议决定，于1990年5月6日举行真正自由的人民议院选举。

1990年1月28日，东德总理与“圆桌会议”各政党与组织代表达成协议，选举提前于1990年3月18日举行；之前，参加“圆桌会议”的在野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政府，而政府派一名部长参加“圆桌会议”；地方选举仍于90年5月6日举行。

1990年3月18日，东德举行了40年来首次自由的人民议院选举，主张统一的亲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取得胜利，获得40.8%，加上盟友共52%的选票，而原共产党只得到16.4%选票。这一结果，不仅标志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唾弃，也标志着对东德的唾弃。于是，8月31日东西德签署了统一协定，德国的统一已经势在必行了。

1990年10月2日，两德正式统一，原东德的疆域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版图之中。经过40年的分离对峙后，一个统一的德国重新屹立在欧洲的心脏地带。

德国的前面展现出一个强大而光辉的前景。然而与希特勒德国崛起时不同，这次它的邻居们并没有表示出恐惧与敌意。因为西德作为民主的西欧之一员，它对二战的德国历史有极深的忏悔，同时它也已经积累了40年的民主宪政经验，并且构成了它的强固传统了。各国希望统一的德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七十九、波、匈、捷的民主转型

民主变革先锋：波兰

前面已经谈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是东欧大变迁的第一道曙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中共坦克正在北京街头肆虐时，1989年6月4日，波兰举行了40年来第一次竞争性的议会选举。结果，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民主派大胜：在按比例分配反对派可以竞争的161个议会席位中赢得160个；在参议院100个自由选举席位中赢得92个。而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按比例分配可以竞争的299个议会席位中只赢得5个席

位，在参议院 100 个席位的自由竞争中连 1 席也未得到。于是，不久前还在监狱或被拘押的反对派们堂而皇之地跨进了庄严的议会大厦。

团结工会的胜利改变了波兰的政治气氛。虽然，按照圆桌会议协议，雅鲁泽尔斯基仍然就任总统，不过，团结工会主导议会抵制了波共候选人担任总理。终于，在 89 年 9 月，《团结周刊》主编、团结工会的支持者马佐维耶茨基律师就任了波兰总理，成为二战结束后波兰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

1990 年，波兰政治局势的迅速发展使并非自由选举出来的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面临极大压力，90 年 9 月，他宣布他将辞职以扫清总统选举的障碍。1990 年 11 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在激烈竞选中当选为波兰总统。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波兰新政府采取了“振荡疗法”以重建其经济。一步到位的解除管制并实施私有化，迅速跨入市场经济。虽然这一战略在短期内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失业率增加，经济一度走低。但从长期看，波兰经济走上正轨，并实现了 6% 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说，转型是成功的。

匈牙利稳扎稳打

匈牙利以卡达尔为首的温和派几年前就开始了变革的过程。除了很早就进行了经济改革外，在政治方面，是从总结 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历史教训入手实施变革的。1989 年 5 月底至 6 月中旬，匈牙利当局为当年的总理纳吉平反，认为“纳吉被处死是非法的，纳吉事件是一个捏造的政治案件。”6 月 16 日，举行纳吉等人重新安葬的盛大仪式，有 25 万人出席。

匈牙利转型过程最显著的特点是谈判与协商。6 月 10 日，匈牙利三方圆桌会议在进行政治协商了近 100 天后达成协议，决定从 6 月 13 日起进行实质性政治会谈。会议有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反对派组织以及各社会组织与运动三方参加，讨论民主进程的原则与规则，以及如何克服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后来，三方又就专门问题进行了秘密讨论，匈司法部长说他正在起草一部从一党统治的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的新宪法。

7 月 11 日至 13 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匈牙利并会见了其首脑。他说他保证支持象匈牙利这样站在改革最前线的东欧国家。

1989 年 11 月 26 日的全民公投是匈牙利政治的分水岭。它标志着该国多党政治的确立。投票结果赞成政党组织退出一切基层单位，清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财产，解散工人卫队。

1990 年 3 月 25 日和 4 月 8 日，匈牙利举行两轮真正自由的国会选举，民主派大胜，匈牙利民主论坛因得到 42.75% 的席位而组阁。共产时代的丧钟鸣响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

捷克斯洛伐克的转型过程由于著名异议人士、戏剧家哈维尔的主导作用，而显得高贵、平缓且富于诗意，史称“天鹅绒革命”。

1968年前苏联摧残“布拉格之春”而激起的民愤，以及1977年知识分子的“七七宪章运动”是捷克斯洛伐克变革的精神资源。

1989年11月3日捷政府改组，新任命的10名部长中有5名非捷共党员。新政府并发表声明，称1968年华沙条约五国出兵捷克破坏了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原则。

1989年11月19日，公民论坛负责人哈维尔当选总统，12月28至29日，原“布拉格之春”的领袖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这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时代结束。

在新国会与总统主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依斯洛伐克意愿分成了两个国家，至此，“天鹅绒革命”已经彻底完成了。

八十、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

齐奥塞斯库王国的陷落

在1989年之前，除阿尔巴尼亚外，罗马尼亚是东欧国家中斯大林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它与北京当局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当东欧各国1989年风起云涌，纷纷摆脱共产主义时，从1965年起就一直垄断最高权力达二十多年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Ceausescu)一仍其旧，坚持独裁，镇压异议分子、镇压宗教人士。直至1989年11月召开的罗共14大上，该党还未表现出任何松动的迹象。

突然，一粒火星在12月15日点燃了！罗马尼亚西部以匈牙利人为主的蒂米什瓦拉市5000多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声援被当局勒令离城的牧师拉科斯。随后，火种扩大，迅速燃烧到了其他城市。

12月21日，刚从国外返回的齐奥塞斯库仍然自信满满，当天居然敢在共和国广场阳台上向公众发表长达7小时的演讲。他声嘶力竭，愤怒喊叫，企图扭转大势。但是，奇迹发生了！他没有料到的是，听众大喝倒彩，向他高呼“可耻！下台！”，在嘘声中他被迫中断演讲，狼狈逃窜。

就在同一天，以罗共原改革派杨·伊利埃斯库为首的救国阵线(the National Salvation Front)宣告成立。

齐奥塞斯库出逃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向全国，道路与领空都被救国阵线封锁。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之下，齐奥塞斯库夫妇在一个植物保护中心束手就擒。

带血的转型

为尽快控制局势，避免大规模流血，救国阵线迅速组成了秘密军事法庭审讯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

检察官以“对抗罗马尼亚人民的罪行”起诉齐奥塞斯库夫妇。齐奥塞斯库不承认法庭的合法性，拒不回答问题。审判长宣称，法庭根据本国宪法进行审判，并最后判决没收被告的所有财产并处以死刑。”12月25日下午4时，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被执行死刑判决处以枪决。其行刑镜头以及该独裁者生前的豪华“宫殿”和财富立刻在电视上广为转播，象闪电一样传遍世界，成为东欧巨变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后，由救国阵线委员会执掌政权，不过该委员会基本上仍在原共产党人的影响之下。后来，在1990年5月举行的多党选举中，由于时间仓促，非共的民主反对派尚未组织起来，因此使得组织化的救国阵线大胜，伊利埃斯库当选为总统。不过，1991年的一届新内阁组成时，里面已经包括了诸如民族自由党等民主反对派的成员了。

1991年12月，罗马尼亚举行全民公投批准了新宪法。该宪法增强了国会的权力，借以制衡内阁与总统。但是，比较其他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罗马尼亚的总统仍享有太大的权限，如：提名总理的权力；此外，总统作为最高国防会议的主席和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国防事务上拥有凌驾于内阁之上的权力；最后，倘若国会连续两次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总统甚至有权解散国会，重新选举。

在1992年举行第二次国会选举之前的3月，救国阵线已经分裂为二：一派是支持总统伊利埃斯库的民主救国阵线，另一派仍称救国阵线，由原总理罗曼领导。另外独立于这两派的民主反对派的联盟称为罗马尼亚民主大会，由康斯坦丁内斯库领导。1992年9月第二次选举的投票结果是，民主救国阵线获得30%的议会席位，罗马尼亚民主大会则获得20%。罗曼的救国阵线由于原共产党的色彩与形象过于显眼而名落孙山。

由于战前实行的君主制，罗马尼亚的民情呈现出特殊的怀旧感。当在海外流亡45年的原国王迈克尔一世于1992年回到故国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对此并无热情且引发激烈纠纷，鉴于多种考虑，前国王最终取消了该年圣诞迁居回国的念头。

于是，在各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后共产主义的罗马尼亚正在缓慢而艰难地迈向民主之路。

八十一、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

由红变蓝——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帝国的覆灭

保加利亚是一个相对落后的东欧国家，从 1954 年起，一直由死忠于苏联的日夫科夫控制。然而，讽刺的是，也正是由于他紧跟苏联，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吹起“新思维”的号角时，他内心虽然反感，却也只能跟着调子跳舞了。不过这一跳，局势遂失去控制，无法收拾了！

1987 年日夫科夫追随时髦，提出所谓“七月观念”以示自己拥抱改革，其内容包括推进政治民主化、扩展新闻自由和尝试非单一候选人的选举，还承诺进行行政与经济的再组织等。然而所有这些都口惠而实不至，它们很快成了空中楼阁。不过，在这种气氛下，异议分子破土而出，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对政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989 年 10 月 16 日，欧洲环保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开幕。异议分子的组织借此机会，积极活动。如著名的“生态公开性”就举行了一千多人的集会，会见外国记者，征集了 4500 多人的公开签名，成为该国 40 多年来最大的一次非官方集会。

1989 年 11 月 10 日，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日夫科夫辞职，由外长姆拉德诺夫继任，新首脑允诺要“把保加利亚建成现代化的民主与法制的国家”。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一系列与其他国家相似的连锁反应迅速发生：异议组织合法，言禁开放，政治犯大赦，工会独立，反对派结成联盟，当局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终于，在 1990 年 6 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选，社会党(原共党改革后改名)得票 47.15%，民主力量联盟(反对派联盟)得 36.2%。而在 1991 年 10 月的第二次全国大选中，民主力量联盟获票 34.36%，社会党得 33.14%。其时，反对派领袖热勒夫(Zhelev)已经担任总统。就这样，保加利亚在史称“由红变蓝”的渐进过程中，完成了民主转型。

至此，日夫科夫的傀儡帝国彻底寿终正寝了。而他本人，也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铁托帝国的解体及其后果

铁托(J.B. Tito)的南斯拉夫是最早独立于苏联，另搞一套的东欧国家。作为二战反法西斯的英雄，铁托用铁腕牢牢地长期控制了这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并且不买斯大林的账。但是，当他 1980 年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的危机就降临了。

由于继承者们缺乏铁托的权威，联邦中央实行主席轮流坐桩的委员会制，从而联邦当局的权力越来越无足轻重。这种真空化的中央权力使得各邦实权增大，变成类似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雄的局面了。又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政，各邦共和国也不象过去一样害怕苏联需要依赖中央的强大军事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独立了。于是，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分散化的过程中，原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联邦终于解体。然而，这一非共的解体过程并未象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有民主的多元化的群众运动作基础，而是以种族的、宗教的区别为主要动力和精神资源的。鉴于此，原铁托帝国的解体是伴随着狭隘民族主义的迅速膨胀为基本特征的。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各邦都打出了民族主义旗号，并以之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

在上述解体过程中，发生了众多的流血、骚乱和内战，并导致了联合国以及北约的国际干预。其中，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族的武装冲突，波黑共和国内的流血，发生在科索沃的种族大清洗.....，所有这些动荡中，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不宽容的宗教情绪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直至目前，这一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区仍是全球的一个冲突热点。在原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形成的国家中，只有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人民是幸运的，他们比较早地进行了改革和独立的进程，以成熟的政治智慧逐步使自己的国家走上了真正多元化和议会民主的道路。

八十二、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后期的苏联

当初，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政治和文化改革，鼓吹“新思维”的自由化政策时，恐怕没有料到它会如此快地在东欧各国引起重大政治后果——铁幕崩裂粉碎。到1989年底，东欧已大变，苏联将走向何方呢？事实上，作为一个庞大帝国和共产阵营的始作俑者，“庆父未死，鲁难未已”，苏联仍存，红色阴影就仍在，它就是世界的一块心病。各国仍不得安寝。因此，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苏联的动向。

实际上，早在1989年，前苏联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在1939-1940年被强行并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已经纷纷表达出了独立的诉求。

1989年12月31日，戈尔巴乔夫发表新年讲话，指出：“过去的一年，革命革新的浪潮席卷了东欧。.....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自由和公正的社会。”

1990年1月，激进改革派的代表叶利钦说他们在最终目标上与戈尔巴乔夫是一致的，但却主张采取更加激进、更为坚决果断的策略来推进改革。20至21日，叶利钦等176名代表组成了「民主纲领派」组织，宣称代表了苏共三分之一的党员。

1990年2月5日至7日，苏共举行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作了主题报告，向前跨了一步，接着，叶利钦代表「民主纲领派」作了针对戈尔巴乔夫十条报告的发言，提出了自己的更彻底的十条，即：放弃所谓「民

主集中制」，实行普遍民主；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以及各加盟共和国依据自愿原则联盟等十条激进主张。

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过去斯大林时代大量受迫害的人恢复了名誉，并对积极参与镇压的人给予了刑事惩罚。一个新的政治宽容的时代降临到了历经苦难的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1990年3月1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新宪法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总统。按照宪法，总统享有极大的权力。希望以此来推动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改革。

但是，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危机都日益严重了。

在经济上，苏联由于国有制的低效率以及军事工业的拖累，困境已经日益严重，每下愈况，积重难返，已面临破产的边缘。

90年2月与3月，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先后公开宣布独立，与苏联发生了严重政治与军事冲突。5月，三国并签署《一致与合作宣言》恢复三国在二战前的波罗的海委员会同盟，并致函美国总统布什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要求承认三国独立。接着，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分裂倾向也日益明显，希望脱离苏联而去。

5月29日，前苏联的主要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经过激烈的选举争夺，选举出了叶利钦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表示将致力于实现俄罗斯的主权，“保卫自己不受中央支配”。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规定，在该共和国，本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共和国享有包括自由退出苏联等条款在内的一系列自主权。

山雨欲来风满楼。苏联面临着解体的重大危机。

1990年7月2日，苏共28大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前进目标。并允诺一系列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改革措施。但是，已经晚了。苏联作为一个庞大的共产帝国，已经风雨飘摇，难于支撑了。

7月12日，叶利钦在苏共大会上发表声明，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给了这个帝国以最后一击。

八十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前面已谈到，在1990年，庞大的共产帝国——苏联——已经摇摇欲坠了。

1991年1月，全苏联的民意调查问卷中，对于“苏联给了人民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民众中68%的答案是：短缺、排长队和贫穷。戈尔巴乔夫受到两面夹击：一方面，叶尔钦，作为俄罗斯第一位民选总统，同时用激进和粗鲁的语言把戈尔巴乔夫与强硬派绑在一起攻击。另一方面，保守的强硬派报纸宣称“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死亡、破碎，陷入黑暗和虚无的深渊。”

苏联已处于危机之中。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管这些明显的迹象，仍然一如既往，于1991年8月初携家人离开莫斯科度假。他不知道，一个巨大的阴谋已在酝酿之中了。

8月17日，在以金钱诱使克格勃军官们从休假返回莫斯科掌控首都后，一个以原克格勃头子为首的、由共产党强硬派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发动政变，接管了苏联。他们于18日通知远离莫斯科毫不知情的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发表声明“以健康的原因辞职”。政变阴谋家们控制的电台和电视台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国家紧急委员会接管政权。

叶尔钦获知政变消息后，马上在俄罗斯议会大厦组成了自己的新的“白宫”以处理危机。当时，坦克与军车隆隆地开进莫斯科，包围了市政府与“白宫”。叶尔钦与他的副手、阿富汗战争的英雄一起在白宫用广播谴责了政变。中午过后，叶尔钦不顾危险、出其不意地跳上“白宫”之外的一辆坦克上，激昂地向公众演说：“公民们，我们合法选出的国家总统被剥夺了权力！我们一定要同保守派、反动派和反宪政主义的政变作斗争！.....”“你们可以用刺刀撑起王冠，但你不能长久称王！”在公众欢呼下，坦克掉转了炮口。叶尔钦的“白宫”被支持和欢呼的民众保卫起来，被围得水泄不通。空军也扬言要轰炸政变者的克里姆林宫。

于是，政变在全苏联与全世界的反对下，终于在8月21日失败了。坦克车队在公众的欢呼声中撤出了莫斯科。

一夜之间，叶尔钦成了拯救国家的英雄。

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但是，他首先不是回到苏联总统办公室，而是到了俄罗斯总统叶尔钦的办公室表示感谢。虽然他仍然宣称要“更新”党和苏联，但在事实上，二者都成空壳了。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党的总书记职务，解散了中央委员会。接着，黑海边的两个加盟共和国-摩尔达维亚和乔治亚-宣布独立。其余的十个共和国达成协议，创建一个非中央集权的、松散的“国协”，其中的各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戈尔巴乔夫希望中央能管国防与外交，但叶尔钦不同意。他的想法是，苏联总统纯粹是礼节性的，就象英国女王一样。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袖在明斯克会面，宣布苏联的结束以及新的、由独立

国家组成的“国协”的诞生。12月21日，原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代表在阿尔马—阿塔集会，确认了上述协议。大家同意，原苏联的正式结束将在本年度的最后一天。

在这种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于圣诞节次日辞职，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成了一介平民。

至此，欧洲的最后—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寿终正寝了。73年前，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政变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成为血腥超级强国的苏联，终于彻底崩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画上了它的猩红色的句号。华沙条约解散了。除了在亚洲的几个残余共产国以外，—场弥漫全球的冷战，在它的主战场上已经结束。自由与民主战胜了它在本世纪的第二个、也是最为蛊惑人心的敌人。

在这一意义上，苏联的解体是有它巨大的历史象征性的。

八十四、冷战后东欧的艰难转型

柏林墙1989年11月9日倒塌，苏联1991年底解体，戏剧性地标志着冷战在主战场的结束。

但是，历史并未终结。

人们低估了从极权社会转型为正常社会的巨大困难，低估了共产主义对社会机体的严重摧残。从狂喜中冷静下来的东欧各国，通过种种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诸如—步到位的“振荡疗法”，国有资产以债券方式平分到国民头上的办法，企业职工平分企业资产的方法....等等，突然意识到，要把通过暴力掠夺私有财产充公的公有经济，还原为过去的保障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正象要把“鱼汤变成鱼”—样，其难无比，是对人类的历史性挑战。

由于过去的问题积重难返，因此，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初，几乎无一例外，都经受过经济低落，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所谓“转型的阵痛”阶段。常常需要经过好几年之后，才开始逐步走上正轨。一般说，短期效果是负面的，长期效果则是正面的。各个国家过去的历史背景不同，人们对它们的预期和实际路径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些前所未有的经验教训，为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转折类型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案例。

其中，德国问题比较特殊，原西德可以为东德同胞提供转型基地和财政支援，应当少费时日。但即使如此，德国—位政治家仍说：我原来认为，东西德完全融合要花十年，然而，现在我相信要花四十年。由此便可以想见其他东欧国家的极端艰难了。

由于过去的政治经济基地不同，后来实施的变革政策也不同，因此，东欧各国的转型道路和痛苦程度是很不平衡的。

一般而言，在 1989 年之前就逐步实施了改革的国家，转型过程相对顺畅一些。例如，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由于改革超前，因此，虽然也经历过私有化民主化变革的艰困时期，但是为时较短，后来都逐步进入了正常发展的阶段。以波兰为例，最近连续六、七年，波兰的国民生产年增长率都保持在 6% 左右，去华沙参观，已经感觉不到与其他西方国家有什么差别了。

但是，对原来一直抵制改革的共产国家，譬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情况就不妙得多，它们现在仍在经济困境中挣扎。

而前南斯拉夫，由于前面谈过的民族与宗教问题，造成复杂的纠纷与战乱，并导致国际干预。至今其中的塞尔维亚和蒙特尼哥罗联邦，仍为前共党分子操纵，成为欧洲唯一的肿瘤。

不过，总起来看，东欧已经汇入全欧洲，进入国际主流。特别是，最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扩充组织，吸收了绝大多数原东欧国家成为会员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民主国际。即，欧洲各国成为清一色的民主国家，实现了欧洲多年来的梦想。借助这一整合性的欧盟，欧洲又一次担当了人类的带头羊角色。

八十五、中共抗拒世界潮流

回过头来看中国。紧随着六四之后，东欧与苏联的共产政权的突然崩溃，极大地震撼了北京的中共领导阶层，苏东剧变成了令他们寝食不安的恶梦。北京从反面吸取教训，那些在六四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中央顽固派以此为借口和警戒，在“治理整顿”名义下清算改革措施，并加紧了全方位的镇压。天安门事件之后两年多，整个中国成了一张绷紧的网，大清洗，大搜捕，大逃亡，冤狱遍于国中，社会鸦雀无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发起的经济改革，也面临全面倒退的危险。

鉴于改革的成败关系到邓小平后半生的全部事业，为挽救其改革的命运和自己的历史声誉，为扭转中国在六四之后的全面倒退，199 年春天，邓小平以自己年迈的萎萎之身，南下“巡视”，疾呼“不问姓社姓资，加快改革”，疾呼“谁不改革，谁就下台”，疾呼对改革中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不争论”，于是，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比六四前更疯狂的“淘金热”，并且因胡赵时期奠定的经济基础以及遭逢国际资金流入的历史机遇，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奇迹般成长。

但是，邓小平采取的是“经济放松，政治收紧”的方针，从而使中国出现一种畸形的发展模式。

没有政治改革、缺乏法治的经济放松，是一场无规则游戏，是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它的经济“解放”机制，蕴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前提里：在大街公开杀人之后，一条最难的心理“禁忌”和防线都冲破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于是，姓社姓资、道德规范、法律条文，礼仪廉耻，亲

情信用.....通通丧失了约束力。意识形态靠边了，所有的价值系统都崩溃了。于是，一个空前的制度化的腐败和伦理真空降临中国。除了政治禁忌，其余百无禁忌。

在政治上，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信誉，为了抗拒宪政民主的汹涌浪潮，中共开始打起了民族主义这张牌，这是它剩下的最后一道合法性防线了。这里有一个奇特的对比，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在东欧，是促成共产主义崩溃的巨大力量，但是，它在中国，却成了挽救共产政权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了，其作用刚好相反。不过，我想指出，民族主义对中共的帮忙将是极其有限的，它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它会回过头来吞噬玩火者本身。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它在中国的具体状况。

八十六、苏俄：艰难的转型

1991年年底，原苏联裂变，15个加盟共和国独立，组成以独立国家为成员的“国协”(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而俄罗斯则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遗产。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作为在人类史上建立共产制度的第一个国家，也是共产体制存活历史最长(达七十多年)的社会，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遭遇到特别大的困难。叶尔钦(B. Yeltsin)政府采取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振荡疗法”(shock therapy)，企图一步跨越到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不幸的是，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象波兰，该法未能在短期内奏效。虽然叶尔钦成功地从西方获得了一些急需的财政援助，但仍不能解决日益恶化的经济困境。大众生活水准下降，民怨逐步沸腾。

在政治方面，在任总统的第一年，叶尔钦处于与原苏联遗留下来的反对经济改革的“最高苏维埃”(即国会)的激烈冲突之中。1993年4月叶尔钦虽然赢得了全民公决的胜利，但与国会的矛盾却愈演愈烈，最后竟然演变为武力冲突。1993年10月，忠于叶尔钦的部队炮轰了“最高苏维埃”大楼，随后逮捕了反对派首领。在1994年12月新修订批准的宪法进一步强化了总统的权限，使叶尔钦实际上处于不可挑战的地位。

不过，他于1995年对车臣共和国的用兵及其导致的僵局，大大地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使他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

在俄国国内，转型期间除了代表民主的力量与前苏联残余的共党力量之间的反复较量外，另一个触目的特点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个蛊惑人心的号召就是恢复并重建昔日苏联大帝国的霸权与光荣，对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俄罗斯民众来说，它确实有很大的诱惑力。然而，这种民族主义也会激发原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从而抵消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扩张。车臣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俄国人可能还要经受相当长一段磨难，才能逐步迈入正轨。但是，即使是现在的艰困时期，俄国多次举行的重大选举反复证明，对于“艰苦的当下现实与昔日的共产主义究竟何者更为可取”的问题，他们的选择是明确的：拒绝返回旧时代。

这是俄罗斯人自己的历史性抉择。它已经不可逆转了。

八十七、中共乞灵于民族主义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失败，中共已经强烈感受到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合法性危机。有鉴于此，北京急于寻找一个精神上的替代品，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普遍的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这时，一帖近代史上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就是——民族主义。几十年来被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和竞争掩盖了的民族主义，在冷战之后的世界各地脱颖而出，异常活跃。诚如 18 世纪的英国人萨缪尔·约翰逊 (Dr.Samuel Johnson) 所说：“民族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庇护所”，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最后救命符。它的战略是：回避共产教条而求助于民族主义，以此作为自身抗拒民主的最后堡垒和防线。

北京的这一转向，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逐渐得手，从而使六四之后统治阶层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 1) 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制度转型当时正在付出沉重代价，经济凋敝，民生艰困。北京开动机器大肆夸大宣传并以此阻吓中国人；
- 2) 1993 年，北京争取 2000 年奥运会主办权失败，使中国一般大众产生强烈挫折感，从而对西方大国的阻挠不满，并进而认为发达国家的人权呼吁含有西方国家利益自身的功利目的，遂兴起带反西方色彩的民族主义。
- 3) 在经济发展的客观态势上，中国与西方已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也成为民族主义的刺激性因素。
- 4) 在后冷战时代，哈佛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当时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预言：文明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与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随后，为亚洲的威权政府辩护的所谓“亚洲价值论”，获得了北京的青睐，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 5) 1996 年因台湾直选总统而引发台海危机，美国航空母舰介入，以防中共“擦枪走火”开启台海战端。这一紧张态势，在北京的单面宣传下，也成了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要素。

如此，在官方的默许与鼓励下，中国大陆几个年轻人模仿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主义者过去所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亦步亦趋，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小册子，强烈煽动民族的“被迫害意识”，强烈鼓吹反西方的情绪，把民族主义推向了高潮。它用一种最极端最夸张的形式表现了中国大陆相当部分的民众及知识界的思潮转向，同时也显示了这种思潮的浅薄浮泛和内容的空虚无力。北京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已达到其政治目标的同时，后来日益发现，这一思潮是双面刃，它既可帮助北京抗拒宪政民主，但同时也可能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提供思想武器，使之寻求独立。中国知识界富有理性与责任感的成员，也日益认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提供内容丰富的方向性的贡献，不可能阻挡民主发展的世界性潮流，肯定是会被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所淘汰的。

八十八、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

自从亚洲“四小龙”在六、七十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后，多年来有一种论调颇为流行，认为“东亚模式”的成功表明民主对于亚洲国家并无必要。因为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都没有实行自由民主：韩国、台湾实行威权统治，新加坡并无新闻自由，英国殖民地香港虽有自由法治但无民主。但是当时它们的经济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有鉴于此，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后来甚至提出一套所谓“亚洲价值论”以作总结，借以说明亚洲自有一套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是亚洲国家独特的政治经济生存方式，它们并不需要民主宪政和法律规范下的自由市场。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并非普遍价值，只是西方人独有的特殊偏好罢了。

但是，历史却偏偏不买账，它并不偏好这一亚洲统治者所喜欢的理论，而是迅速嘲弄了所谓“亚洲价值”。从1997年七月二日泰铢大幅贬值开始，象连锁反应一样，东亚各国发生了剧烈的金融风暴。它席卷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则受到轻微影响。亚洲主要的自由兑换货币全面贬值，港元虽坚守与美元联系汇率不变，但香港股市、房市惨跌过半，百业萧条。中国大陆因为尚未实施自由兑换货币制度，所以当时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影响是后来慢慢渗透进去的。

经过专家的对照分析和研究，人们大体获得了如下共识：东亚金融风暴之成因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信任人际关系而不信任制度，信任强力政府而不信任市场。由于缺乏规范的金融控制制度和机构，中央银行贷款给亏本的国营企业或家族、亲朋好友企业而面临破产，因此无法按市场需求去分配外来资本，并且缺乏对经济和政治起监督作用的新闻传媒(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金融危机正是这些国家制度性积累的后果。而这些制度文化特性，正是在所谓“亚洲价值”影响下形成的。

因此，这场危机并不单纯是经济危机，而且也是政治危机。它的基本政治内涵是：“东亚模式”破产，“亚洲价值”贬值。它同时表明，在人类的政治经济生存方式中，确实是存在某种普遍性的。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抗拒它们，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亚洲金融风暴已经产生了它的政治后果，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南韩与印尼。我们将在以后讨论。

八十九、1998：“北京小阳春”

在中国，自六四事件后，对于大陆内部趋向民主的因素，北京当局发誓要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在这种报复性的、残酷强力的政治镇压下，在六四屠城和随后的大搜捕、大清洗的恐怖气氛下，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力量陷入相当长一段沉寂或低潮。

1992年后，由于邓小平“南巡”的政治发酵功能，商业大潮兴起，官方意识形态衰微，中国社会逐步出现了一些新的空间。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知识界，一步一步在重新汇聚人文精神以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研讨的气氛。

中国的这种松动，源于几个基本的因素：一是国际社会的外缘影响与压力，二是国内的努力把中国引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力量：其中部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是需要引入国际通行的法律来保障自己财产权的致富者；还有的甚至是中共内部急于用经济成就来使中共重获统治合法性的人。而经济成长与加入国际主流秩序是息息相关的。

1997年初，中国的强人邓小平去世，一个新的历史机会开始呈现出来。

邓的继任人江泽民开始从外交入手探索自己的政治方向。包括以经济改革闻名的朱熔基总理在内的新领导集体利用大陆市场作诱饵，扩展中共的国际地位。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压力，在此期间，北京先后以保外就医名义释放了魏京生和王丹这两位最著名的异议分子到美国，并达成了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于1997和1998年互访的愿望。

自1998年春起，在北京的大学和学术团体开始掀起一场有关民主的争鸣，知识分子要求限制共产党的权限。在中国思想政治领域，活跃的气氛正在悄然兴起。知识界重新引进和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出来“破题”，他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知识界还建议政府接受源自西方的普遍人权标准。还有人公开提出中国需要像美国那样，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在克林顿访问时，北京电视转播了他批评六四镇压的克江辩论。北京还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联合国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在1998年6月美国总统访华时，中国杭州的异议人士甚至公开申请组织「民主党」，从而使这一波异议政治活动达到高潮。

中国出现这种所谓「北京小阳春」，显然与邓下平的去世、北京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以及中美首脑互访

三个因素有关。

然而，这种宽松实际上是很有有限并且是尝试性的。主要限于体制内的学者和专家，绝对不允许独立工会和民办刊物等。一旦当局发现稍有失控迹象，马上重返镇压的老路。

九十、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印尼的民主化

（一）印尼学运与苏哈托下台

东亚金融危机的政治并发症，首先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生。

自从 1997 年下半年危机爆发后，印尼就成为一个重灾区：经济大幅衰退，贪渎横行，民不聊生。到 1998 年四、五月，整个国家已险象横生，危机四起，印尼社会接近解体。于是，象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青年知识精英的“为民请命”意识风起云涌，反对苏哈托独裁及其家族腐败的学生运动汹涌澎湃，席卷了首都雅加达。

苏哈托当政期间，实施严格的专权统治，学生运动难成气候。这次苏哈托政权开始也仍想用镇压来解决。但是如此大的规模是过去没有的；加以这次学运的诉求非常单纯，就是要求政府进行改革，所以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同时，国际社会也对苏哈托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而且，一些军方将领也支持学生要求政治改革；还有，国会首脑在关键时也要求苏哈托下台；最后，印尼民主力量有其组织化的历史，可以实施有进有退张弛适度的组织及领导；因此，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过程：有六名示威学生被枪杀，并面临“戒严”的威胁，但组织化的政治智慧之运用，却使预定的“五二〇”大游行紧急叫停，终于意外地迎来了胜利——苏哈托的自动辞职。

人们注意到，98 年印尼事件中，有中国“六四”的幽灵在盘旋。因为，在紧急时刻，军方强硬派曾公然以“六四”向印尼学生威胁。而印尼人民的胜利，意味着印尼学生成了中国的“天安门遗嘱”精神的执行人。

（二）印尼的民主选举

苏哈托下台后，其继任人哈比比施行了部分“非苏哈托化”：释放异议人士，部分开放报禁，开放党禁。于是在 1999 年 6 月 7 日的国会大选中，原执政党退居第二位，由梅加瓦蒂领导的民主斗争党成了国会第一大党。1999 年 10 月 20 日，印尼举行总统、副总统选举，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由人民协商会议选出，其中 462 名是直选的国会议员，38 名军方指派的国会议员，135 名是省议会代表，65 名为各团体代表，共 700 名。这次印尼 54 年来第一次“非内定”选举的结果。身体衰弱、双眼几乎失明的瓦希德得票第一，当选总统；梅加瓦蒂第二，当选为副总统。梅加瓦蒂虽然是国会第一大党领袖，值此关键时刻，深明大义，

表现出政治家的风范，呼吁支持她的民众接受选举结果。于是，印尼在历经艰难曲折之后，终于走上了民主之路。

九十一、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1999年，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境内的科索沃地区，一场种族灭绝的屠杀愈演愈烈。由于该地区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坚持地方民选政府自治，有独立倾向，于是与该国占统治地位的塞尔维亚人产生了利益冲突，于是阿族人遭到南国军队的血腥屠杀，其状惨绝人寰。在多次和平干预谈判无效的情况下，自由欧洲各国与美国一致决定进行军事干预，以阻止在这一欧洲历来的“火药桶”地区人权遭到进一步的蹂躏。

为避免俄罗斯与中国的否决，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科索沃地区塞族的战争机器进行了70多天的大规模空中轰炸，最后终于迫使塞族军队撤出该地区，并由北约以及俄国的维持和平部队进驻维持秩序，调查种族灭绝的罪行，并提交国际法庭审判。

在20世纪末，科索沃事件留下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哲学遗产。首先是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的确立。它使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贯穿到19世纪的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原则遭到历史性打击。过去常被政客们挂在口头的“内政不可干涉”、“国界不容侵犯”的原则再也不是至高无上无条件的了。倘若享有主权的某国政府极其明显、极端严重地侵犯践踏了本国国民的人权，特别是滥杀无辜时，国际组织在道义上就具有进行干预从而维护该国国民人权的权力。其次，它还确认了“公民自决”、“公民投票”、“地方政府民选”、“地方自治”这些原则已经超越了“国界不可侵犯”原则的地位。当某中央政府要强行收回民选地方政府的自治权时，它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阻止。这些是人类特别是欧洲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获得的共识。人们知道，一旦容忍了某国政府以主权的名义关起门来残害本国的无辜，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与正义。

上述原则是新世纪的重要原则。它代表的是人类文明标准在空间上的扩展，它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理念在空间上的扩展。虽然，还有个别国家的统治者以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名义来维护自身在国内的极权专制地位。但科索沃事件昭示着，新的国际文明游戏规则正在确立，新国际秩序正在降临。而这一秩序的核心，就是人权的至上性，就是自由与民主的优越性。作为新世纪曙光，这一潮流正在日益壮大，很难抗御了。

九十二、新千禧年十字路口的中国

在世纪与千禧年之交，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中国都处于巨大变迁的前夜。经济上，20年的改革把在该体制内能作的事容易作的事都已做完，剩下的都涉及基本体制的变革，特别是在金融体系方面，向毫

无效率的国有企业长期输血的结果，导致中国银行坏账如山，几乎占总量的一半。很显然，国有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巨大包袱和癌症；社会上下岗失业人员的生存压力愈益增大，不满情绪正在加速积蓄，一触即发。

政治上，中国的反对派正在重组阵营，“民主党”的出现及其在当局镇压下呈现的活力，表明中共已经再也不可能使用“鸵鸟政策”、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反对派及其政党的存在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使民间的精神重建以及宗教与准宗教活动蓬蓬勃勃，以至出现法轮功风起云涌这类中国历史上王朝末年的典型征兆。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解体后，北京当局对人权的侵犯已成为众矢之的，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正在推动和促进中国制度转型，从而成为中国进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强大推动力。

在尝试了种种经济的政治的、邓小平式的和毛泽东式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统统无效之后，在国际潮流和国内经济的强大压力下，在几经犹豫徘徊和内部激烈争执后，北京当局终于在新千禧年前夕作出让步，同美国签订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协议，从而在 2000 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完全进入国际市场；联系到北京前不久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联合国最重要的人权公约，这一切举措，使中国在书面上和形式上，不仅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同时也是在法律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向国际主流秩序靠拢的重要一步。

虽然，书面不等于行动，形式不等于实际，北京政府是否能遵守承诺，鉴于其以往的记录，一直是国内外有识之士忧虑和关注的焦点。但是，有了书面条约的约束，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就有了监督和批评北京政府行为的更强有力的依据，并且世贸组织的执法机构就获得了权力以惩罚违反规章的行为。因此，虽然还会发生预料之中的反复与曲折，但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新世纪里，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非民主国家向现代民主的演进是无庸置疑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非民主国家进入国际大家庭共创自由繁荣的新千年也是无庸置疑的。

九十三、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1）

在二十世纪和在二十一世纪之交，由于前述的在经济政治各方面中国处于十字路口，由于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与世界交流，产生了两个基本后果，促动了知识界思考与良知。首先，是公正问题。由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贪污腐化愈演愈烈，社会公正问题困扰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思绪；其次，是民族主义问题。由于中国更多地更深刻地和世界打交道，各国之间利益冲突浮上台面；加上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留学或被迫流亡海外，这就强化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有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等问题，进入了思想界思考的核心。

于是，中国知识界通过消化中国的现状，包括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之后，开始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最后慢慢地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群体，虽然实际上每个人的思想脉络都不尽相同，但是大略上还是可划

为所谓的自由派和新左派。论争并不是近一、二年才有，其实一九九五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如一九九五年4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转型期思潮及流派》研讨会上，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王绍光、崔之元、甘阳都在场，他们与其他观点不同的学者如林毓生、胡平、陈奎德、吴国光等都有过争论。后来香港和大陆的刊物，也发表过双方部分学者以及李慎之、卞悟(秦晖)、徐有渔、朱学勤、汪丁丁、刘军宁、许纪霖以及汪晖、韩毓海等人论战的文章。

更显著的标志是在1998年，李慎之先生当时在北大百年校庆时为自由主义“破题”，他在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所作的序中，开宗明义指出：

“值此北京大家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自此之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日趋激烈了。

这里概览一下双方争论的四大焦点：

第一、对当今中国现状的判断：中国目前是已经进入了全球主流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还是没有？这里我们不想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最多代表主流秩序的经济侧面，不能涵括政治、文化体系；况且即使用它来描述经济体系，也不如“市场经济秩序”准确，因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概念，同时本身还带强烈的历史遗留的褒贬色彩。

第二个焦点是，从价值选择战略上，中国应该进入还是应该对抗、或退出世界的主流秩序，或另行创造“第三条路”？这是一个根本的焦点。

第三，中国目前的社会公正问题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带来的，还是新旧体系在转轨时期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才造成的？

第四，如何评估二十世纪冷战的历史？

我们会在以后详细讨论这四个焦点。

九十四、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首先，对中国现状的事实性判断应当是立论的基础。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被纳入了跨国资本支配的体系，因此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反对西方资本的宰制。而自由派则认为这一判断不合中国实际，在中国，仍然是不受制约的国家政治权力的宰制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且这一政治权力已经全面侵入了远未成熟的“半吊子的市场”，正使权力转换为财富。

我们可以独立判断双方何者更符合实际。

第二，中国应不应该进入全球主流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一百多年来，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就是中国关门的时代。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是最黑暗的，同时也是闭关锁国最厉害的。邓小平时代开始开放，公认是对毛时代的进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进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是符合中国人福祉的，相反，对抗国际主流体系将给中国人带来灾难。

这一问题还涉及民族主义问题。因为进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就意味着遵守其“游戏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可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和言论自由等，这意味着对政府权力、对主权的某种限制。在中国国内的主导秩序与国际主流秩序的对峙中，大体上，新左派站在前者的立场，而自由派站在后者的立场。

第三，权力制衡与政治参与孰轻孰重？自由派认为，归根结底，中国目前的社会公正问题、腐败问题是由于新旧体系在转轨时期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才造成的，因此，限制政府权力，目前是中国最该做的事情。这就涉及到政治参与是否更为重要的这一问题。而新左派认为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不重要，政治广泛参与才重要。自由派觉得刚好是相反。他们认为限制权力，分解一元化政治权力，形成权力的某种均衡或制衡，恐怕更重要更优先。

广泛的政治参与当然也重要，但是倘若你没有一个有限政府，缺乏制衡，缺乏人权保障的话，扩大政治参与可能造成大悲剧。毛泽东时代不能说政治参与不够，政治参与是很广泛的，但是造成的是什么样的悲剧！

腐败和严重的贫富悬殊，只有通过政治权力尽量退出市场，舆论自由，司法独立，在市场的基地上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才有可能逐步解决。因而重点应放在宪政体系的建立上，而不是相反。

有些左派喜欢引用罗尔斯(J. Rawls)，他诚然是当代自由主义很重要的一家，但是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中，罗尔斯还是强调自由原则第一优先，之后才谈得上照顾最弱势的人，才谈得上公平原则问题的。他首先还是自由原则第一。而且这种优先还是类似字典字母排列顺序的那种绝对优先，即是说，要把这个第一与第二分得非常清楚，不容颠倒。

九十五、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3）

第四，个别新左派还有一个潜在论点，他们反对从根本上批判共产革命。他们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毛式农民革命等等都是法国革命以后的世界历史大势。既然象“古拉格群岛”、象中国 60 年代初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是必然付出的代价，因此批判它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样，他们用这种黑格尔式的所谓“历

史合理性”来使过去悲剧的制造者豁免历史的审判。这就导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有没有进行历史评价的权利？

与此相关，新左派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呼吁放弃冷战思维。但是他们的方式是完全回避冷战的是非。冷战双方是否就是半斤八两？新左派言外之意就是：冷战的双方都错了，结局并没有任何胜负。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评判八九年到九十年代初的世界性历史剧变。如何评价这场剧变是一块试金石。是正面肯定它，还是认为过去冷战大家都错了，没有胜负，社会主义阵营(共产极权)是该打五十板子，但自由民主阵营也该挨五十板子？这也是核心问题之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失败这件事情是无法回避的。二十世纪的制度竞争，在世界史上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过去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如此对比鲜明的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在地球上对峙。最后清清楚楚地看出：哪一边是胜方，哪一边是败方，哪一边是正义的，哪一边是非正义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

不过，平情而论，左翼的批判并不是没有贡献的。众所周知，现在西方不少国家的执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等，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二国际，也就是所谓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对马克思的所谓“修正主义”的脉络。直到现在，还有社会党国际每年开会。这些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他们的价值倾向确实比较更偏向平等这一面，与美国的传统是有相当区别的。而上述这些人，当初他们都是集合在马克思的旗帜之下的。但是后来，在 19 世纪末，他们已经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些根本的问题。所以他们提出修正，主张走议会道路，希望在议会里得到更多的选票，进而执政，来贯彻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可行的一条道路，而且也是对于那些赋有强烈的公平感的人们的一条现实的、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道路。

中国知识界这种思想交锋，由于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不受政府的操纵，这是大好事情。大家把基本问题更进一步地澄清，这对中国未来的走向相当重要。虽然他们现在讨论的理论问题似乎和中国社会大众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后，就有可能成非常热门的问题，成为国家方向的问题。有鉴于此，它对中国在 21 世纪的宪政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

九十六、“9.11”事件：历史的转折点

柏林墙倒，苏东解体，尽管还残存有中国等亚洲共产党国家和古巴，但它们也几乎都在挂羊头，卖狗肉，正在改变自己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方向。因此，共产主义在观念上已经无可争辩地失败了。福山（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的自由主义凯歌曾回旋在世纪之交。

然而，不久之后，突然发生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9.11 恐怖袭击。它改变了上述弥漫全球的乐观主义基调。

2001年9月11日，世界金融之都纽约世贸中心那两座耸入云霄的高楼，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怖袭击下，瞬间灰飞烟灭。这件事极强地象征了现代文明的某种脆弱性。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灿烂的文明，它们是经过多少世代，历经千辛万苦点滴积累，才达到辉煌繁荣之顶点。人们熟知的玛雅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其夺目之光，常常使后人叹为观止。然而，它们现在都消失了。

文明的建成与文明的毁灭是极端不对称的。事实上，所有文明都是脆弱的。无论多麼辉煌壮丽看起来垂之永久的文明，都可能一朝崩塌，无影无踪。

「九一一」悲剧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从此，美国的焦点对准了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而意识形态和区域霸权的竞争对手，已从美国优先处理的名单上大大靠后。而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风头，现在也让位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了。

面对如此残酷的恐怖袭击，美国政府面临三种不同的路径选择：

第一条路，对穆斯林极端主义派别开展大规模「圣战」，是战争变成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正如当年的十字军东征一样。这恐怕是通向巨大灾难之路，而且也是宾·拉登之流求之不得的结果。实际上，这次恐怖袭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挑起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仇恨战火，发动一场世界规模的「圣战」。倘如此，则冤冤相报，旷日持久，现代文明将步入自我毁灭的深渊。

第二条路，主要依靠美国本身力量，打击窝藏和包庇恐怖主义的国家，不在乎盟国的感受和联合国的授权，实施“先发制人的战略”，并借此美国和全球民意可用之际，顺带解决最突出的反美独裁政权。

第三条路，是最不容易立竿见影获至成效之路。它执行起来是相当艰难、无趣、漫长且缺乏刺激性，但可能使较少后患和比较根本的。这就是联手各盟邦和联合国铲除恐怖主义。并且，釜底抽薪，在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努力化解全球的政治、宗教、文化的热点纠纷，从源头上铲除仇恨之根，掏干恐怖主义的精神情绪水库。

实质上，这也就是重建世界新秩序的问题。美国，作为现代人类宪政文明的堡垒，责无旁贷。值此艰困的时刻，美国需要更加吸取自身历史传统中广纳百川的胸怀，需要更加坚守自身自由的根基，象在珍珠港之后的全国奋起一样，在「九一一」的挑战之后，用文化间沟通和包容的大智慧，用坚韧不拔的耐心，用无坚不摧的爱心，奋起迎战，在地球上竖起更高的精神双子塔。

问题是，在上述三种路径中，美国作何选择呢？毫无疑问，美国的抉择，将关系到宪政自由主义在21世纪的命运。

九十七、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1)

9.11 恐怖攻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走向了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s，缩写为 neocons）。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芝加哥大学已故哲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其核心是，制度差异是有善恶之分的。反抗暴政，对付“野蛮”的敌人，是西方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和责任，可以不受现存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约束。

对 9.11，首先的反应是直接的军事反应——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2001 的 9.11 事件后不久，美国就对该事件的罪魁祸首本拉登的保护伞——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发起了攻击，并迅速获得了胜利。塔利班政权对内实行宗教统治，在国际上奉行强硬外交。塔利班武装力量的保护更是拉登的基地组织壮大的原因之一。该政权在美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不肯交出本拉登。这一死硬行为终于导致了它的覆灭。

紧接着是新的战略方针的出台。阿富汗战争胜利后，2002 年 6 月 1 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了被称为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有“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敌人；第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第三，美国“尝试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它和平事业”。

2002 年 9 月 17 日，布什正式签署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更系统地解释了“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报告指出，从遏制与威慑原则向“先发制人”原则的转变，是由于非理性的恐怖主义份子不受遏制与威慑的阻遏；美国价值观的普适性，是因为“地球上没有人渴望被压迫，渴望受奴役，或热切期待着秘密警察的夜半敲门”；美国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是基于“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它“反映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美国将创造出一种“17 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崭新局面，即国家间将只有经济竞争而无军事竞争。总之，美国“将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独裁政权而保卫和平”。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这样为新保守主义者画像：“他们爱民主、军队和秩序，憎恨基辛格、共产主义者和联合国；他们厌恶实用主义、孤立主义和外交官，喜欢里根、杜鲁门和托克维尔；他们把美国及其价值观和它的世界‘使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是几十个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主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世界报》概括了新保守主义的 4 个特点：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和坚定地反对暴政。

过去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新保守主义，现在已经在战略层面上进入美国的权力中心，美国公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

这是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龙头——美国的一次历史性战略转向，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特别是对基辛格式的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政策的一种转变。它必将影响全球宪政民主的走向与命运。

从具体实践看，9.11 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并没有超越出美国的传统战略反应方式。然而，不久之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应当是“布什原则”的第一次亮相于军事行动了。

九十八、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遭遇 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获得强劲的动力。而 2003 年 3 月 20 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则是新保守主义的牛刀初试。实际上，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早在 1998 年 1 月 26 日一批新保守主义者致克林顿的公开信中就提出了。而 9.11 导致的美国心灵重创，给攻打暴虐的萨达姆独裁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新保守主义认为，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宣告了强硬路线的胜利，9.11 事件证明了它关于民主政体具有脆弱性的论断，而今，伊拉克战争的速胜又把它另一个论断变成了事实：推翻一个“坏政权”是办得到的。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而美国外交历来有两个基本方面：务实主义（基辛格主义是典型代表）和“传教士情结”，两者融作一体，交替占据主流。新保守主义的得势表明，“传教士情结”已居于上风。

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性质比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都重要得多，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过去来自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体制，今天来自“激进的伊斯兰的恐怖主义”。布什的“善与恶的战争”和布莱尔的“传播自由才是对安全最好的保证”，正是新保守主义在最高政治层面的反映。

伊拉克战争是展示新保守主义“先发制人”战略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一次以更迭政权为直接目的的一场战争，它表明美国感到，自己的安全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包括恐怖行动的“多重形式的多种威胁”，而恐怖行动有着“异己”国家支持和推波助澜的政治背景。因此，对外动武不再局限于有限打击，而是通过彻底推翻“异己”国家的政权来实现政治目标。这一政治目标就是：通过推翻暴政，在“激进的伊斯兰的恐怖主义”的渊藪打进一个楔子——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作为中近东的一个示范和政治重心，扩展自由的社会秩序，动摇恐怖组织依托的根基，从而从根本上保障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

在战争形式上，配合军事，强调实施政治、外交、经济、媒体各条战线协调，总体战特征非常突出。从军事行动看，美英联军广泛地运用了特种战、空降战、心理战等多种战法手段。特别是在指示“斩首”目标、

破坏伊军防御体系、控制石油油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注重攻城与攻心结合，采用了边轰炸、边向老百姓发放粮食等措施。注重空地结合，采用武装直升机开道，攻城拔点、夺控要地，掩护和保障地面军队推进的战法。特别值得一提的事，美英联军以高度精确化打击和“斩首行动”，通过空、地、海、天、电、特”的多维信息系统为支撑，实现了信息、火力与机动一体联动，强调“不局限于决定性力量摧毁和消耗敌军事力量，而是致力于影响和控制对手的判断和意志”的新战争观，提出以具有相当的力量性、精确性为手段，诱导、强制对手接受美国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美军在战争中将“心战施压”提升至战略高度，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手段之多，可谓空前。在两次斩首行动后，在美英高强度的、以领导层目标和军事目标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精确化持续空袭下，伊拉克领导指挥体系陷入了瘫痪，领导层很快失去了控制和组织防御和抵抗的能力，伊拉克战局急转直下，巴格达和提克里特也都随后出现了不攻自破的境况，伊军的抵抗意志崩溃了。

伊拉克战争虽然遭到不少国家甚至美英的传统西方盟友的质疑乃至反对，但毫无疑问，新保守主义的实践正在深刻影响国际关系，甚至影响世界秩序和宪政民主的走向，是值得全球高度关注的。

九十九、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1)

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主导的新保守主义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伊拉克战争导致萨达姆暴政结束，以及2004年美国布什总统竞选获得连任，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将成为冷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思想。

虽然，新保守主义在21世纪初主要应对的焦点是极端伊斯兰的原教旨恐怖主义，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必须寻求与中国政府的有限度合作。但是，从宏观历史眼光看，反恐只是阶段性任务，而日益壮大的共产中国，对文明世界，则是长远的心腹大患。

不像基辛格的现实外交——不管制度差异而玩弄19世纪欧洲的地缘政治手腕，与之成对照，新保守主义集中注意力于专制与民主、极权与宪政的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上，因而新保守主义的长期的主要假想敌必然是共产中国。

其实，在9.11之前，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已是非常明显。

布什新政府上台后，其对华政策逐渐露出端倪。从美国「国家飞弹防御体系」(NMD)、美日「安保防卫指南」到美国与东亚国家的「战区飞弹防御体系」(TMD)的开始实施，从日本、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在中国外围的战略压力正日益增大，美国甚至逐步向俄国接近，拆解北京想象中的中俄联盟，从而使得对北京的钳形夹击的战略态势隐隐呈现雏形，北京陷入日益深刻的外交困境之中。有论者甚至极而言之，认为一个拖垮前苏联的套索正在伸向北京。

其依据的逻辑，是冷战后期前苏联为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竞争耗尽国力而解体的思路，并认为，美国会继续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大概只需要十五年，中共就会被拖垮。

本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其总原则是：「削强扶弱」的平衡战略——平衡任何强国与周围国家的力量对比，不使任何一强突出，从而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任何亚洲强国若与其它亚洲国家力量对比悬殊都违反美国利益。但何以布什上台后如此明显地独独青睐北京，对中共施压？

原因在于亚洲的力量均势已经岌岌可危。21 世纪初的情势是，中国大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亚洲的强权，破坏了亚洲的均势，特别是军事均势，势必引起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调整。更加骇人的是，中国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对共产中国强大的疑惧，使亚洲力量均衡的问题进入了议事日程。

加剧这一调整速度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共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国家的招牌及其政治统治方式，拒绝民主改革，近年来甚至变本加厉，对内加紧控制言论、镇压异己分子和法轮功，对外特别是对台耀武扬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触目的不协调的「异数」和「刺头」。第二是邓之后的北京领袖缺乏象邓小平那样的韬光养晦的忍耐和眼光，不自量力，打肿脸充胖子，搞所谓「大国外交」作派，以世界大国自居炫耀，平时好说大话，关键时刻则阳痿。匹夫之勇，自取其辱也。

北京的行为方式正如一个(正在迅速长大，但)羽翼未丰尚未成熟又不讲道德的少年急不可耐地向世人露胳膊露腿展示胸肌一样，徒然授人以柄，提醒世界注意其危险性，从而导致四面树敌；同时并给比它强大的超级大国强力预防提供了口实，极易遭致原有「拳王」的预防式致命一击，从而中断了自己扩张力量的过程，愚不可及。

在这场制度竞争中的硬力量方面，共产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相当大。

二十一世纪初的共产中国，与一九八〇年代的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国民收入、科研水平、军工产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一九八〇年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就拖垮了庞大帝国苏联。若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北京的总体力量能够应付吗？北京比当年莫斯科强的一点，是国际贸易活跃，这有助于带来军备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但是，迄今对中國大陸最主要的科技输出国（包括留学生培训）和第二大投资国，是美国。一旦美中对峙，这一优势将很快流失。

面对周边的隐含的不利局势，北京在 21 世纪初的五年内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共产中国现有的实际军费是公布数目的三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点多。

因此，若把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为参考，推论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巨额无

偿外援。

以目前中共的军费比例的增长速度推算，共产中国在十来年后经济形势的前景是十分严峻的。但北京似乎正在乐此不疲，加紧扩军。如此，前苏联的覆辙已经清晰可见。

对抗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令北京消受不起，更加难办的是台湾、日本、印度、越南，外蒙古、俄国甚至（在 9.11 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国现在都向美国倾斜，不知不觉地，对共产中国的地缘政治态势由新月形变成了环形包围圈。

美国在东亚的第一国家利益是防止中共政权成为亚洲霸权，基本手段是压抑中共，使中共、日本、俄罗斯与印度在亚洲大体维持均势，并建立和加强亚洲安全的防御体系。美国的力量均衡原则需要某个象征性支点，由于台湾在西太平洋战略地位，由于台湾体制所象征的制度竞争含义，为维持亚洲的稳定与和平，为履行美国在亚洲承诺的道义负担，美国力量以某种形式再次介入，扶植日本成为可资平衡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日政策)，既防止中共在目前的体制下并吞台湾，但又要防止台海之间爆发冲突而影响地区稳定，在从日本到南中国海之间建立一道安全保障线，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这是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首要国家利益。

当然，不应否认，美国的第二项国家利益是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中从中国市场获取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这一市场充满了与其它国家的商业竞争时，尤其如此。但应注意，即使是互利的经贸关系，中共之有求与美国也大于美国有求于中共。

当然，很明显，美国的这两项基本利益有时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时候，美国就必须确定自己国家利益的优先排序，即清楚何者为第一优先。布什与克林顿对华外交并无本质不同，但双方在轻重缓急上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在 9.11 之前，布什的白宫似乎对于慢慢等待中国国内的和平演变越来越不耐烦了。

针对目前的外交困境，北京当然会出手一些应对策略。一方面外交上放低姿态，暂时缓解与美国的关系。他们并积极出访，争取奥援；此外，中共领导人也在中共内部会议上严词反美，以凝聚内部力量，并声称将以“后发制人”的方式，破解美国的「包围圈」。

但北京手上究竟有几张「牌」呢？一曰「市场牌」(即中国大陆潜在市场)，二曰「亚洲掌权者的共同利益牌」。虽然中共很善于用那个「潜在的庞大市场」作诱饵，周旋于各西方大国之间，并诱使各国以对华强靖政策作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交换条件。但在根本利益上，从现实考量，在关键时刻，各西方大国也好，亚太国家的利益也好，都会把与美国的关系置于与中共的关系之上。这就使北京的外交努力只具有表面的效果，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就连一向惯于奉承北京的极精明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改变口风，贬低了自己早先提出的“亚洲价值论”，并认为，亚洲国家有必要让美国涉足亚洲，以便「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

美中双方的软力量对比，对共产中国就更加不利。

从历史长程眼光看，目前的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一个过渡性政权，并不是处于一种制度性稳定的状态下。摆在北京当局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条路，是坚持自己的共产牌号和政治极权统治，从而无可逃避地，被拖垮前苏联的同样一根套索绞死。其悲剧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成为中共的人质，有可能成为一段混乱时期的殉葬品。

另一条路，是北京真正实施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融入国际主流的宪政民主体制。那时，虽然与美国等强国仍有竞争，但那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竞争，正如法国、日本等国与美国的竞争一样，不至兵戎相见，不会伤及国之根本。而且届时中国可以结盟的外交空间，可以比现在大很多，其成败利钝，犹难定论。因此，后一条道路，是在目前的外交困境中，中国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

一百、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2)

共产中国在与西方主流较量的软力量方面，差距甚至更大。

历史昭示，两国相争，成败既取决于硬力量，甚至更取决于软力量。软力量主要指道义力量与人才趋归。

当今美国与西方各国应对北京的阵容庞大而多元，政府里对北京持强硬政策的，多为当年击败苏联的参与者，积累了与共产党政体打交道的丰富实战经验。更根本的，是他们坚信道义在他们一边，历史在他们一边，未来属于资本主义、言论自由加普选制而非共产主义加新闻封锁言论钳制。有此信念，他们就会步步逼近，不达目标不罢休。他们强调制度差异，因此对专制政权更加具有进攻性。

最极端的新保守主义者反对试图通过与中国大陆的密切经济交往而促成其改革，力主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北京更强硬。像当年对苏联一样，四面遏制，必要时不惜兵戎相见。

美国政治的左翼，也有对北京的极端强硬派。他们虽然在本国政策上与右翼争执不休，但出于人权、西藏问题等原因，照样对北京处处打击。只不过他们更倚重政治和外交手段，而非军备。

美国诸派之你去我来，并不影响各自相对独立的运作基础和彼此对话。这就使得各种中美关系的研究生生不息，新观念和新招数源源不断。

中西间的较量，中方的硬力量远逊于对方，理应特别侧重己方的软力量。但北京甚至起体系经不起智力、言论的开放。与美国多元灵活反应截然相反，北京的应对体制可称为“黑箱战略”，要点有三：

第一是封锁资讯。海外中文外文有关美中关系的国内国际因素之现状和渊源的大量深度分析和广度报导，在中国大陆主要的大学学报、学会期刊、时事杂志和大报上，极少见到。这意味著，中国大陆数千万受教育程度最高、从事观念和知识生产及承传的专业人士，与事关本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资讯，处于日常的隔绝状态。

有人说，不下达广大知识界的这类资讯，会上达中共高层。但问题在于，资讯的真伪优劣只有在公开流通中才能被辨识。把这类资讯封锁在秘密管道里，一是会造成持续的扭曲失真，二会帮助特别利益的个人和小集团垄断最高领导层的耳朵，造成错误判断和决策，三会促使本国研究素质的全面退化。

人们往往高估秘密资讯流通体制的效果。仅举一例：中国大陆经手台湾问题的机构不可谓不多，人力财力不可谓不丰。然由于秘密作业，资讯扭曲得不到及时纠正，使得北京对台湾大选的情势连连误判！

第二是不允许公开辩论。举凡一切意义重大、攸关中华民族命运的问题，中共上层都不允许进行公开严肃的、客观系统的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只是小问题。其实小事无需讨论就可处理，因为处理错了也不影响民族兴衰，大事才亟需公开讨论。

第三是局限于小圈子内部。凡是来自「圈子外」的建议与忠告，北京基本上都不予采纳。这个圈子近年来愈益收缩，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好像只剩下当政者自己、家属和贴身秘书。这种「只信家人，不听外人」的管理模式，经营一个小企业尚可，经营大型跨国企业绝少成功。经营风云诡谲的国际局势中的大国外交，其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在两岸三地、海外华人圈子和真正尊重中华文明的洋人里，有许多基于坚实的研究和近身的观察的新主意好设想--如何缓解台海两岸的敌对，以避免造成大陆台湾双输；如何呼应美国各界影响中国纳入世界文明体系的力量，如何逐步改善大陆内部的政治和人权状况，以化解国内外关系中的困境等等。对所有这些理性的建议，北京都不予理睬。

中西较量，北京硬力量远不及对方，软力量更是其致命伤。因此在反恐的暂时合作过去后，如果北京仍不改弦易张，不进行进入国际主流价值体系的国家定位，那末，前苏联与东欧，就是其前车之鉴。

美国在中国上空布下的天罗地网

最近几个月来，随著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的一步步展开，从美国「国家飞弹防御体系」(NMD)、美日「安保护卫指南」到美国与东亚国家的「战区飞弹防御体系」(TMD)的开始实施，从日本、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正日益增大，美国甚至逐步向俄国接近，拆解北京想象中的中俄联盟，从而使得对北京的钳形夹击的战略态势隐隐呈现雏形，北京陷入日益深刻的外交困境之中。有论者甚至极而言之，认为一个拖垮前苏联的套索正在伸向北京。其依据的逻辑，是冷战后期前苏联为与美国的“星球大战

计划”竞争耗尽国力而解体的思路，并认为，美国会继续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大概只需要十五年，中共就会被拖垮。

本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其总原则是：「削强扶弱」的平衡战略——平衡任何东亚强国与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不使任何一强突出，从而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任何亚洲强国若与其他亚洲国家力量对比悬殊都违反美国利益。但何以这次如此明显地独独青睐北京，对中共施压？

目前的情势是，中国大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亚洲的强权，破坏了亚洲的均势，特别是军事均势，势必引起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调整。对中国强大的疑惧，使亚洲力量均衡的问题进入了议事日程。

加剧这一调整速度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共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国家的招牌及其政治统治方式，拒绝民主改革，近一两年甚至变本加厉，对内加紧镇压异己分子和法轮功，对外特别是对台耀武扬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触目的不协调的「异数」和「刺头」。第二是现今北京领袖缺乏象邓小平那样的韬光养晦的忍耐和眼光，不自量力，打肿脸充胖子，搞所谓「大国外交」作派，以世界大国自居炫耀，平时好说大话，关键时刻则阳痿。匹夫之勇，自取其辱也。

北京的行为方式正如一个(正在迅速长大，但)羽翼未丰尚未成熟又不讲道德的少年急不可耐地向世人露胳膊露腿展示胸肌一样，徒然授人以柄，提醒世界注意其危险性，从而导致四面树敌；同时并给比它强大的超级大国强力预防提供了口实，极易遭致原有「拳王」的预防式致命一击，从而中断了自己扩张力量的过程，愚不可及。

鉴于中共的这种行为方式，美国在东亚的第一国家利益是防止中共政权成为亚洲霸权，基本手段是压抑中共，使中共、日本、俄罗斯与印度在亚洲大体维持均势，并建立和加强亚洲安全的防御体系。美国的力量均衡原则需要某个象征性支点，由于台湾在西太平洋战略地位，由于台湾体制所象征的制度竞争含义，为维持亚洲的稳定与和平，为履行美国在亚洲承诺的道义负担，美国力量以某种形式再次介入，扶植日本成为可资平衡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日政策)，既防止中共在目前的体制下并吞台湾，但又要防止台海之间爆发冲突而影响地区稳定，在从日本到南中国海之间建立一道安全保障线，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

另外，应当客观了解，美国的第二项国家利益是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中从中国市场获取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这一市场充满了与其他国家的商业竞争时，尤其如此。但应注意，即使是互利的经贸关系，中共之有求与美国也大於美国有求于中共。

当然，很明显，美国的这两项基本利益有时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时候，美国就必须确定自己国家利益的优先排序，即清楚何者为第一优先。布什与克林顿对华外交并无本质不同，双方只是在轻重缓急上有些差异。主要表现在，白宫的新主政者似乎对于慢慢等待中国国内的和平演变越来越不耐烦了。

针对目前的外交困境，北京当然会出手一些应对策略。一方面是其领导人积极出访，争取奥援；此外，江泽民先生在最近的欧亚论坛上也希图建立某种心照不宣的反美统一战线。同时在中共内部会议上严词指责布什，并表示将以“后发制人”的方式，破解美国的「新月形包围圈」。

但北京手上究竟有几张「牌」呢？一曰「市场牌」(即中国大陆潜在市场)，二曰「亚洲掌权者的共同利益牌」。虽然中共很善于用那个「潜在的庞大市场」作诱饵，周旋于各西方大国之间，并诱使各国以对华绥靖政策作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交换条件。但在根本利益上，从现实考量，在关键时刻，各西方大国也好，亚太国家的利益也好，都会把与美国的关系置于与中共的关系之上。这就使北京的外交努力只具有表面的效果，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就连一向惯于奉承北京的极精明的政治家李光耀最近也改变口风，认为有必要让美国涉足亚洲，以便「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

目前的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一个过渡性政权，并不是处于一种制度性稳定的状态下。摆在北京当局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条路，是坚持自己的共产牌号和政治极权统治，从而无可逃避地，被拖垮前苏联的同样一根套索绞死。其悲剧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成为中共的人质，有可能成为一段混乱时期的殉葬品。

另一条路，是北京真正实施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融入国际主流的宪政民主体制。那时，虽然与美国等强国仍有竞争，但那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竞争，正如法国、日本等国与美国的竞争一样，不至兵戎相见，不会伤及国之根本。而且届时中国可以结盟的外交空间，可以比现在大很多，其成败利钝，犹难定论。

因此，后一条道路，是在目前的外交困境中，中国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对中国人自不必说，即使对现今中国上层的多数政治菁英，也不失为施展抱负，留下历史功名之路。

一百零一、左翼极权滑向右翼纳粹

面对前述严峻的 21 世纪初的国际情势，北京政权总体回应的方向是什么呢？首先，是对国内的政治控制加强了。犹如满清末年在光绪、慈禧几乎同时死去后，清王朝的反应不是更加开放面对世界，而是恐慌于政权不稳，停止了新政改革措施。中共的危机感与满清末年统治者的危机感如出一辙，并且都导致了对其民间的严厉镇压。

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仍有一些正面的发展，然而在政治上，在人权侵犯方面，残酷荒诞黑暗之事，所在多是。

六四屠城后，北京政权从左派极权（leftist totalitarianism）向右翼专制（或称右翼威权主义 rightist authoritarianism）逐渐转变。国际社会与知识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假设，就是，中国的演化，很可能像台湾、南韩等社会一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治上逐步从右翼专制演变成宪政民主制度。

然而，从 21 世纪初镇压思想言论的程度看，北京已经不止是右翼专制，实际上在滑向某种新纳粹极权体制了。

的确，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经济模式，但却坚决抗拒自由民主。的确，国有制已日益崩塌，私人财产将获得宪法保障，商人被吸收入党。整个国家都成了一个商业公司：军队整个或者部份拥有企业、公司大股东同时是政府官员，但是，这离宪政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岂止十万八千里！然而，这究竟是个什么怪胎？

熟悉历史的人，总觉得似曾相识。事实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就有过这种“制度创新”：所谓“第三条道路”，即“公司国家”（corporate state）。而所谓“公司国家”，其核心是墨索里尼创造并实施的“工团制度”，使各行业选举代表直接参与国政（很像中共在香港推行的行业比例代表的形式）。这是在意大利法西斯文化改革试验中引起了全世界注意的一项制度创新，这就是国家社团组织。为了缓和同工人日益增长的矛盾，为了欺骗和笼络工人，将职业工会改为法西斯工团，并提倡劳资合作，发展生产，效忠国家。

中共官方报道说：我们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按照这一思想的始作俑者的解释，这种“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的重商主义”，就是“民族（国家）社会主义”。而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如假包换，就是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

实际上，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工团制度更疯狂，具有宗教狂热。

在反自由主义方面，民族社会主义与中南海的取向也有相当共识：都认为自由主义是为富人所操纵的一种体制，自私并且缺乏爱国心。民族社会主义轻视自由、平等和幸福，提倡服务、忠诚和纪律。它视国际主义为懦弱，国会制度为无能。它特别强调意志和直觉。为了使个人放弃其个别的利益以追求集体利益，其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事战争。

此外，在功利主义地利用传统文化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有高度共鸣。目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们，悄悄地抛弃了毛泽东毁灭中国文化的文革狂热，相反，用中国传统把他们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就正如在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重建了罗马，提供了一个用视觉回忆古代辉煌的机会；希特勒用他最欣赏的传统式建筑布满第三帝国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共近年来对言论自由的非理性空前残酷镇压，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兴起，都显示了北京统治集团

从左翼极权向右翼威权统治的转向，而其极端状况，则是从共产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向。

一百零二、胡温政权向毛主义摆动

由于江泽民政权导致的贪腐泛滥，贫富悬殊，民怨沸腾，其继任人胡锦涛跨入权力交接的轨道后，政治方向出现左倾回潮的趋势。

2002年12月，胡锦涛刚接任中共总书记，首先就到了西柏坡“朝圣”，做出了重温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姿态，还走访了西柏坡当地的一些农户——今日的弱势群体。

2004年，全面接掌了中共最高权力的胡锦涛居然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当然，在2003年萨斯危机期间，胡温等曾一度开放资讯流通，摒弃了导致疫情大面积扩散的中共的封锁信息传统。但很快又故态复萌。当然，在国际上，胡锦涛也曾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但在国内党内，却噤口不言。

鉴于胡温新政权对媒体的封锁以及对异议知识分子的镇压都超越了前任，总起来说，中共当局正在有限度地摆回毛泽东主义的左翼极权。中国再次进入某种周期性的循环，掉进“两极化线性政治摆动”的陷阱。一方面，是由于胡锦涛未能逃出共产政权权力转移时期的“左转”机制：在转移权力的此种微妙权争时期，因为没有了一言九鼎的最高权威为“党的利益”作现实实用的决策，各位权力“备胎”为防政治对手抓住把柄，都纷纷表态忠于意识形态原则，向“左”靠。这是微妙时期的防身求稳安全之道。因此，它导致短期内出现“左转”现象。

另一方面，也由于毛的政治遗产和邓的政治遗产，已经成了中共政治走向的两个基本参考系。中共领袖们的视野已经完全被这中共的左、右传统的两极的框架所框限住了。

二十多年来，人们看到，当毛的极左路线导致天怒人怨，经济萧条，走入死胡同同时，邓路线即应运而生，起而纠偏。当邓路线“与时俱进”，导致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社会不公，贪腐泛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弱势阶层生计艰难，挣扎于贫困线边缘时，人们的政治想象力使之只能回溯到毛泽东，又怀念起毛时代的平均化和清贫极权，摆向了毛的民粹主义，并把毛的左倾路线抹上一层理想色彩。如此，反复循环，左右摇摆。

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采取完全另类的、世界主流的生存方式、制度形态。倘如此，则既能保障大家权利的平等，又能获得经济繁荣发达。但他们深恐这样将危及其垄断性权力。

问题并不出在智力贫弱上，其实，也不完全由于政治想象力的贫乏。问题出在建党八十多年来中共话语系

统对其成员思维的超强形塑，出在建政五十多年来中共利益集团因垄断权力获得的巨大利益对其政治视野的强制缩减。简言之，为了满足其“党内的合法性”，他们自觉地闭目塞听，自觉地剪除任何“越线”的政治想象力，而总是仅仅满足于摇摆于毛、邓之间了。至于另一种“合法性”——“保障国人权利、满足国人福祉”——的“党外的合法性”，对不起，只好靠边站了。

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两极线性钟摆。

是否能超越这种“两极化线性政治摆动”，是关系中国下一步走向的关键。

两极摇摆的政治平衡术，只是政治上的小聪明。胡温倘若希望真正开创自己的时代，就必须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扩展和深化到政治领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深入的融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最终公开放弃马列毛的意识形态。这样，才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

一百零三、伊拉克战后民主进程

伊拉克战后，全球关注的第一次大选在 2005 年 1 月 30 日举行。据统计，这次选举的投票率高达 61%——75%。如此之高的投票率，不仅大大超过了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即使是在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成熟的民主社会也是罕见的。

伊拉克人民不顾恐怖主义者的威胁，勇敢地走向投票箱：有躺在担架上和坐在轮椅上的伤残人，也有在头一天刚刚作完大手术的虚弱病人，还有身着穆斯林长袍的伊拉克妇女。伊拉克的人民噙着眼泪、带着微笑、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将手中那张神圣的选票投进了票箱。他们不仅在选举自己的政府，也在表达对未来的希望。

伊拉克人民勇敢地站出来走向投票站是伊拉克自由和正义力量的胜利；是对全世界自由和正义事业的一个巨大鼓舞。

该次选举是在萨达姆政权的残余和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袭击的阴影下举行的。选举的头一天和选举的当天，恐怖主义者总共发动了五十多起流血事件，而且其中绝大多数的袭击是针对手无寸铁的选民和选举工作者的。基地组织的第三号头目公开宣称，袭击的目的就是阻止民众投票。

但是，饱经暴君压迫和战争创伤的伊拉克人民面对灭绝人性的恐怖主义威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现出了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恐怖威胁的蔑视。在他们的勇气面前，所有那些为暴君独裁者辩护的谬论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谁说自由民主是不适合东方民情的西方传统？古老的东方民族伊拉克正在高举双手欢迎这一普世的价值；谁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违反了伊拉克人民的意愿？伊拉克人民正在用他

们的选票表达对世界自由阵营的感激之情。

当然，一次大选不可能解决伊拉克的所有问题。针对民主政权和普通民众的暴力流血事件还会发生；新生的民主政权也百废待兴；伊拉克的光明未来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不懈奋斗。

但是，通过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和进行第一次的民主选举，伊拉克人民的绝望已经变成了希望。虽然伊拉克人民在民主和发展的进程中还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是，正如所有民主社会那样，伊拉克人民将勇敢地对自己的错误负责，并在纠正自己的错误中成熟起来。

伊拉克大选的胜利也给了人们很多有益的启示。首先，自由和民主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些代价之一就是一千多位年轻的联军士兵们的鲜血和生命，他们是保卫世界人民自由权利的烈士。更惨重的代价是在战争和恐怖主义袭击下丧生的数以万计的平民，他们用自己的宝贵生命，开拓了一条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康庄大道。

在过去的伊拉克和现存的集权国家里，攫取了国家机器的独裁者们垄断了一切国家资源，对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暴力统治，任何可能的反抗都被统治者毫不留情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帮助那里的人民是世界自由阵营的人道主义义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有的独裁者，绝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向自由阵营发动进攻。消灭他们，是保护自由的唯一途径。

伊拉克人民用自己的行动表明，推翻萨达姆政权，夺回被暴君攫取的权利，这才是伊拉克人民的真正意愿！萨达姆之流竭尽全力地用屠刀来剥夺他们的权利，而在萨达姆之流的卑鄙事业中，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国际政客和西方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则是他们的天然盟友。

伊拉克大选在 21 世纪初的胜利，进一步为全世界上那些还在苟延残喘的独裁政权敲响了丧钟。它向世人昭示，无论独裁者表面上是多么强大，无论他们如何的自封为伟大的领袖、亲爱的领导者、人民的父亲、母亲或者儿子，他们最终都将无法逃脱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的命运。巴格达街头那一双双踏向轰然倒地的萨达姆铜像的双脚、柏林墙边那一双双捣毁罪恶之墙的铁拳，就是历史的铁证。

一百零四、赵紫阳逝世与中国政局

2005 年 1 月 17 日，自六四事件后被软禁了 15 年半的原中共总书记、总理赵紫阳逝世。死亡才赋予了以自由。

赵紫阳之死，是坚持人道底线，坚持不让步出山，坚决拒绝检讨，拒绝自贬、自罪、自虐之死，这一不惜失去自身权位和自由而坚守尊严之死，突破了中共的政治传统，升华了赵先生的政治人格。

从此，在国际共运史家的笔下，赵紫阳将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匈牙利的纳吉一起，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人道改革家、以自由和生命的代价拒绝实施暴政的政治家的名字，而载入史册。

从此，在中国近代史家的笔下，赵紫阳将与光绪、蒋经国等中国政治家一起，以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改革者的名字，而载入史册。

从此，赵紫阳已不复是 1978 年以前的赵紫阳，甚至也不复是 1989 年之前的赵紫阳了。正如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杜布切克已经不复是布拉格之春之前的杜布切克，正如戊戌变法之后的光绪已经不复是戊戌之前的光绪，正如晚年蒋经国已经不复是 1986 年解除党禁报禁以前的蒋经国一样。经此一变，他们已经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赵紫阳的名字，是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八十年代后期萌动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 1989 年的天安门运动连在一起的。他的政治遗产，自然也与之紧密相关。

赵紫阳对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已是有口皆碑。它成为中国二十多年来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及其经济起飞的基地。

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后期，成立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酝酿政治改革。其核心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对党的权力进行某种方式的平衡。这些设想与措施虽然由于邓小平的压力和干预而大部夭折，但在客观上为知识界与民间种下了 1989 年抗议运动的火种。

赵紫阳在 1989 年天安门运动中最后的抉择，是其人生的顶点。这使他进入了中国现代政治家的殿堂，并为中国阴森黑暗的政坛，确立了一个夺目的人道标杆。

赵紫阳抉择，打破了中国历史的铁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六四事件中，呈现出的却是：“成者罪人，败者圣徒”。

21 世纪初的中国，赵紫阳去了。胡锦涛来了。

胡锦涛当时正摇摆于毛与邓的左右两项政治遗产之间。

此时，赵紫阳去世了。赵的悲剧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于是，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赵的遗产凸现了出来。这是区别于毛，不同于邓的新的政治遗产。正如 1988 年 8 月赵紫阳所说：“十年来，我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看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这是完全不同于毛、邓的崭新的政治坐标，具有普世性的政治遗产。

从根本上看，自从苏东波共产主义大溃败后，中共的每一届政府，都是临时政府，每一届内阁，都是看守内阁。中共面临的选择是：或者是战战兢兢，变本加厉地用暴力与谎言控制中国，遮遮掩掩的送子女乃至孙辈去美欧留学置产，或者幡然醒悟，效法赵紫阳，以苍生为念，用党外合法性取代党内合法性，用人性战胜党性，走“赵紫阳道路”。值此关键时刻，赵紫阳的去世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中共何去何从，不仅关系到它自己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也关系到宪政民主在中国推进的历史前景。。

一百零五、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近代宪政演化，作为一个系列，今天是它的结束篇。

身处 21 世纪初年，环顾我们的星球，回溯我们人类在组织自身的群体生活方式上所跋涉过的艰难历程，人们看到的是一幅波澜壮阔起伏曲折的图景。不过，尽管千姿百态，尽管我们尚不能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但无可怀疑，过往的历程已然呈现出某种日渐清晰的轮廓和趋势。

经历了古典轴心时代人类各主要文明独立地对群体生存方式的实验摸索，经历了中古时期欧洲基督教文明、中近东伊斯兰文明、东亚儒家文明、印度文明等各主要地域的文明进展，特别是，经历了 15 世纪以来的全球地理大发现，沐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光的洗礼，之后，在欧、亚、美洲各自生长出的文明形态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空间接触，产生了空前活跃的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其历史后果，诞生出了某种主流的带普遍性的群体生存方式，它被称作能够自行扩展的自由秩序。在制度形态上，是宪政民主；在观念形态上，是自由主义。它已经日益强烈地影响了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中，有过君主制、僭主制、直接民主制、贵族政治、神权政治、东方的天命式的皇权专制等等.....，各种政治形态都曾粉墨登场，演绎历史。我们刚刚告别的 20 世纪，又出现了两种对于主流的普遍性生存方式的致命挑战，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于自由秩序的破坏和对民主宪政制度的挑战。如所周知，法西斯主义由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灰飞烟灭了，而共产主义，则在冷战中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之久，甚至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达到了其巅峰。然而，经过 1989 年开始的全球性解咒浪潮，它也以戏剧性地方式进入了弥留时期：在苏联、东欧，已经全盘崩溃，在亚洲的共产国家，也都纷纷改制，寻求出路。总之，共产主义事业已经衰亡，它的巅峰岁月从此将一去不复返了。

从轴心时代已降，两千多年过去了。自英国大宪章运动以来，将近八百年过去了。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之后，也有两百多年了。近代以宪政民主为标志的政治生存方式，已经扩展到了全球各个角落，渗透进了各国的基本制度文明中，望风披靡，无往不利。。

从宏观的眼光看，经过 1989 年的历史性巨变之后，共产神话的世界性脱魔前景业已呼之欲出了，其终局，

连瞎子也能看见；其丧钟，连聋子也能听到了。而宪政民主的脚步声，正在气宇轩昂逼近了最后几个专制独裁国家。我们身处这一时代，目睹重大的历史变迁，既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责任。无可讳言，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还将遇到挑战，还将面临曲折坎坷，然而，坚冰已破，航道已通，方向已明。它已经获得了历史的应许与青睐。

Co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by Kuide Chen



Published by Guancha E-library

Washington DC, 2007